

# 炎黄春秋

第 **6** 期  
2012年

**胡耀邦治丧手记**

**我奉命封杀贺绿汀文章**

**警惕文革元素的复活**

**陶铸是被谁打倒的**

**苏俄喀琅施塔得兵变真相**



## 目 录

### 亲历记

- 1 胡耀邦治丧手记 ..... 章立凡  
9 我奉命封杀贺绿汀文章 ..... 陈清泉

### 春秋笔

- 13 陶铸是被谁打倒的 ..... 阎长贵

### 一家言

- 20 警惕文革元素的复活 ..... 郭道晖  
25 经济转型的瓶颈是政改滞后 ..... 陆 德  
28 中共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 ..... 米鹤都  
32 应该抛开“斯大林版本社会主义” ..... 王录生

### 求实篇

- 35 苏东剧变：回归人类文明 ..... 韩云川

### 人物志

- 39 盛世才统治新疆始末 ..... 智效民

### 往事录

- 47 光明日报社的“反右”运动 ..... 皮学军  
54 饥荒年代青海“三类人员”死亡情况 ..... 尹曙生  
57 习仲勋在广东主持平反冤假错案 ..... 李盛平

### 争鸣录

- 61 宪政民主应成为基本共识 ..... 张千帆  
66 1976年天安门事件：和吴忠说的不一样 ..... 马懋如  
69 我所知道的“联动”六冲公安部 ..... 马小冈

### 品书斋

- 73 “伤心桥下春波绿”：读李锐流放日记 ..... 奚 青  
81 谷牧与叶帅：读《谷牧回忆录》 ..... 袁小伦

### 忏悔录

- 85 我为在五七干校打人深感愧疚 ..... 施 亮

### 海外事

- 87 苏俄喀琅施塔得兵变真相 ..... 左凤荣

### 编读窗

- 93 补一封朱家骅致陈独秀函 ..... 刘宪阁 等

### 顾问

杜润生 于光远 李 锐

### 编委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 实 王俊义 冯 健 冯其庸 卢跃刚  
曲润海 何 方 吴 象 吴明瑜 宋木文  
张文彬 张岂之 张希清 张荣华 张惠卿  
杜 光 杜导正(召集人) 李一鑫 李大同  
李冰封 李宝光 李维民 杨天石 杨奎松  
杨继绳(副召集人) 沈志华 苏双碧 陈 敏  
邵燕祥 周瑞金 金冲及 胡德华 赵德润  
保育钧 钟沛璋 郭道晖 资中筠 凌 云  
展 江 徐小岩 秦 晖 袁 鹰 袁伟时  
高 放 高尚全 陶斯亮 钱理群 章诒和  
萧蔚彬 彭 迪 韩 钢 董 健 曾彦修  
鲁 諝 雷 颐 魏久明

社 委 会 杜导正(主任) 吴 思(副主任) 杨继绳  
李 晨 徐庆全 胡竞成 张晓鸥

社 长 杜导正  
法定代表人 常务社长 吴 思  
副 社 长 杨继绳 李 晨  
社长助理 胡竞成 张晓鸥 杜明明

总 编 辑 吴 思  
副总编辑 徐庆全  
执行主编 洪振快 黄 钟

总 经 理 李 晨  
副总经理兼网络总监 张晓鸥  
财务总监 胡竞成  
发 行 部 孔 屏(主任)  
办 公 室 王海印(主任)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理事长 莊其環 李 琼  
秘 书 长 吴 思  
副秘书长 杜明明

主管主办单位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吴栾赵阁律师事务所010-68083211)  
步凌云(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010-85869163)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100045  
网 址 <http://www.yhcqw.com>  
编辑部邮箱 [yanhcq@sina.com](mailto:yanhcq@sina.com)  
[yanhcq@gmail.com](mailto:yanhcq@gmail.com)  
发行部邮箱 [yhcqfxb01@126.com](mailto:yhcqfxb01@126.com)  
电 话 发行部 010-68532048 68539058  
编辑部 010-68534879 68523512  
财务部 010-68525374  
办公室 010-68522852 (兼传真)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印 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单本定价 8元 全年定价 96元

# 胡耀邦治丧手记

○ 章立凡

1989年4月15日,是我终生不能忘怀的日子!这一天的中午,我听到消息说:“耀邦今天上午去世了!”第一个反应是不信。给朋友打电话,大家重复着惊愕、怀疑与悲恸,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相信这个消息的真实性。北京时间晚七点整,耀邦的黑白照片出现在“新闻联播”上,残酷的消息被证实了。

## 一、吊客成了治丧人员

第二天一早,一些与胡家有交谊的年轻朋友们,筹划着联名在耀邦灵前献个花篮。大家按照分工,有的去订花篮,有的去买缎带,我的任务是在缎带上写字。中午时分,连饭也来不及吃,便匆匆来到中南海东墙外的会计司胡同25号胡家,约好的几个人已先期到达。

两年来门庭冷落的胡家,此时大门洞开,吊唁的人群络绎不绝。走进熟悉的庭院,马上被一种肃穆的气氛所感染。往日胡家会客的大客厅,现在已连夜改成家祭的灵堂。我们在哀乐声中鱼贯而入,到灵前肃立,行礼如仪后缓步退出。

出得灵堂,诸人意欲离去,我提议去看看德平夫妇。好在胡家的几位工作人员与我相熟,没经过什么阻拦便绕到西厢房。一见到德平夫妇,同行的两位女士已是潸然泪下。众人在小客厅坐下,半晌相对无言。还是德平先开口,缓缓述说父亲临终前的一些情况……德平谈到,关于讣告,家属只提了一个要求,就是要求加上耀邦是“在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突发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此外,他还谈到,爸爸生前有一个愿望,就是中央对他的问题,能够有一个结论,没有也不强求。

从胡家出来,顺道去天安门广场看了看,听说昨晚已有人献了花圈。远远地看见纪念碑前有

不少人,走近一看,有两个花圈,还有不少人在议论,说是大专院校已出现了不少挽联和大字报。

当晚,我的邻居张凯(张德生之子)向我转达德平的意思,要我帮忙办些事:胡家希望保存一些悼念活动的资料作为纪念,但他们自己要轮班守灵,没有精力,希望能有一位朋友主持其事。朋友们提名了好几位,大约因为我是搞历史研究的,同他家又比较熟,最后选中了我。

德平兄要将此任务交付于我,无论私情公谊,都是义不容辞。于是从17日上午起,我便每天到胡家“值班”,除负责摄影、录像外,还兼作文字笔录,记载每日的情况及一些吊唁者的谈话,也帮助他们接待一些熟悉的朋友。

自“文革”以后,我惕于文字之祸,已多年不记日记,笔记也记得很简略。此次身负胡家的重托,逐日随时记录,倒使我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经过,有了较翔实的记录。

## 二、吊唁日志

自16日起,到胡家吊唁的人群川流不息,从达官显贵到平民百姓,从白发苍苍的老者到系着红领巾的儿童,还有宗教僧侣和少数民族。他们大都与耀邦素不相识,仅仅因为“他是一个大好人”,或是为他的遭遇感到不平,因而赶来吊唁。灵堂内挂满了各种挽联挽幛,花圈花篮放了一层又一层,后来实在放不下了,便只好在灵堂外的庭院中陈放。很多花圈是群众自己掏钱买的。一位妇女边哭边对我说,花圈店的师傅听说是送给耀邦的,坚持不肯收费,双方争持良久,最后只收了工本费40元;据说送第一只花篮的王光美,也遇到类似的情况。一位中年知识分子看着群众哀悼耀邦的动人情景,感慨地对我说:“公道自在人心。”



在胡家,我与一些吊唁者进行了交谈,他们抒发了对耀邦逝世的感言。

廖盖隆(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说:“这是我们党非常大的损失,他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的全部心血全部生命都贡献给共产主义,一生清白,为我们树立了楷模。我们永远纪念他、学习他,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张小曼(民盟盟员)说:“他去得太快了。他是我们党改革家的旗帜,希望中共能够多出这样的英才。他是人民心目中党的崇高形象。”

中央党校教师夫妇:(男)“他的逝世很突然,而且从发病到去世时间很短,过去也未听说过他的病。这是我们党很大的损失,老同志都感到惋惜。”(女)“特地来致哀,致以最深的感谢之情。他到党校来,为我的丈夫平了反,我一直想向耀邦同志致谢。他在拨乱反正方面有很大的贡献,我们两口子都得到他的关怀,获得平反。我们是随十八军团南下的晋绥干部,他在用人方面是五湖四海,很善于用人,到川北党委工作,他没有带一个人,用的是晋绥干部,大家对他非常钦佩,工作心情舒畅,这是我亲身体会到的。”(男)“他对犯了错误的干部也不是一棍子打死,给他们改正的机会,非常得人心。”

有位中年妇女(售货员)对耀邦的孙子霁光说:“上中学时我听过你爷爷的报告,可惜我没有继续上学,至今没多少文化,你要好好学习呀!”

一位中共高级将领之子(参加过对越作战)说:“作为军人,将来我们只打卫国战争,决不打内战。”

以下是我在灵堂内随手抄录的一些挽辞:

一身正气,深得民敬爱;

两袖清风,堪为人楷模。

——周美惠 王晓华

革命元勋,伟绩丰功昭史册;

甘棠遗爱,馨香懿德暖人心。

——爱新觉罗·溥杰

中国需要的是良心、正直和直言不讳的直率。

——伊林·涂西

大哉胡公,功高德重,创建共和,尽瘁鞠躬;  
艰苦奋斗,克己奉公,名垂千古,人民称颂。

——于桑

17日下午,耀邦的小女儿李恒从国外赶回北京,2时30分进入家门,带着一路哭声冲入灵堂,与守灵的大哥德平抱头痛哭……

广州一百多个体户推举的代表,向耀邦的遗像宣誓:要把改革开放事业进行到底。

老作家夏衍在家人的搀扶下来到灵堂,用颤抖的手在签名簿上签下名字。中国作家协会送来了花篮。

清华大学数十位学生,代表全体同学向耀邦致哀。中国佛学院的十余位藏族学员,向耀邦的遗像敬献哈达。

……

18日下午3时许,举行家祭,夫人李昭致辞后,吊唁的群众分两行鱼贯而入,向耀邦的遗像鞠躬,并向家属致以吊慰。在人群中,我发现了某个曾向耀邦射过暗箭的人物,一声不吭地排在吊唁的行列中,他与我相识,现在竟视若路人,不知是没认出我,还是心中愧怍,怕我认出他。

我打开一本又一本签名簿,这里面除了高官、名人的签名外,更多的却是不知名的普通人,有的册页上还有这样的留言:

你死了,留下一身正气安然合眼;

我活着,看多难的民族怎能安心。

你死我活

一人为天下忧;

天下为一人悼。

天生悲风地起荒,自古忠良命不长。

琴瑟琵琶弦正断,魑魅魍魉寿无疆。

家祭结束后,我乘车到天安门广场,初次见到了静坐请愿的学生。他们聚集在人民大会堂东侧的空地上,向群众宣讲他们的九项要求。其中有:

正确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肯定耀邦提出的“宽松、民主”的主张。

修改宪法,取消“反革命罪”。

公布国家领导人的年薪收入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实行全民信任投票。政府提出任期目标,实现不了应自动辞职。

增加教育经费,改善知识分子待遇。

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稳定提高。

……

### 三、《新观察》《世界经济导报》座谈会

18日晚,张凯托我提醒德平,在这个敏感时期不要多说话;并要我第二天早点儿到胡家,劝阻德平不要出席19日上午举行的座谈会。他说,这是他的老师于光远先生的意见。

次日上午8时我赶到胡家,向德平转达了这一意见,劝他勿去开会。但他说:“会还是要去的,我只去一会儿,讲一句话,我们一起去吧。”我当时有些为难,本来是做说客劝他勿去,现在反要做陪客同他一道去,既有负使命,又不便拒绝。转念一想,陪他去一下也好,一则可以制止他多说话,二则如果出了漏子还可及时补救。但我始终没问他到什么地方开会。

我们一起从胡家旁门(通中南海)乘车出发,特意经长安街看了一眼天安门广场。车经南河沿驶入沙滩北街,开进文化部大院,来到一座灰色旧楼的二楼会议室,不少人已在室内就座。我一眼看见《新观察》主编戈扬老太太,她是这次座谈会的主持人。会议的组织者,还有《世界经济导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张伟国和《新观察》副主编郑仲兵。

会场内陈放着《新观察》《世界经济导报》全体同仁敬献给胡耀邦的花圈,一条黑体字横幅写着:“耀邦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与会者有数十位,有李锐、于光远、李昌、秦川、吴明瑜、吴江、孙长江、严家其、苏绍智、于浩成、林京耀、李洪林、张显扬、戴晴、刘湛秋、陈子明等等,有的过去见过,有的知其名而未识其人。戈扬与我算是熟识的,且知道我与德平的交谊。她不由分说,要我准备即席发言。我对此毫无思想准备,只好将戈扬的意思告诉德平,他说“你就谈几句吧”,看来是推不掉了。今天真是阴错阳差,我由说客变陪客,又从陪客变成了发言者。

此时会议开始,首先由戈扬带领大家向耀邦遗像默哀致敬,继则由德平代表家属致辞:

各位同志,各位朋友,父亲虽然猝然病逝,但

我们所有的家属都不会堕入自毁性的悲哀中去。我们希望在悼念活动中,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能以一种祥和的环境和心态来度过,祝祖国大地吉祥!

这番“振导祥和”的致辞,无论从何时何地看,都说得十分得体,我悬着的心顿时落位。

座谈会的与会者,有不少是耀邦的故旧,对于他的猝然逝世,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悲愤之情,故当日的发言,多有为耀邦在1987年初的下台鸣不平的内容。轮到发言时,我首先回顾耀邦为我父亲平反之事:

1980年,我曾为父亲章乃器的右派错案多次向中央申诉,大约4、5月间我听到消息,父亲被列入不予改正的六人中。于是我向中央领导同志再度申诉,当时曾携“反右”时印发的材料到耀邦家上访,请求中央对父亲的言论做出重新估价。当时小平同志不在北京,胡耀邦同志把我的申诉转送小平同志。通过这种下情上达的方式,小平、陈云表了态,对文件做了改动,在后来下达的60号文件上,父亲的名字被列入改正的21名“右派”之首。这件事是我终生难忘的。

接下来我谈了对耀邦逝世的看法,但立场是超党派的:

耀邦同志的逝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巨大损失,也是国家、民族的巨大损失。耀邦同志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我感到十分忧虑和悲哀的是,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谁能有资格继承他的遗产。十三年前,小平同志为周总理致悼词,不料爆发了天安门事件。小平同志继承了周恩来的政治遗产,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现在耀邦同志逝世了,改革处于困难阶段,党的威信在下降。全国人民,包括我们知识分子,应该和党共济时艰做出牺牲,但这需要党带头作牺牲。耀邦是在工作岗位上殉职的,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他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乃至生命。古人云“哀兵必胜”,他的逝世,可以说是给了中国共产党一次历史机会,如果想加强自身的凝聚力,振作精神纠正错误的话,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历史的时机稍纵即逝。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希望党中央珍惜这个机会,做出符合国家民族利益的抉择。

郑仲兵特地对我说:我认为你今天的发言非

常好,这确实是我们党最后的历史机会。

戴晴在发言中就我用“下情上达”方式为父亲平反一事作了发挥,她说:如果其他人的子女,如章伯钧的子女、罗隆基的子女,没有这种“下情上达”的途径,又该怎么办呢?她认为这是个体制问题。显然,她是对整个“反右”运动加以否定,并非针对我的发言。会下我们做了交谈,成了朋友。

这次座谈会上的发言,以严家其、戴晴最为激烈,公开谈到为耀邦平反的问题。严还谈到天安门广场的情况,警告如不能对耀邦做出公正评价,不实行民主,1976年“四五运动”那样的情况就可能重演。

这次会上还有一件事值得一记:吴江在临走之前特地到我的座位前说:“1957年的时候,我写过文章批判你父亲,现在我向你道歉!”我连忙起身握手,并且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座谈会开到下午三时才结束,胡绩伟是最后一个赶来发言的,念了刚刚写成的一篇题为《思想解放的先驱——悼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胡耀邦》的文章。会后,《新观察》与《世界经济导报》的全体与会人员到天安门广场,向胡耀邦敬献花圈,我搭乘戈扬的车子顺道前往广场观察。

这时,广场纪念碑上安放了一幅高约六米的胡耀邦巨幅画像,十分瞩目,是中央美院的师生连夜集体赶制的。碑座下人山人海,当白发苍苍的戈扬及其同仁扶着花圈向纪念碑缓缓行进时,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阵掌声,人们自动让开一条通道,一些青年帮着把两个花圈安放在碑座台基的最高层。

后来在未出版的第439期《世界经济导报》上,刊有我的发言,但有两处更改:一是把“谁有资格继承他的遗产”改成“怎样认真地继承他的遗产”;二是把“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改成了“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 四、追悼大会前夕

4月20日上午,我在家稍事休息,下午仍去胡家。原定自19日起让群众瞻仰遗容三日,由于这几天形势紧张,临时取消了。几天来络绎不绝的群众吊唁,使悲痛中的家属十分疲惫,故自

今日起停止接待吊唁。胡家在胡同口立了一块牌子说明原委,请大家谅解。但亲近朋友的吊唁则不在此列。

此时丧事的操办仍有悬而未决的问题:一是耀邦的评价问题,19日的座谈会上,于光远等已提出悼词应加上“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始终未获高层同意;二是追悼大会的规格问题,高层提出按最高规格,即中央总书记的规格,在人民大会堂正厅举行追悼大会,用水晶棺陈放遗体等等,家属则坚持降低到现任职务的规格,即政治局委员的规格办。

赵紫阳在胡耀邦住院时曾去看望,胡逝世后,赵派其子来家吊唁。邓小平家除邓本人外,差不多都来吊慰过。李鹏在访日归来的当晚,即偕夫人朱琳到胡家吊唁,在胡夫人李昭面前落泪。

21日的任务特别重(明天将举行追悼大会),我一早便赶到胡家。9时10分,中央派人来与家属商量悼词的最后修订稿,子女们在饭厅内与中办写作班子里的郑必坚等人再三磋商,很长时间相持不下。我则回避到其他房间,安排分送追悼会的请柬、车证,以及当晚移灵及次日追悼大会的摄影事宜。家属与写作班子的磋商一直拖到近午,其间习仲勋还到胡家来了一次。最后家属仍未让步,只是表明态度,听任中央决定。据我所知,征求意见的修订稿,与赵紫阳在追悼大会上念的悼词,仍有一些差别。

耀邦的遗体将于今晚整容,然后由家属护送到人民大会堂,殓入水晶棺,在那里安放一夜,待明日追悼大会结束,再送至八宝山火化。我将跟随全部过程,拍摄历史资料。在我的日记中,这段过程是按小时和分钟记载的。

下午5时40分,我刚刚领到第二天会场使用的记者证,就有人喊我马上出发去北京医院。赶到胡家通中南海的侧门,乘上一辆面包车,与耀邦次子刘湖、三子德华同往。小女李恒已在本日下午到医院探视过遗体,此刻遗体正在太平间解冻,等候儿子前往为他穿衣。

车队下午5时50分由中南海出发,在苍茫暮色中驶过长安街,转入台基厂,很快到了北京医院后门。沉重的大门缓缓打开,一些身穿白衣的医护人员已在院内守候,不少人眼眶内充满泪



水。趋入太平间，院长及著名的遗体整容师马燕龙教授已在室内静候。

走近灵床，心头顿时一震，昏黄的灯光下，耀邦遗体安卧在米兰、君子兰围成的鲜花丛中。他面色憔悴，嘴角有一层未剃去的胡须，神态安详，像是在享受辛勤工作后的小憩。如果不是遗体上未融的冰星在闪烁，真不敢相信这位生命力如此旺盛的人已经停止了思想……

默哀之后，白色的被单轻轻打开，刘湖、德华和马教授开始为老人家清洗遗体。接下来是更衣，这次耀邦穿上了崭新的白色圆领衫和两件白衬衣，加套西装背心和他喜爱的铁灰色西服。一位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含泪将一条有棕蓝两色条纹的领带为他系上，领带下端有一个小小的圆圈，上面印着一个“N”字。下身是白色衬裤，用两条蓝色缎带裹住裤脚，再加西装裤。套在脚上的，是一双中式黑布鞋。

穿衣完毕，马燕龙教授细心地为耀邦修面整容，然后用白色丝绸被单裹裹。一具有机玻璃罩的白色灵柩抬了进来，遗体被小心地移入柩内，盖上了中共党旗。刘湖、德华率家人向遗体三鞠躬后，众人退出太平间。

车队从东交民巷经天安门广场驶回胡家，已是晚间7时，但更重要的礼仪还在后面。

晚8时05分，长子德平率全家子孙出发迎灵，先到人民大会堂台湾厅稍事休息，然后到中央大厅与乔石、宋平、温家宝等治丧办公室成员会合，于8时30分离开人民大会堂，在夜幕中驶过天安门广场，沿途街道两旁，人群默默肃立，悲痛地注视着匆匆驶过的车队。

13分钟后，车队驶入北京医院，许多记者已在院内等候，家属们趋入太平间，一见到玻璃罩下的遗体，顿时泣不成声……行礼如仪后，开始起灵，灵柩被慢慢移入灵车。

8时50分，车队驶离北京医院。为防止群众拥堵灵车，车队改由天安门广场南侧绕行，于9时整抵达人民大会堂西南门。由大门台阶到中央大厅，用大红地毯铺成了行进通道。解放军仪仗队肃立在通道两侧，随着灵柩的缓缓行进，军人们依次向耀邦行军礼。

这座以往在人们眼中灯火辉煌的巨大建筑物，此刻灯光昏暗，灵柩在一片沉寂中行进，没有

哀乐，不时可听到低低的抽泣，气氛显得凝重压抑。这位伟大改革家的官方丧礼，正在黑夜中悄悄筹备着；一墙之隔的广场上，哀痛的民众情绪激越……

中央大厅正面，悬挂着胡耀邦的巨幅彩色遗照。这是官方在这种规格的丧礼中首先使用彩色照片。这张照片是今年4月6日，即耀邦发病前两天，由记者杜修贤拍摄的。当时杜要求耀邦笑一笑，他回答说：“我怎么笑得出来？！”照片上的耀邦，左边的领角不经意地微微翘起，显示出逝者在衣饰上的随便作风，我注意到照片上的领带，与遗体上的一模一样。仍是那副忧国忧民的神态，昭示着一种“四面云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的思想境界。背景上的冬青树一片苍绿，暗示着逝者不朽的生命力。

大厅中央，配有特殊充气调温装置的水晶棺底座，已经安装就绪，上方是一座小型龙门吊床。9时10分正式入殓，人们将遗体小心地安放在底座上，马教授为遗体做最后的修饰，完毕之后请德平审视，他对遗容表示满意。沉重的水晶棺盖在吊床上缓缓移动，平稳地降落，将逝者与活着的人们隔开。

入殓完毕，众人再度默哀行礼。胡启立等与家属握手告别，昏暗中，我注意到他眼镜后面闪动着泪花。

步出大会堂，手表指着9时45分。行至大会堂西侧路口，车队被一股巨大的人流阻断，大批学生不顾北京市政府第二天将在天安门广场禁止通行的命令，源源不断地向广场涌去，为了明天的悼念，他们将在广场上度过一个乍暖还寒的春夜。

## 五、追悼大会会场

4月21日晚回到胡家后，我又乘车分送明天追悼大会的出席证，一直忙到深夜。这一夜没有回家，而是住进了位于厂桥的中直机关招待所（现名金台宾馆）。22日一大早起床，7时30分离开宾馆赶到胡家；8时30分提前到达人民大会堂踏看会场，等待胡家亲属的到来。

这时天安门广场上约有十万人，我和一些记者到大会堂东门前察看并拍照，被警卫所禁止；

于是拟往二楼一试,但到楼梯前被阻,据称,我们所持的记者证只能在大厅内活动。

根据预先安排的时间表,亲属们将于9时15分由家中出发,进入大会堂北门,在台湾厅休息。他们在9时25分抵达后,我带领的摄制组即被允许进入台湾厅拍摄。厅内除李昭夫人及儿孙们,尚有耀邦的长兄胡耀福一家,姻亲安子文、王幼平家成员以及表弟杨勇的遗孀林彬女士等。

9时45分左右,李昭夫人率亲属前往中央大厅。起身时她大声告诫子孙们:“念悼词的时候,谁也不许哭!”这是一种自重和自律。

我随亲属们步入中央大厅,他们在耀邦遗体的南侧分排站立,并特别安排了两位临时护士搀扶照顾李昭夫人。事后有人说,其中之一是曾经服侍过毛泽东的孟锦云。此时出席者已经陆续进入大厅,前排重要人物站立的位置,地毯上均有白布条标志。9时55分,邓小平、赵紫阳、杨尚昆等政要进入会场,一时镁光闪烁。我以家属友人身份兼做记者,故受到特别照顾,被警卫安排在水晶棺北侧的大柱前,距邓、赵等要人近在咫尺,挎着三台相机轮番抢拍。

10时整,追悼大会开始。杨尚昆任大会司仪,接下来由赵紫阳致悼词。我特别注意到,对胡耀邦仍没有冠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个最高头衔,却用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的一生是光辉的”这样一句;对于他在1987年下台之事,则用“自己错了,勇于自我批评”一句;末了,“化悲痛为力量”被念成了“化悲愤为力量”。

得益于位置便利,我有幸近距离观察到,诸位重要人物大多面无表情,倒是党外人士不大掩饰,周谷城不断地摘下墨镜拭泪。

这里面最值得记述的是邓小平。今天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他身着黑色中山服,皮肤黝黑,头发似乎刚刚染过,没有一丝白发,显得比平时年轻。

悼词念完,默哀毕,邓小平欠身致礼。开始奏《国际歌》时,邓以一种轻快的步履迈出了第一步,用步距很小、频率很快的“小碎步”向灵柩和亲属走去。

此刻,我已转到亲属一侧抢拍镜头。为争抢

到邓小平与李昭握手的画面,两位记者发生了争吵,这是以往同类场合从未发生过的,以致李昭不得不大声喊道:“不要吵!不要吵!”人们依次上前与亲属握手或拥抱,不少人潸然泪下甚至痛哭失声。当邓夫人卓琳上前与李昭握手并请她保重身体时,李昭说:“小平同志也要多保重,人总是要死的,这是规律。”

党政要人们渐渐走过去了,但志哀的人群依然川流不息。这时有人宣布:为避免家属过于劳累,除特殊情况外,不再安排悼念者与家属握手。李昭夫人随即举起双手向大家致意,两旁的护士几次想让李昭放下手,但她仍坚持着举手不肯放下。

此刻我发现一位有特殊意义的人物——邓力群,正向这边走来。他走到水晶棺西侧向躺在里面的政治宿敌欠了一下身,用一种犹豫的目光向亲属方向张望了一下,最终不好意思上前,走开了。我赶紧按动快门,连拍两张。脑子里萦回起两天前于光远在座谈会上的话:“我真怀疑有人和耀邦就那么一贯有友情!?对一个活着的人尚且不能侮辱,死者能侮辱吗!?”

告别的人流走了一个多小时,我开始在大厅内随意走动,遇到熟人就给他们拍照留念。亲属们在念悼词时没有哭,此时却有不少人泣不成声;追悼大会结束时,胡耀福走到水晶棺前,双腿不由自主地跪下,向弟弟告别。孙儿霁光向慈爱的爷爷献上了一条红领巾,爷爷手中还握着孙女知鸢的一条小手帕……李昭夫人在护士的搀扶下离开大厅,与亲属们一起到台湾厅稍事休息。

此时移灵路线仍有麻烦:家属要求出人民大会堂东门,向广场上数以万计的悼念群众集体鞠躬,这一请求未能获准;过去遇有此类悼念活动,灵车应绕行广场一周,这一成规也被取消,据称皆出自安全考虑。

时近正午,耀邦的遗体被从水晶棺中移出,置入有机玻璃灵柩内,在哀乐声中起灵。在此瞬间,一直强忍着悲痛的李昭,泪水夺眶而出:“你是人民的儿子……”,后面的话已经被哭声吞没了。灵柩在礼兵的护送下,沿着长长的地毯通道抬出大会堂西南门。我看了一下表,时针指着12时04分。



## 六、送灵归来

长蛇般的送灵车队开出人民大会堂，沿长安街向西驶去。一过新华门警戒区线，汹涌的人潮便从大道两侧扑向车队。解放军官兵手挽手组成的人墙，不时被人群冲破，车队不得不在狭窄的通道中缓慢行驶。1976年周恩来逝世，数十万群众肃立在十里长街两侧，压抑着悲痛默默为他送行。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却是数十万情绪激越的群众，在十里长街上毫无掩饰地宣泄他们的悲愤，这是以往从未有过的历史场面。人们扶老携幼为这位忠厚长者送行，道路两侧的楼窗口，地铁车站的平顶上，乃至建筑物的脚手架上，都站着送行的人群。一位妇女将小女儿高高托起，牵着孩子的手向车队挥动。

车队在汹涌的人潮中多次被阻。亲属乘坐的空调面包车，车窗是固定的，无法打开，激动的群众涌上来拍打着车身，哭声、呼喊声强烈地震撼着我们的心。此时我的感情再也无法抑制，任凭泪水在面颊上流淌。我所乘坐的摄影车窗子可以打开，人们喊着“耀邦不死”、“请多保重”，纷纷将手伸进车窗与我们相握。一路上不知握了多少次手。

临时调来的机动部队，一路上左冲右突，驱散人群，车队才得以一段一段地夺路而行，缓缓驶向市郊。过了五棵松，人群开始稀少，车速逐渐加快，转瞬间已进入松柏掩翠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大门。此时已是下午1时11分，这段平时只需20多分钟的车程，竟走了一个多小时。

遗体即将在此火化。火化前将给遗体做两份石膏面模，一份由国家档案馆保存，一份交家属珍藏。李昭在子女搀扶下来到告别室。向耀邦作最后的诀别，她泣不成声地说：“耀邦，你走完了人生最后一个里程。现在我们为你送行。你走过多少大好河山，为了你所忠诚的事业，为了你为之奋斗的决心。你与祖国同在，你与青山共存……”诀别之后，李昭、胡耀福、小女李恒、长媳安黎等带领胡家第三代的孩子们离开了八宝山，留下德平、刘湖、德华等以及耀邦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我们这几位年轻朋友。

石膏模完成后，又为遗体作了最后一次整容，永别的时刻到了。孩子们依次走向遗体，亲

吻慈爱的父亲，接下来是跟随耀邦多年的老秘书、工作人员。我不停地按动快门，拍下这震撼人心的镜头。此刻，德平走到我面前，接过我手中的相机，轻轻说道：“去告个别吧！”我含泪走到遗体前，庄严鞠躬，轻吻他冰凉的额头，默念：“耀邦叔叔，请您安息吧！”

白色的小车缓缓推向火化炉，沉重的炉门打开了，孩子们哽咽着为父亲最后一次梳头之后，白布被单遮住了逝者的面容。但谁也不忍心让他马上离去，对亲人的强烈依恋令子女们重新打开被单，最后一次瞻仰遗容。德平用一种平静而坚定的语气说：“爸爸还是很安详的。”被单再度盖上之前，我抢拍了最后一张照片。事后我从多张照片的顺序中，确认这是耀邦的最后遗容。

小车徐徐推入巨大的火化炉，炉门关上之前，我最后一次拍摄了遗体。时针指向下午3时，在一片抽泣声中，沉重的炉门最终关闭，这位辛劳一世的慈爱长者，最终永远地离开了他热爱的人们，进入宇宙的大轮回之中……

大家到京西宾馆用餐并稍事休息，然后再度出发迎接骨灰。驶近树木葱茏的八宝山，远远望见火葬场的高烟囱仍有白烟徐徐飘出，想到我即将将见的场景，心情又一下子凝重起来。

炉门再度打开，铺有耐火材料的小车从炉内慢慢退出。不见了逝者的笑容和身影，映入眼帘的是一簇洁白炙热的骨灰，这就是一位伟人的归宿。人们的神经继续忍受着情感的冲击，身旁一位小姑娘承受不了这样的刺激，闭上眼喃喃地说：“太惨了！”

接下来须将骨灰殓入红绸制成的骨灰袋，德平和弟弟们在骨灰中寻找着什么，原来是想找到耀邦在长征途中于娄山关之役所中的弹片。或许是因为年代久远或炉温过高，弹片已不复存在；唯一尚能辨识的物品，是两支已在高温下变了形的铅笔芯，耀邦有随身携带铅笔批注文件的习惯，这是一位工作人员昨天特地放在老首长西装口袋里的。

骨灰袋被装入一只有梅、龙图案的骨灰盒，在告别厅举行简单的仪式之后，德平手捧骨灰盒，在宋平、温家宝及亲属、工作人员的护送下步出大厅。自4月8日在政治局会议上发病住院迄今，离家14天的耀邦即将回家。

车队沿宽阔的大街疾驶,已经看不到汹涌的人潮,但仍不断有人在路旁肃立致敬或挥手致意。

转瞬间,车队驶入新华门,沿中南海东岸行驶,驶近胡家宅院时,警卫战士已在道路两旁列队迎接前任总书记的骨灰,胡夫人李昭站在宅门台阶上守望,等候老伴归来。

骨灰移入灵堂后,被安放在鲜花丛中。李昭肃立灵前,率子孙举行家祭。她向共同生活了40年的耀邦倾诉心声:

耀邦:你和我们永别了,尽管我觉得你还和往日一样,同我在一起一个东边一个西边地看书,你却走完了自己革命的历程,到了你应该去的地方。前几天,孩子们在我面前不敢哭,我对他们说,你们找个地方放声哭吧,哭了,可以抒发胸中的郁闷,哭了,心里就可以平静些了。

耀邦,你光明磊落,无私无愧,你是一个无愧的共产党员。你活着想着人民,你死了人民想念你,人民同你一起喜怒哀乐。人民这几天都在悼念你,送你的灵车时你看见了吧,人流似水三十里,天涯何处不招魂!人民同你的心是相通的,我看到了人民对你的怀念,我很受感动,我感到安慰。假如你有灵的话,我想你也会含笑九泉……

你得到了多少人民的眼泪呀!灵车到处肝肠断,无限哀思悼忠魂。人民事业人民爱,革命自有后来人(失声痛哭)。你死了不能复生,这是自然规律,但是,人民会永远怀念你的……

有人说,你是火炬,有人说,你是红烛。我说,红烛伴随红泪尽,留得余辉照人间,你人死了,精神不死,你的理想一定能为人民群众接受。人生自古谁无死,忠魂丹心慰后人,你的忠魂丹心路人皆知,你的余辉和宏伟遗愿同照人间。人民对你的无限悲痛,人民对你的真诚哀思,将化为巨大的力量。他们会记着你的音容笑貌,记着你的忠实理想和你从事的宏伟事业,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好好劳动,为我们的国家、民族振兴出力!

耀邦,你是农民的儿子,还应该回到祖国母亲大地的怀抱。党中央已经同意我给你的安排了,你会高兴的。我们将把你送到江西共青城垦殖场。那里木已成林,人已成材,荒滩已逐渐成为现代化的小城镇。古代将领出征时常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我们也说,青山

处处埋忠骨,何必都进八宝山呢?让你同那里的青山、红梅和坚强的共青人一起存在。

你的理想同你种的树和草一样,都在茁壮成长,都会结出丰满的人民需要的果实,你会在青山绿树丛中长存,我们一家感到安慰,你也会含笑九泉……你的灵魂会保佑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的。

耀邦,我对孩子们说,党的事业,你爸爸的榜样,让你妈妈懂得了自立、自重、自爱、自强。你常说,革命伴侣岂需朝朝暮暮,年轻夫妻为理想比赛、共勉;对家庭的感情淡淡的——来日方长,对党的感情浓浓的——人生有限。你的少年壮志,终生力行,对我教育至深。我没有辜负你,我是你无愧的妻子。我教育我们的孩子,你们要无愧地工作,勤奋地学习,健康地前进,不准走歪一步,要无愧于这个家庭,无愧于做耀邦的子孙。

悲痛四月送君去,家庭五月新长征。新长征是你在科学院提出的。五月一日以后就得工作了,我们的孩子都要记住,努力工作就是对你最好的悼念。

耀邦:

独秀红梅随冬去,  
落絮细雨泣无声,  
人生自古谁无死,  
忠魂丹心慰后人。

耀邦:人民理解你,你安息吧!

1990年根据现场手记整理

2012年4月校订■

(作者为历史学者)

(责任编辑 洪振快)

## 本刊稿件选用标准

一,本刊重点关注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特别关注亲历者的叙述。

二,内容真实可靠,不可有任何虚构。文中重要引语,请注明出处。

三,篇幅不要过长,一般四五千字,长篇最好在八千字之内。

四,原则上—稿—投。如一稿多投请予说明。

五,投稿三个月以上,未接到采用通知,请作者另行处理。作者请自留底稿,本刊无力退稿。

本刊社址: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本刊电话:010-68534879

传真:010-68532569

编辑部邮箱:yanhcq@sina.com

yanhcq@gmail.com



# 我奉命封杀贺绿汀文章

○ 陈清泉

1990年10月,中共上海市委的一位负责同志交给我一个任务——找贺绿汀同志谈心,希望他不要坚持在一个音乐刊物上发表他在音乐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稿改写的文章。而且叮嘱我:这个工作要做得不温不火,恰到好处,千万不要引起贺老的反感。

事情的起因是:由于身体原因,贺老未能应邀参加中国音协的“音乐思想座谈会”,他草拟了一个书面发言稿(见右栏插图),请李焕之代为宣读。后来,他又将这个发言加以充实寄给了《音乐艺术》杂志。该刊编辑部认真研读了他的文章后,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公开发表这篇文章可能影响音乐界的团结,便将这一情况反映给主管单

位中国音乐家协会,音协又请示了中国文联,最后由中央有关部门发文同意文联党组及音协分党组关于“不宜公开发表贺绿汀同志发言”的意见。这样,需要请上海方面做做贺老的工作。于是这个任务便理所当然地落到担任着上海文联党组书记和主持主席团工作的我的头上。

我十分清楚,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差使”。贺老是一个十分倔强的人,又是一位老革命,他会听我这个“后生小子”的劝告吗?但我调来文联后,曾与他有过几次接触并进行过推心置腹的谈话,彼此印象不错,这又使我增强了与他商量妥善处理此事的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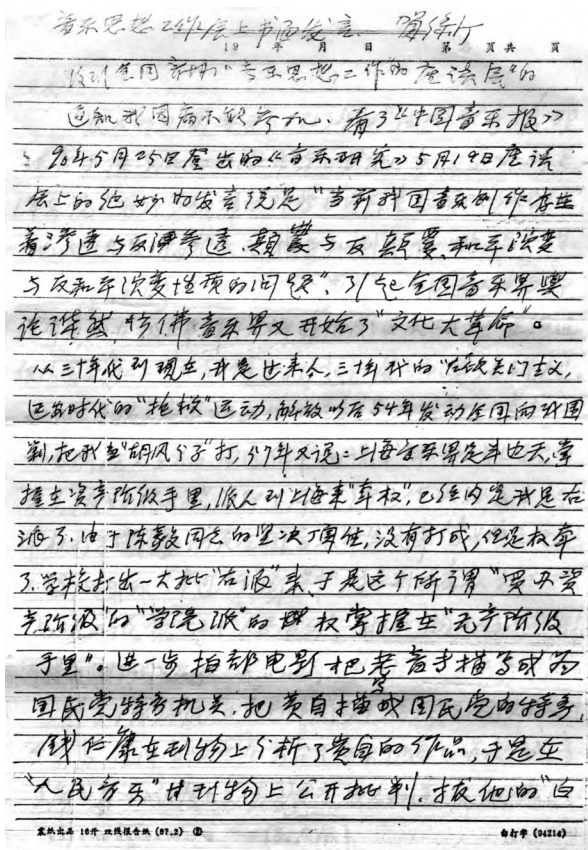
我知道,要在这个问题上和他进行对话并获得成功,必须找到很有说服力的理由。我反复地研读他的文章,被他的坦率、真诚以及他反对“左”倾思潮的那股激情所感动,也从字里行间找他的“软肋”,以便说服他,让他打消发表这篇文章的念头。终于,我将我的“说词”的腹稿打好了。

我在电话中约他见面,问他哪一天有空?他回答得很爽快:“我天天有空,你什么时候来先打个电话给我。”于是在一天的上午,我来到贺府,这大概已是第三或第四次了吧。

坐定以后,我先向他汇报了近来的工作情况,他听了以后显得特别高兴,对我说:“我说得对吧?你是可以胜任这个工作的。”这句话是针对我第一次拜谒他时,曾流露过对能否做好文联工作有些信心不足而言的。

我见他情绪不错,便抓住了机会问道:“听说您在音乐座谈会上有一个书面发言,内容很精彩。”

他说:“对,我已改成一篇文章。”接着就滔滔不绝的给我介绍他文章的内容。其中重点介绍了历史上“左”倾思潮横行让他身受其害的部分内容。最后他说:“现在音乐界的一些人提出,在



贺绿汀在音乐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稿原稿

音乐创作中存在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岂不是又要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所以,一定要告诫人们,可不能再把政治与艺术混在一起了。音乐创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像创作思想、创作倾向的问题,当然不能听之任之,该抓的还是要抓,但一定要按照‘双百’方针,发扬学术民主,自由讨论,达到明辨是非。我们千万不能把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精神世界的问题、艺术是非的问题上纲上线,说成是‘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

这些话,与他文章中写出来的话几乎一字不差,这说明,这些话是他思考良久,从心底深处喷吐出来的,表明了他对“左”的思潮是彻底划清了界限的,不由你不在心中产生钦敬之情。但我的工作还是要做呀,他的畅所欲言所造成的氛围已给了我适时进行工作的机会,便问道:“中央曾经给省、军级党组织发过一个电报,不知您看到过吗?”

他问我:“什么内容?”

我告诉他,电文大意是:“在国际斗争中,对我搞渗透、颠覆、和平演变的反动势力依然存在,我们必须进行这方面的斗争。”我见他在注意听我的话,便接着说:“我很钦佩您不遗余力地反对‘左’的倾向,这种精神是必须发扬的。只有超过常人胆识的人,才敢于站在反‘左’的前列。但是您把反‘左’与反渗透、反颠覆、反和平演变联系在一起,这就有与中央精神不够协调之嫌,难怪人家对发表这篇文章感到为难。”

他仍然没有说话,我就接着说:“您对某些人进行了不点名或点名的批评,这可能引起不必要的纷争,人家还可以拿您的文章与中央精神不相吻合的地方来说事。特别是您在文章中公开批评了毛泽东,恐怕很难为多数人所接受。您的本意在制止‘左’的倾向,增进音乐界的团结,也许因为这两方面问题的存在反而达不到目的。”

我说了上面的话以后,贺老没有再说什么,只是问:“你们认为,这篇文章不要发表为好?”贺老毕竟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在政治上十分成熟,他在这里不说“你”而是说“你们”,分明已经意识到我这个说客此次前来并非个人行为。我也就顺势而为地说:“贺老,暂时就不忙发表吧。”

他没有再讲什么,我也就“知趣”地告退了。

我不知道他对我说的话接受到什么程度,但从此他再也没有提发表该文的事。据我所知,中国音乐家协会也曾对他做过工作,可能起了更大的作用吧。

时至今日,我反思此事,他比我们早得多地意识到“反渗透……”的精神与反“左”的要求不相吻合,他也可能感到这个提法与改革开放的大形势有明显的不协调。他可能意识到的东西显然符合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神,而我却落在形势的后面了。如果,当时将这篇文章作必要的修改而得到发表的机会,是否也是一个惊世骇俗之举并且对音乐事业的振兴起到一种积极的作用呢?作为一个曾经劝阻他发表此文的人,在回忆起这件事时,不能不感到万分歉疚。

贺老这个人刚正不阿,在任何恶势力面前,他就像一块钢,任凭风吹浪打、地动山摇,他都巍然屹立,从未低下他那高贵的头。

但是,这篇22年前贺老的呕心沥血之作,竟因我们的缘故而湮没在人间。不,应该让它重新面世,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位杰出的艺术大师,是怎样地用自己毕生的努力,在和“左”的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抗争!如果,这篇文章能够发表的话,也许可以弥补我过去劝阻他不发表这篇文章的缺憾和失误。

### 附： 在中国音协音乐思想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

贺绿汀

收到“全国音乐思想座谈会”的通知。我因为年纪老了,又有病,不能参加会议,只好写篇书面发言,请李焕之同志代我向会议代表宣读一下。

《中国音乐报》1990年5月25日刊登的《音乐研究》编辑部5月19日举行的座谈会上的一位措辞“尖锐”的绝妙发言,说是“当前我国音乐创作存在着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性质的问题”,引起全国音乐界舆论哗然,仿佛音乐界又要搞“文化大革命”了。

这种调子唱得如此之高的发言,如果代表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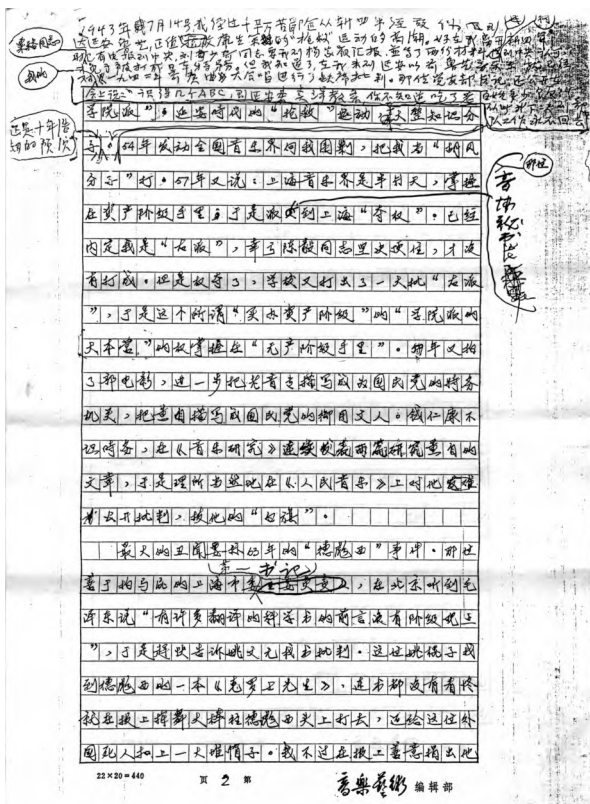


人,那么“人各有志”,反正是“百家争鸣”,也算“一家之言”嘛,但是如果作为一种舆论导向,就不能等闲视之了。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从30年代到现在,我是过来人。30年代的“左”倾关门主义,大反“学院派”。延安时代的“抢救”运动,大整知识分子,正是十年浩劫的预演。

1943年7月14日,我经过千辛万苦冒险从新四军经敌伪区到达延安鲁艺,正值康生策划的“抢救”运动的高潮。好在我离开新四军时,粟裕同志已有电报到中央,刘少奇同志要我到杨家岭汇报,并写了两份材料,得到中央认可,才免于被打成日本特务。但我知道了,在我未到延安以前,鲁艺音乐系就已经对我的《一九四二年前奏曲》大合唱进行了缺席批判。那位党支部书记,还公开在会上说:“识得几个ABC,到延安来卖洋教条,你不知道吃了老百姓多少饭?”从此我下决心到部队工作,永不回去。54年发动全国音乐界向我围剿,把我当“胡风分子”打。57年又说:上海音乐界是半升天,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于是派那位音协秘书长到上海“夺权”。已经内定我是“右派”,幸亏陈毅同志坚决顶住,才没有打成。但是权夺了,学校又打出了一大批“右派”,于是这个所谓“买办资产阶级”的“学院派的大本营”的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59年又拍了部电影,进一步把老音专描写成为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把黄自描写成国民党的御用文人。钱仁康不识时务,在《音乐研究》连续发表两篇研究黄自的文章,于是理所当然地在《人民音乐》上对他公开批判,拔他的“白旗”。

最大的丑闻要算63年的“德彪西”事件。那位善于拍马屁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在北京听到毛泽东说“有许多翻译的科学书的前言没有阶级观点”,于是赶快告诉姚文元找书批判。这位姚棍子找到德彪西的一本《克罗士先生》,连书都没有看懂就在报上挥舞大棒往德彪西头上打去,还给这位外国死人扣上一大堆帽子。我不过在报上善意揭出他的错误——不要“好读书,不求甚解,望文生义”,这位第一书记就说:“贺绿汀自己跳出来了,很好,很好!”当即命令那位北京来的夺权打手动员音乐界写文章替姚文元抱大腿,对我的文章进行围剿。批判文章从《文汇报》《光明



根据座谈会书面发言稿改写的文稿

日报》最后到《人民音乐》,连篇累牍地出笼,一时沸沸扬扬,好不热闹。可惜真正错了的确实是姚文元,他没有把书看懂,只好“无疾而终”。

到了63年底,正是毛泽东的“两个批示”出来之后,文艺界十分紧张。中国音协在北京召开的音乐舞蹈工作会议上,音协主席对我特别抬举,一再在小组会上动员我到大会上去发言。当时我虽然不知道底细,但是已经预感到空气很不对,又想把我抛出来当他们的替罪羊,我坚决不干。后来这位主席在大会发言中说:“我们学外国只能学贝多芬,不能学德彪西”;那位夺权打手则在大会上大谈其批判“打标西”的功劳。最后抛我的事没有搞成,反而被我抓住他们讲话中“两个老虎”的辫子数落。十年浩劫开始,林、江反革命集团以极“左”面貌出现,打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喊起“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大搞其反马克思主义的封建法西斯专政,说:上海音乐学院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大本营,张春桥还亲自叫喊63年“德彪西事件”是“贺绿汀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最大的反革命事件”,又再把我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戴上无数反革命、特

务、叛徒的铁帽子，关进监狱，对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上海音乐学院在这场浩劫中被迫害致死20多人。那位夺权打手开始是“抛”我的负责人，后来他自己也进了“牛棚”，摇身一变又投靠造反派。一次我的老伴在学校大楼前面扫地，我向她要几块钱订报纸，那位夺权打手居然马上去报告造反派头头说：“我亲眼看见贺绿汀和他老婆在搞反革命串联”。可叹“四人帮”打倒以后，此人摇身一变，又钻进上海文联当“副主席”。这就是风流人物代代红的客观事实。

现在有人又提出音乐创作上也存在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性质的问题，实际上是把艺术与政治混在一起，又重新搞从30年代开始，音乐界极“左”派排他性的宗派主义与庸俗社会学那一套。但是给音乐工作者扣帽子、打棍子的故技，是不得人心的，是严重违反目前党中央的政策。

我对于“新潮”音乐和流行音乐并不欢喜，对于其中一些强调只表现自我和格调不高、趣味庸俗的作品也很不满意，但是我从来认为这只是艺术的是非问题或者至多是创作思想的问题。我在1954年写的《论音乐的创作与批评》中说过：“现在我想没有人愿意或竟敢于暴露自己歌颂敌人。现在问题顶多不过歌颂自己歌颂得不顶好或走了样。因此也就不能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尽管这些话不久就遭到批判，说我“取消文艺批评的战斗作用”，“文革”开始以后又说我“鼓吹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包庇牛鬼蛇神”，但是我对于今天的作曲界的基本估价也还是没有变；至今我也没有看见哪个作品是在搞颠覆。

不错，当年毛泽东的确讲过“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之类的话，后来康生之流就接过鸡毛当令箭，把小说《刘志丹》、电影《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北国江南》等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后来呢？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些话说得不对嘛！那些被打成“大毒草”和“反党分子”的也都平了反嘛！

毛泽东晚年的确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但是建国以来他还讲了很多正确的意见，1956年“对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正是针对“左”倾排他主义者讲的话，而且实践证明是马克思主义

的普遍真理。1956年，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说：“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该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他又说：“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做结论”，“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奏效，而且非常有害”。四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负责同志也一再强调：不要把有特定含义的政治概念和学术问题混在一起，相提并论。这个意见和毛泽东有关讲话的内容，在精神上显然是一致的。

一些人言必称“毛泽东思想”，口口声声“拥护四中全会决议”，但是在实际行动上却背道而驰，至今还抱住毛泽东的那套早已被实践否定了的“利用小说反党”的理论不放，把明明是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精神世界的问题、艺术是非的问题上升到“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这样一个有特定含义的政治概念问题的纲上，当作敌我矛盾的性质来下结论，这是慎重的态度吗？这叫做“自由讨论”吗？这种搞法究竟对谁有利？企图何在？

对于音乐创作中出现的问题，包括创作思想、创作倾向的问题当然不能熟视无睹，该抓的就要抓，但是只要在政治上没有鼓吹多党制，在经济上没有鼓吹私有制，就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就一定要按照“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学术民主，通过自由讨论来明辨是非、分清曲直，使我们的创作能更健康地得到发展。四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反复重申，抓文艺界的治理整顿是当务之急，而其目的完全在于促进事业上的稳定繁荣。现在一些人在没有任何具体分析，拿不出任何具体证据的情况下，一棍子下去就把音乐创作中的问题不分青红皂白地打成“渗透”、“颠覆”、“和平演变”的性质，难怪有人干脆说：“反正照样拿工资，干嘛要写出作品来让人说是‘搞颠覆’呢？”这和三十年代的宗派主义与庸俗社会学有何分别？对于从事创作的音乐家的积极性，究竟是起了调动的的作用还是抑制打击的作用呢？这种搞法难道能叫做“有利于稳定繁荣”吗？能叫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吗？



# 陶铸是被谁打倒的

○ 阎长贵

陶铸,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他从中南局第一书记的位置上调中央(陶铸1965年1月已任国务院副总理),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陶铸6月1日离穗北上,4日抵京。在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又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在改选中央领导机构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11名常委中排名第四,除了毛泽东、林彪之外,仅次于周恩来,是党内“第四号人物”,可谓位高权重。然而好景不长。仅仅四个多月,到1967年1月4日就被江青、陈伯达等公开点名打倒了。从此文化大革命“打倒刘邓”的口号变成了“打倒刘邓陶”!为什么打倒陶铸?又究竟是怎样打倒的?这件事情迄今已经过去45年了,似乎还没有文章和书籍(和中央文件)完全说清楚,留有重大的“谜”。我不揣冒昧,拟就自己

所知所闻谈谈这个问题。

## 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主要针对谁

首先,在怎样搞文革的问题上,陶铸和毛泽东发生了分歧。

我们知道,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概念,大力开展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这主要是针对谁?是针对刘少奇(和邓小平)吗?这个概念提出是由刘少奇的事引起的没问题,但主要针对谁,却是需要动脑筋思考了。要知道,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就基本靠边站了。刘少奇在回答戚本禹1967年4月1日发表的《卖国主义还是爱国主义?》中的“八个为什么”时明确地说:“在无产阶

现在音乐界有一种现象:不写文章的骂写文章的,不写作品的骂写作品的,因此他永远是“一贯正确”。这种状况是很不正常的。那些不甘寂寞的“初澜”的头目之流,正在蠢蠢欲动地给一些音乐界有权势的宗派主义者抬轿子,拍马屁,充当打手,在报刊上给别人扣帽子,打棍子,难道不怕后代人骂你们吗?

社会主义音乐文化不能依靠这种手段。要依靠广大音乐工作者的创造,真正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批评与自我批评;要依靠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相信群众,面向群众,依靠群众,紧密地和最广大的群众联系在一起。开“一言堂”、搞“家长制”、个人说了算行不通的。《音乐研究》《中国音乐报》是属于全国音乐界的,决不能由少数人垄断。你们既然可以在刊物上、会议上批评别人,别人就有权在刊物上、会议

上反批评。在法律上,被告即使犯了法,都允许他有申辩的权利,何况艺术上的是非问题呢!如果只许你们整人,不许别人反驳,对方至多只有检讨、认罪的“义务”,那就只能说明你们的刊物原来是派性的产物;你们的“座谈会”不过是围攻、批评会的“美称”罢了。

总之一句话,根据我近60年的亲身遭遇和体会,离开了学术民主,所谓“百家争鸣”不过是一句空话。“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希望三思!年轻有为的人起来了,老一辈应该让路了!为了会议开得好,开成真正的“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座谈会,以促进社会主义的音乐创作健康地发展,日益繁荣,我就说这些“杞人”的话。

1990年6月25日 ■

(作者为上海文联原党组书记)

(责任编辑 洪振快)



1966年，陶铸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毛泽东汇报工作

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为什么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看到一篇能够完全说清楚为什么犯错误的文章。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批判了我的错误之后，又有人犯同样性质错误，可是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见，刘少奇非常清楚地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指他（虽然如上所说，由他而起）。那是指谁呢？应该说是指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人对文化大革命的抵触、抵制，而从中央来说，我觉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说得对：“‘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主要是对陶铸。”（见《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656页）

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主要内容就是派工作组的问题。毛用这个问题作为反对刘少奇的口实，恐怕是一个“诱饵”、一个“套”，刘少奇吞食这个“诱饵”、上这个“套”是必然的；因为派工作组这是共产党的传统做法——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毛变了，刘少奇没有理解。而在这个问题上，陶铸是支持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曾志说：陶铸刚赴北京没几天，6月9日就飞杭州参加主席召开的一个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文化大革命派不派工作组的问题。陈伯达提出不要派，少奇、小平等大多数同志主张派，主席最后表态：可

以派工作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陶铸说：“我是主张派工作组的，并且负责派遣工作组的工作。因为派遣工作组，这是多年来的成功经验之一。”（参见《陶铸传》，中央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371页）毛既然设这个“套”、放这个“诱饵”要整刘少奇，他能放过坚决支持刘少奇派工作组的陶铸吗？这是明显的道理。1966年安排庆祝国庆节活动的报道时，陶铸要求所有常委的照片都要见报，发现没有邓小平的镜头，他告诉新华社一定要设法有邓小平的镜头，于是就出现了所谓“换头术”的事情，即把邓小平的头移到别人（陈毅）的身体上。江青、陈伯达说陶铸是“中国最大的

保皇派”。这确实符合事实。

对这件事情即派工作组，也要做分析，派工作组的确是共产党的传统做法，“多年来的成功经验之一”，实际上，在文化大革命中派的工作组采用1957年“反右派”做法，在许多单位“反干扰”、“抓游鱼”等，把许多写大字报的人打成“右派”和反革命。

1966年6月13日，刘少奇在《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和《批转西北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时指出：“当牛鬼蛇神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这件事情，陶铸恐怕是知道和参与了。

很显然，按照刘少奇（和邓小平）派工作组的做法搞文化大革命，刘（邓）要负基本和主要责任，无疑陶铸也不能说一点责任没有。

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怎么回事？这是毛在文革中提出来指导文革的基本概念之一。有人说它是一个伪命题，一点不假。刘少奇（邓小平）指导文革的思想、理论和策略，其实就



是毛在十年前(即1957年5、6月开始)所提出和执行的“反右派”的一套。1957年毛理直气壮地把它称作“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什么在1966年文革中就成了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此一时,彼一时也。毛“与时俱进”,他的政治需要变了,斗争的主要对象转移了,十年前他反的主要是党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十年后,他发动文革,反的不仅是党外更主要的是党内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少奇不明就里(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很不理解”),沿袭陈规,非但得不到毛的认可,反招毛更加不满。

## 二、在工厂和农村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的分歧

陶铸和毛泽东另一个大的分歧,是在工矿企业和农村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

1966年6月30日,刘少奇、邓小平给毛写信并送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草稿)》。刘、邓在信中说:目前文化教育方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展开,如果工矿企业、基本建设单位一齐动起来,领导上顾不过来,容易出错。因此,他们送审通知草稿指出,目前各地党委需要用很大力量领导正在开展的文化教育方面的革命运动,同时也应注意到工矿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必须保证国家任务的特点。中央认为,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包括设计、施工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要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按照“二十三条”的规定,根据各地原来的部署,分期分批地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通知要求,各地党委必须抓革命、促生产,做到革命和生产建设双胜利。7月2日,毛批示:“同意你们的意见,应当迅速将此通知发下去。”(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0页)

陶铸在文革中坚决贯彻执行这个通知的精神。他一直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他亲自为《人民日报》连续写两篇“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他这种做法遭到中央文革小组的非难,说他用生产压革命。这可能也反映了毛的意见。

在要不要把文化大革命扩展到工矿企业和

农村问题上,陶铸的思想和行动同毛发生了尖锐冲突。

关于安亭事件。所谓安亭事件,就是1966年11月10日,王洪文等率领的赴北京告状的1000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成员,在安亭(上海辖区京沪线上的一个小站)受阻后卧轨拦截开往北京的14次特快列车,造成京沪线中断31个多小时的事件。王洪文等卧轨拦车,企图扩大事态,迫使中央解决问题。

事件发生后,陈伯达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做了两件事:一、电告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韩哲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的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派张春桥回沪说服工人。二、致在安亭的上海工人电。电文指出:“你们的这次行动,不单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希望“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又说:中央文革小组派张春桥回沪处理此事。(按:周恩来和陶铸派张春桥去处理此事,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2~133页)张春桥11日深夜乘专机抵沪,与“工总司”负责人接触。他在上海工人座谈会上别出心裁地说:“如果工厂文化大革命不搞,即使导弹上了天,卫星上了天,生产大发展,中国还会变颜色。”13日晚,张春桥给陈伯达打电话:“工总司五条要求(承认组织合法、承认上京告状是革命行动、告状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曹荻秋公开检查、对工总司提供各方面条件)我不能不签字,也来不及请示华东局、上海市委和文革小组,不然车就不能通,他们不肯回上海。”张春桥认为可以签字就签了。(参见《王力反思录》下,第654页;穆欣《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香港新天出版社1997年第二版,第172页)

接着,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也给陈伯达打电话,质问:“第一,文革小组的副组长有没有权力不同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背着华东局、上海市委,直接同工人组织签字,达成协议,反对华东局、上海市委?第二,张春桥眼里还有没有国家法律,党中央的指示、政策?他是不是可以不顾国家法律、不顾党中央的政策,擅自达成违背法律、违背政策的协议?”陈



文革中以“安亭事件”为题材的像章(正反面)

伯达很为难,他只是劝陈丕显:“我的老乡,不要生那么大的气,好好商量,已经签了字,怎么办理再研究。”陈丕显还跟陈伯达说他“也给陶铸报告了”。(见《王力反思录》下,第654~655页)

第二天,即14日,毛到钓鱼台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者有陶铸,文革小组和军队的几个人,但没有刘、邓、朱德、陈云。据王力回忆,毛一开始就拿出宪法念了一段公民权利、集会结社自由的条文,这是针对陈丕显和陶铸的,他们说过工人不能成立全市性组织。这是支持张春桥。毛接着讲了认识论,说先有事实后有政策,张春桥是对的,根据事实改变了过去的政策。过去的政策脱离群众。会上没有人提出不同意见,都是检讨,陶铸也检讨。会后,我把会议结果电话告诉张春桥,他神气起来了。(见《王力反思录》下,第655页)

安亭事件之前,毛就提出工矿企业要搞文化大革命,认为光是学生不行。他要陈伯达起草工厂文化大革命的文件,陈伯达和王力搞了一个《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简称《十二条》),这个《十二条》提出了工厂要搞文革,认为工人群众起来进行文革好得很,其中明白地写道:“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但在安亭事件后,这个《十二条》还是显得落后了。该《十二条》交周恩来、陶铸指示余秋里、谷牧召开工交座谈会征求意见。谈了20天,却普遍认为《十二条》“左”,他们说《十二条》总的精神不对。在这种情况下和这种基础上,座谈会《十二条》进行了大量修改,实际上基本否定了,他们又搞了与之相对的《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即《十五条》),——对这个《十五条》,周恩来,和直接指导座谈会的陶铸是很赞同的。而中央文革小组不

满意。陈伯达把谷牧叫来,对他大发雷霆:“反正我们写文章的,无权无势,小小老百姓,谁也瞧不起。过去邓小平瞧不起,现在你们也瞧不起,你们有本事啊!把我们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了!”(见《劫后长忆》第175页)毛泽东对谷牧等搞的《十五条》更不高兴,“叫他们重写”(见《王力反思录》下,第661页)。毛叫陈伯达、王力搞了一个新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简称《工业十条》)。

在这里,需要着重指出,周恩来和陶铸并不是反对在工矿企业搞文化大革命,但他们认为在工矿企业搞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慎重,要有步骤,要“抓革命、促生产”,千万不能影响和妨碍生产——这是他们最担心的。在工矿企业搞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周恩来和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和毛有明显和尖锐分歧。

毛指示林彪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工交座谈会问题。1966年12月4、5、6日下午,在林彪主持下连续召开三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听取谷牧关于工交座谈会情况的汇报,讨论通过《工业十条》。在这三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除了围攻谷牧外,就是批判陶铸。

在12月6日会议上,对陶铸进行了严厉批判。王力等人指责和攻击陶铸用生产压革命。陶铸作了检查。他说:“工业农业文化大革命问题,我要负主要责任。坚持老框框……还是结合‘四清’来搞,怕乱了生产。写了‘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陶铸还谈到他主张不搞全市性的工人组织,不赞成工人离厂串连,同意《十五条》的某些观点。他说,这一切都由于“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他进而指出:“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各省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中央工作会议也没有完全解决。各省的抵触情绪很大,思想还不通,在许多方面还有怀疑情绪。”他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拿我这样一个例子来批判,来教育各地,我看很好。”

林彪作了总结讲话。他说,实质不是谷牧的问题,而是陶铸的问题,是书记处的负责人坚持一些错误观点,现在本人也作了检讨。他说工交座谈会开得不好,是错误的,同毛主席思想对立的,坚持旧的一套。在整个工交战线,刘邓的影响不但是50天的问题,而且整个17年都影响很



大。要让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参见《王力反思录》下,第664~665页;《劫后长忆》第179页)

林彪讲话显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和传达了毛的意图。

12月9日毛批准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这个文件的下达,使文化大革命正式扩大到全国工交财贸各部门。与此同时,中央文革还搞了一个《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这个文件12月15日由中央发布。这样,在1966年12月,毛泽东和中央就把文化大革命扩展到工矿企业和广大农村中去了。

毛具有挑战和应战的性格,越是遇到阻力,越是要以更大的力量冲破阻力。十年文革史反复表明,不论是谁挑战文革,毛都绝对不容。他不断创造和提出新概念,花样和手段也经常翻新。为了把文化大革命扩大到工厂和农村,毛在1966年12月26日特地举办了一次生日家宴。被邀参加的有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江青也在场),而没有林彪、周恩来、陶铸、康生。在家宴上,毛讲了一大篇话,主要内容有: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这种较量从夺取政权开始就存在。……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见《王力反思录》下,第693~695页)吃饭时,毛举杯祝酒:“为全国全面内战干杯!”——“全国全面内战”,这是一个骇人听闻的一个新概念;文革后,关锋告诉我,在毛生日家宴上听到他这样讲,都怔住了,觉得很不好理解。

关锋和王力根据毛生日家宴讲话精神起草了《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们把毛说的“全国全面内战”修正成了“全国全面阶级斗争”,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展开全国

全面的阶级斗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篇起了开辟文化大革命新阶段作用的元旦社论,无疑也是经过毛审阅的。

人们看到,毛这次生日家宴简直比一次中央会议还重要!就是在这里,毛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开展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最高指示!《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中说道:“这样的重大决断,只是由他个人来决定和宣布。”(见第1462页)这确实是毛把自己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一次突出表现。

此时,即到1966年12月底,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半年多了。在此以前,文化大革命主要在党政机关和文教部门进行。毛所以要提出“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就是要突破这个范围,向工矿企业和农村更广阔的领域推进,即“要让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林彪语)。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他希望的“天下大乱”。说得文明点,就是所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967年元旦社论的号召,针对性很强。社论说:“一切抵制在工矿企业和农村中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论调,都是错误的。”“工矿企业和农村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一切阻挡这个潮流的论调,一切阻挡这个潮流的人,都将被革命群众送到垃圾堆里去。”这两段话,显然不是空穴来风,不是无的放矢。那是指何人?当然是指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有抵触情绪的从上到下的广大的各级领导干部,具体和直接针对的,就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和还没有被公开宣布打倒的陶铸。据社论起草人之一的王力回忆,毛说:“我同陶铸争论的实质就是这个。”(见《王力反思录》下,第696~697页)王力还说:“工厂、农村文化大革命的两个指示,在毛主席看来就是当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键问题。他认为文化大革命如果停留在学生和文化团体中搞,就要半途而废。走资派的经济基础和根子就挖不深,反修防修、防复辟就解决不了。他认为两条路线斗争的中心就是这个问题。加上这时各省文化大革命搞不下去,是有人抵制文化大革命,是两条路线斗争在继续。他认为错误路线的代表是陶铸。因此,他对陶铸的问题抓得很紧,把它作为中心。”(见《王力反思录》下,第684~685页)

### 三、谁是打倒陶铸的决策者？

有人说：“陶铸是受江青等人的陷害被打倒的，毛偏信了江青等对他的诬陷……”我认为，在打倒陶铸中，江青是不折不扣名副其实的干将和急先锋，但她不是决策者。

按照曾志的说法，从1967年1月4日起，“打倒陶铸”的传单四处散发，满脑子装满了文化大革命、视文化大革命为命根子的毛三、四天都不知道吗？请看，他1月8日对陶铸的说法。这天，毛在中央会议上说：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不老实。当时问陶铸怎么样？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刘邓路线，在接见红卫兵时，在报纸上和电视上都有刘邓的照片，这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要这个部那个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也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可是红卫兵一起来就管住了。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你们也没有解决，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见《大动乱的年代》，第154~155页）据王力回忆：“我记得毛主席还说过一句话：‘希望你们能开会把陶铸揪出来才好呢！’”（见《王力反思录》下，第678页）——这不是说明毛要打倒陶铸吗？这不是他公开批准陈伯达、江青等1月4日的行动吗？能够说打倒陶铸不是他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

历史常有小插曲。对毛关于陶铸的这个讲话也是如此。陶铸夫人曾志看到毛这个讲话，说：“我不相信主席说陶铸‘不老实’，是不是将‘不老成’误为‘不老实’？于是写了封信给主席。主席阅后用铅笔在‘不老实’这三个字的下面画了一横杠，并打上了一个‘？’。这封信后来退还给了我。”（见《陶铸传》，第370~371页）毛泽东在“不老实”下面画一横杠，并打上一个“？”，这是什么意思？非常难解。其玄机，高深莫测！这是不是毛反问曾志：“……你说呢？”居然还把这封信退给曾志，这使本人作何感想？曾志和毛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是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在这里，毛是不是做得太绝了！

顺便说一下，对这个问题，亲自参加在毛那里开会的王力证明：“我记得（毛）说很不老实……曾志回忆说毛主席不会说陶铸‘不老实’，

可能是说‘不老成’……”（见《王力反思录》下，第678页）和曾志不同，她女儿陶斯亮2012年4月3日给我的信中认可毛说陶铸“不老实”，她说：“……在给陶铸罗织的所有罪名中，只有一条是不冤枉他的，那就是‘形左实右’。这点毛已有看法，而文革证实了陶铸的确是‘不老实’，不可靠的。”

我们还是撇开这个小插曲，着重谈谈毛对打倒陶铸的态度。

陶铸究竟是谁打倒的？到现在为止，还只有一个人即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最早公开说并形诸文字：陶铸是毛主席打倒的。他说：“直到现在（他的书是2001年出版的），谷牧的回忆录中，还不知道毛主席的态度，好像毛主席还支持他们似的，他们到现在还认为陶铸不是毛主席打倒的，曾志也这样说。”（见《王力反思录》下，第658页；所说“谷牧回忆录”显然不是2009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谷牧回忆录》，可能是2000年前发表的单篇文章；就是在《谷牧回忆录》中讲的仍然是“好像毛主席还支持他们似的”，见该书第218页）

我认为，如果不“因人废言”的话，应该承认和确认王力（他是打倒陶铸的当事人和亲历者，也正是在打倒陶铸之后，他成为宣传口的总管）的说法完全符合事实。这符合事实，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陶铸确实是毛打倒的，这是历史的真相；因为除了毛，没有人（如林彪、周恩来）要打倒陶铸，也没有人能够打倒陶铸。吴法宪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过这样的话：打倒刘邓这样的高级领导人那是毛的决定，莫说我们（指他和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就是陈伯达、康生、江青也不是说了算的。我看吴法宪说的也是真话和实话。所谓符合事实，再就是，连睿智智慧的老革命家而又心知肚明的陶铸夫人曾志都不说、都不点出这一点，即不指明打倒陶铸的真相，遑论他人——这恐怕就是党文化和党的教育以及党的纪律和党的某种需要所使然的了。

王力说：1967年1月4日，“江青叫陈伯达把陶铸问题公开宣布”。“打倒陶铸不是突然的，而这个公开宣布是突然的。”陈伯达在这天接见湖北省揪王任重代表团的会上说：“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是有关系的，他想洗刷这一点，但洗



刷不掉。后来又变本加厉！比如你们到中南局去，你们了解了很多情况，的确是有后台的！他在北京接见你们（指12月30日的接见）那个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他是文革小组顾问，但对文化大革命问题，从来未跟我们小组商量过（江青插话：他独断专行！），是的，他独断专行。他不但背着文革小组，而且背着中央。陈伯达说你们揭露陶铸，揭得很好，这是给我们的支持。”（见《王力反思录》下，第677~678页；又见叶永烈《陈伯达传》下，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18~519页）

实话实说，陶铸并不是到1967年1月4日才打倒的，他在1966年的12月中下旬已经靠边站了，甚至政治局常委开会都没有他了。王力说：“一九六六年底，十二月份，剩下的常委（指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就是这种状况。此外，刘、邓已经不能容忍了，陶铸也不能容忍，在毛主席心目中陶铸和彭真一样。”王力还说：“陶铸问题在群众中公开宣布，公开地打倒陶铸，发生在这一天，即1月4日。但陶铸实际上被打倒，不是1月4日，而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央开了政治局生活会，他已经不能工作了。打倒陶铸是不是违背毛主席的意图呢？不违背，也是他的意见……”（见《王力反思录》下，第711、714、778页）

如前所说，毛在1月8日中央会议上的讲话是实际批准了陈伯达、江青1月4日所采取的公开宣布打倒陶铸的行动的。而到2月10日，毛的说法又变了。他在这天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批评陈伯达和江青公开宣布打倒陶铸的行动。对陈伯达说：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过去你在我和刘少奇之间进行投机，不是你个人的事，你从来不找我。又对江青说：你眼里只有一个人，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公开宣布打倒陶铸的事就是你们二人搞的。毛指示中央文革小组开一个批评陈伯达、江青的会。可是毛又说，文化革命小组，百分之九十九是对的……不能拆你们的台。谁反对你们，我要反对他。（见《大动乱的年代》，第155页；该书把2月10日误为2月6日）

也许有人认为，这是毛不同意陈伯达、江青公开打倒陶铸的根据。这样说，显然不能服人。请看，毛这天的说法有一丝一毫不同意打倒陶铸的意思吗？我看没有。如果有，毛为什么不叫陶铸以他原来的地位和职务继续工作？当时，毛乾

纲独断，他的话，可是“一言九鼎”，用林彪的话说：“一句顶一万句”。不错，毛对陈伯达说：“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这个指责是一个假命题。不论从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讲，还是从实际讲，一个“五号人物”打倒“四号人物”都是不可能的。就从毛这天的谈话中也明白地表现出这一点。中央文革小组的正副组长（陈伯达、江青）公开宣布打倒一个名列第四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这是毛亲自任命的），这是不是中央文革小组犯的一个不可饶恕的绝大错误？可是毛说：“文化革命小组，百分之九十九是对的，不能拆你们的台。谁反对你们，我要反对他”，他这个说法不可用在打倒陶铸的问题上，我看毛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在打倒陶铸问题上文化革命小组百分之一的错是什么？可能在公开宣布打倒陶铸的时间和方式上，或许有不妥，即有毛不满意的地方。

照我看，打倒陶铸的过程和情况，大致说来，就是这样。

毛在打倒彭真时曾大言不惭地说过，打倒刘少奇时也大言不惭地说过（大意）：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动小手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晚年在中国共产党内确有这样的地位和权威——中国几千年专制社会皇帝的地位和权威。证明这点，打倒陶铸也是实例。擢升陶铸，打倒陶铸，都是毛一句话。陶铸这样一位高级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不经过任何正式的中央会议，也没有下达中央文件，就蛮横地被打倒了。从1967年2月10日，毛在打倒陶铸的问题上，“批评”陈伯达、江青起，一直到陶铸1969年11月30日被迫害致死，他没有再说过什么话。这表明陶铸在毛心里和眼里已经没有任何地位了。■

（作者为《求是》杂志社编审）

（责任编辑 洪振快）

## 本刊声明

为保护本刊和作者权益，凡转载本刊文章，请注明“转自《炎黄春秋》”。

# 警惕文革元素的复活

○ 郭道晖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会上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他两次提到“决议”，强调：“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我认为温总理警告文革还有可能“重新发生”，绝非危言耸听。当然，历史条件不同，当前全面复辟文革的可能性不大；但文革的某些元素则事实上已在复活。这种事例几乎俯拾即是，只是我们习以为常，不以为意而已。

## 文革幽灵还在游荡

文革发生的基本特征，最显著的是中国特色的文革思维与制度：一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质上是以阶级斗争包装起来的“以人为敌”（而不是真正“以人为本”）；二是迷信领袖的绝对权威，实质上是维护当政者个人的绝对专制；三是无法无天，踢开宪法，以党治国；四是以群治包装人治，运动治国。这可以说是文革的四要素。四者在文革后虽有所收敛，但其基本思维和制度并未清除，只是表现程度与形式有所不同而已。

不能无视我们至今还在某种程度上生活在毛泽东及其文革的阴影之中，必须承认并切实清除文革遗产的现实有害影响。

### 1. 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遗毒

毛泽东有句名言：“与人斗，其乐无穷”。他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并非真的客观存在阶级斗争，或者真的在搞阶级对阶级的斗争，而只是以阶级斗争为包装，排除异己。

建国以来，他不断在人民内部以及共产党内找敌人，制造敌人。他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大多是先拿知识分子开刀，把他们归入“资产阶级”敌对势

力；他搞“大跃进”，饿死几千万农民；直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打倒大批“走资派”老干部，最后连他钦定的接班人、“最最亲密的战友”也不放过。

毛泽东的这种思维，文革后虽有所抑止，但并未根治。如上世纪80~90年代，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遗产指引下，就进行过诸如“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以及“反和平演变”等等“对敌斗争”的运动。

如果说，文革时期对敌斗争的口号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黑帮——走资派”；前些时在重庆则是“黑打”。这些都是非法律的模糊语言，可以任意作扩大的解释。据媒体透露，重庆市几年来的打黑，不循法律程序，滥用拘捕、刑讯等非法手段，竟“破获”了600多个“黑社会组织”，抓捕成千上万人，制造了成百上千的冤假错案。他们蓄意将一些民营企业富商也当作“黑社会”头目扫除，并非非法没收其资产，类似上世纪50年代对资本家的“五反”和“社会主义改造”。

近年党中央领导人虽然提出“以人为本”的正确指导理念，但一些部门和地方有些党政领导人常挂在嘴上的口头语仍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我搞“分化、西化”、“和平演变阴谋”，“亡我之心不死”。这种过敏或过度反应，实际上是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遗留。即使果有其事，也不能作为拒绝政治改革、打压公民和社会组织维权活动的借口。有些掌权者一遇群体性事件，往往不反思自身的过错，不尊重公民有批评建议检举控告国家机关及其官员的宪法权利，就诬指民众是受境内外“敌对势力”挑动，以“维稳”的名义，动用警力予以打压。至于某些对国是有不同意见的所谓“异见”人士，也常被当作敌对分子予以严刑惩处。这些实际上还是阶级斗争的文革思维的体现。

### 2. 关于维护领袖个人的权威，坚持“第一把手说了算”

文革的发生虽然有其社会基础和党的领导



制度根源,但文革得以全面发动和延续十年之久不能扭转,则是基于毛泽东在党内和社会上早已牢固形成的个人绝对权威,并通过愚民政策制造了对他的绝对迷信。这是中国发生文革所特有的条件。文革后,这种条件似已随毛而逝,但其变种则还在流传。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固然否定了文革这场内乱,但只是否定了这场“革命运动”,并没有清算“文革思维”,没有彻底清理毛泽东的错误思想政治路线与“党权高于一切”的高度集权的体制。相反,决议违反大多数老干部的意志,极力维护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地位与他遗留下的政治体制。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重要文章,要求改变权力过度集中和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等体制和家长制特权等封建主义影响,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但事过30多年还未予实施。这也导致改革开放以来文革幽灵仍在天安门广场徘徊,不时左右我们的政局。

一个突出表现是,建国60周年大庆游行时出现毛泽东的方阵。这也是为什么有的极“左”势力能在自己的网站上重新大树特树毛泽东的文革思想,大叫要“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而重庆的“唱红”,则一度形成覆盖全市3000万人的运动。据2011年11月25日的《重庆晨报》一篇报道称,从2008年6月份“唱红歌”运动三年半来,重庆一共举行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红歌传唱”活动23.58万场次,参与市民达2.87亿人次,总共挥霍掉几千亿元。单是2011年6月29日在重庆市奥体中心10万人唱红歌,一场就花掉了约1.0377亿元。重庆市政府还花费巨资竖立一个巨大的毛泽东铜像。这些动作,恐怕并非真心实意要学前人,而是要树立呼风唤雨的绝对权威。至于在韶山建立的毛泽东像则成为一座神像,受到善男信女的烧香跪拜。有些农村索性盖起类似土地庙的泥塑毛泽东庙,把毛泽东变为一尊可保佑众生的菩萨。

如果说,这些活动还只是蒙蔽一些善男信女,为复活对毛迷信造势;那么,各地“第一把手说了算”的现象与制度,则是毛泽东个人绝对权威体制在党内各级的潜规则和习惯思维的延伸。

文革中,党中央和国务院制定的一个著名的恶法《公安六条》,其中规定,凡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的,属于“恶毒攻击罪”,要给予最严厉的惩处。不少仁人志士就因此屈死于这一“恶法”。现今有的基层地方党政“一把手”在公民批评检举他们的丑行时,也滥用所谓“诽谤罪”、甚至“颠覆国家政权罪”,予以抓捕惩处。他们成了地方上的“小毛泽东”,而小民则疑似犯了文革中的“恶毒攻击罪”。

### 3. 关于无法无天,踢开宪法,以党治国

文革是党的领袖个人发动的一场对全民实行全面专政的浩劫,当然只能是踢开宪法和法律、“砸烂公检法”、无法无天地恣意而行。

文革中,毛泽东的一张大字报就可以废掉一个依宪法经人大选举产生的国家主席。文革后也出现超越党章法定程序,在已退位的几位元老“生活会”上,就可以促成废黜总书记。

文革前,国家的检察机关和律师已取消,文革中,公检法三机关合并为“公安政法部”,公安“老大哥”独断专行,制造各种冤假错案。

现今党的各级党委的政法委事实上也仍然凌驾于公检法司等国家机关之上,或取代了他们的职权。近年出现的一些错杀的冤案,其中有些就是出于上级政法委的强行非法干预所致。如河南“杀人犯”赵作海冤案,本来当地检察机关和法院人员认为证据不足而几次发回重新侦查,但迫于上级政法委的“指示”,只好硬判“死缓”。11年后,被“杀死”的人却忽然活着归来,从而宣告所谓赵作海杀人是彻头彻尾的冤案,赵作海也被无罪释放。但此前另一个情节类似的“罪犯”则没有赵作海的“幸运”,早已人头落地。

1987年中共十三大曾决定撤销中央政法委这个干涉司法独立的机构。但1989年发生“六四”政治风波后,1990年初又恢复了中央政法委员会。

公安机关和公安人员站在直面社会冲突、维护社会治安和人民权益的第一线,本应是一支勇敢战斗、为民服务的力量。长期以来他们位居“老大哥”的强势地位,受人尊敬,这自有其必要性和正当性。但也由于他们手握强权,不受制约,也易于滥用权力。而各级政法委书记大多是原公安机关的首长。有的政法委领导人公然宣称司法机关是专政机关。有些地方的公检法机

关成为地方贪官污吏的门丁和打手。重庆原公安局长和政法委书记王立军的胡作非为就是一个恶例。他居然无视公民与媒体对公安等政府机关和人员的监督权,公然号召“公安机关起诉报社,民警起诉记者”,号称“双起”。再如对李庄律师的起诉和强迫犯罪嫌疑人去“检举”替他辩护的律师,在李庄刑满释放之前还企图另加新罪重审,其违反司法伦理、践踏法治的霸道,于此可见。

在民众的法治意识日益觉醒的今天,有些政法干部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无法无天,改而学会了“以法谋私”和“以法反法”的手法,即打着“依法办事”的幌子,其所依之法却是“恶法”,是为本部门本地方谋私的自定规章、红头文件。今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其第73条和第83条关于公安机关可以对他们独家认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和“恐怖活动罪”的犯罪嫌疑人予以秘密拘捕,无须通知其家属。这种只便利公安而侵犯人权的法条,就是公安部门的意志体现,它居然获得全国人大以2639票多数通过,被认为是公安部门的“胜利”!(不过也有160票反对,57票弃权。)

#### 4. 关于以“群治”包装人治,运动治国

无法无天和运动群众这两者是互为表里的文革运作方式。利用群众运动来“砸烂”宪法和法制,可“立竿见影”,而策动者可以在所谓“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旗下,幕后操纵,而不承担个人专制和违宪的责任。不加节制的群众运动,也势必越出法制轨道。

文革的特色之一是“人治加群治”,运动治国,即以群众运动的外衣包裹起来的领袖专政,提倡所谓“群众专政”的“大民主”,纵容以群众斗群众、践踏人权。

文革后,虽然执政党宣布不再搞群众运动,但变相的运动则不因某个领导人的意志而终止。其中经常进行的所谓“专项斗争”,就是换个说法的群众运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的“严打”以及以后几次,虽然对维护社会治安不无效果,但由于仍然承袭过去的某些做法,举国动员,大搞运动,常越出法治轨道。运动中一些不是犯罪的行为被作为犯罪来对待,本来应该从轻处罚的却从重处罚了。有的地方还一仍旧制,规

定杀人数字,产生一些冤假错案。“严打”还必然伴随着公检法三家联合办案,原有制度中的相互制约机制被搁置了。一个案件还没有经法院开庭审理,往往就提前由政法委决定了。

近年这类“专项斗争”,也形成对司法官员的政治压力,扭曲了司法公正。有的地方为了制造声势,又搞起群众大会“公审”,或押解妓女游行。最近河南省的周口项城市还举行“春季严打整治推进会”,将被拘押的41名“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疑犯反绑双手,挂黑牌,押到广场蹲下示众。

重庆的“唱红”也搞成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以“传箴言”为例,据媒体报道,重庆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均被要求每人必须发N条短信,各个单位也下达了发送短信总量的任务。有的区县更成立了“红色短信研发中心”,组织专门人员创作编写“红色短信”。据《重庆日报》报道,市主要领导人2009年4月28日亲自创作并上传一条“红色短信”,这条“红信”到该年6月初已被转发1600多万次。(见华龙网2009年6月3日报道)前些年重庆曾将15000套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光碟下发到全市所有学校。还组织千人来北京举行专题“唱红”大会。媒体报道说,从“唱红”、办“红色频道”,到现在“红色光碟”进校园,重庆可谓“全市上下‘一片红’”了。而这种红色运动的政治动机,无非是企图借恢复人们对已故领袖的膜拜,树立当地领导人的权威。

###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防止文革重演

上述文革某些元素的遗毒之所以还在一些地方、一些事件中表现出来,基本缘由还在于文革结束以来,我们虽然进行了经济改革和某些局部的政治改革,但产生文革的政治制度的根基基本没变。诸如“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第一把手说了算”,权力无制约,司法不独立,政法委擅权,公民无自主的选举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等等。这就是如温家宝总理所忧虑的:“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虽然历史条件已大不相同,像极“左”势力所盼望的全面复辟文革,难以如愿;但像重庆这样,特别是某些文革元素的局部乃至大面积复活,则已是可以触摸到的



现实。

长期以来,人民期待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讲得口干舌燥,但政治体制改革还是难有进展。

正如今年2月23日《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所尖锐指出的:“现实中,或是囿于既得利益的阻力,或是担心不可掌控的风险,或是陷入‘不稳定幻象’,在一些人那里,改革的‘渐进’逐渐退化为‘不进’,‘积极稳妥’往往变成了‘稳妥’有余而‘积极’不足。”评论尖锐地指出:“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

现实昭告我们的是,政治体制改革已是民心所向。就连《人民日报》的子报《环球时报》所做的民意调查也显示:63%的受访者希望中国实行西方式的民主,而且期待一场新革命的受访者居然占到49%以上。(见该报今年3月12日的英文版)面对这个看来使人惊心动魄的数据,不能不使人警惕,如果还依然不为所动,其后果就不是执政者所愿和所能承受得了。

且不论那些既得利益集团必然要抵制政改;对于有心执政为民的领导人,我想也不必把政改设想为那么艰险复杂而越赳不前。无论执政者还是社会精英,不必一想到政改,就是毕其功于一役地实行多党制,就是三权分立,就是普选……改革步骤不妨找准切入点和非改不可的急切点,然后平稳推进。以下几点,我认为是当下不难办到、也是迫切要做的:

### 1.通过“重庆事件”展开对文革的大讨论大反省

应当说,重庆刚刚经历了一场小文革,它已引起全民的热议。我们应当因势利导,迅速公布“重庆事件”、特别是其“唱红打黑”的真相,由此开展对文革历史真相的复原和研讨,反省文革产生的思想与制度根源,检讨其遗留的弊害,作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张本。

### 2.通过纪念82宪法诞生30周年,宣传宪政精神,由依法治国上升到依宪治国,落实宪法有关公民权利的立法

今年12月4日是我国1982年宪法诞生30周年。这部宪法是初步总结了文革教训的产物,它确认公民权利优先于国家权力的地位;初步摆正执政党在国家宪政体制中的地位;体现了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战略目标。在以后通过的四个

修正案中,进一步确认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国家保障和尊重人权”等重要原则纳入宪法。它是四部宪法中比较好的一部。其最大缺陷是没有鲜明地明确司法独立原则,没有严格建立权力分立与制衡制度,没有确立违宪审查制度;宪法所列举的公民基本权利还有不少缺漏,宪法权利缺少或没有立法保障。

当前的首要任务,一是要在治国理念和法治建设目标上,由依法治国上升到依宪治国,建设宪政国家。胡锦涛在首都各界纪念82宪法颁布20周年大会上曾指出:“实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首先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一项根本任务,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还要特别强调吸取文革时期破坏宪法的教训:违宪、毁宪就有发生第二次文革的危险。

二是要立即落实宪法第35条的各项公民自由权利的立法。立即制定出版法、社团法、新闻法(《共同纲领》第49条曾确认“保证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以实现公民的言论自由和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这些法律早在上世纪80~90年代就已有草案,由于各种不成理由的原因而被搁置。鉴于我国宪法是“不可诉的宪法”,宪法所确认的公民权利也不是“直接有效的权利”,因为公民权利受到侵犯,不能直接适用宪法进行诉讼,必须有立法为据。在没有制定相应的法律以前,司法机关不能把宪法司法化,这样公民的权利得不到切实的保障。现今只有国务院或其部委制定的有关这些权利的行政法规或者规章,甚至红头文件,如宗教管理条例、出版印刷条例、社团管理条例、互联网的一些规定等。这一则违反了《立法法》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必须由全国人大以法律来制定的规定,是越权立法和越前立法;二则有关公民权利与自由的法律的立法主旨是要以保障公民自由为主,而现在的法规、规章、红头文件则以控制和限制自由为主。这也是违反公民权利立法精神的。

### 3.积极支持社会组织的发展,培育公民社会的成长

上世纪80年代是文革的灾难推动政治和经济的改革;当前是两极分化和官僚腐败导致的民

生危机与社会危机,引发对民权、对民主与宪政、人权与法治的需求日益增长。危机催生改革。中国从来是被灾难和危机逼上改革的“梁山”。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改革的社会动力主要来自备受文革磨难的“走资派”老干部和长期受精神压迫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的精英,以及被“一大二公”所掠夺、没有免于饥饿的自由的农民,那么,今后改革的动力何在?

我认为,值得重视的新兴动力是正在崛起的来自民间社会的维权力量。人民维权意识大觉醒,维权活动此起彼伏,它既是社会矛盾与危机的征兆,如能正确引导,也是推动和促进改革前行的巨大社会动力。其中一些在改革开放中被边缘化为经济上政治上受压抑的弱势群体,未能分享改革成果,反而利益受损。政治体制改革关系这些阶层的生存和自由,因而他们自发地强烈地要求实现公平正义的政治改革和司法改革。

近年来,从重庆“最牛钉子户”为房地产拆迁补偿不公而维权,到山西黑砖窑的揭露,厦门市民群起“散步”抵制有毒化工厂PX的建设,以及华南“纸老虎”被网民戳穿,一些地方出租司机的罢运,等等事件此起彼伏。贵州瓮安县更爆发上万市民的抗议事件,由起初县委当局推卸是所谓“黑社会势力”的挑衅,到省委书记亲自出面问责县委领导的侵权,并予以罢官,显示出群众维权的正当性和监督力。危及百万婴儿的“三鹿奶粉事件”也是因媒体和网民的揭露,排山倒海的社会舆论,以及全国各地百位律师组成“三鹿奶粉志愿律师团”为受害者维权,迫使政府严厉追究责任人使之受到刑事制裁和民事赔偿,这些都是过去少见的。

更可靠的社会力量还是有组织的社会群体,他们正在形成能与行政权力抗衡的公民社会。现今很多社会事务和政府事务已由自愿组织起来的公民和相关社会组织运用其社会资源与社会权利来治理。他们对多样性的社会公益事业自动地自愿地做出及时的反应,有些可以比政府做得更好(汶川地震时第一个赶到现场施以救援的就是民间社会组织)。它们的崛起还可以制衡政府权力的滥用,防止权力的过分集中,使权力多元化和社会化。

去年延续至今的广东“乌坎事件”,一方是村

民依法理性地抗争,抵制了基层贪腐官员的恶行,索回了部分被非法侵夺的土地,保卫了民主选举的成果;一方是党和政府由打压到理性地与村民平等对话协商,终于化解了矛盾冲突。其中有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可以作为官方处理维权事件的重要参照。《人民日报》2011年12月22日发表时评《“乌坎转机”提示我们什么?》指出:“把握了群众利益的诉求点,也就把握了问题解决的关键点。”可以说是摸到了“乌坎事件”的脉搏。

由此,我们应当从单方面仰赖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移向关注自下而上的民间社会动力,着力研究和助推公民和社会组织依法进行维权活动,促进良性的非政府组织的建立和公民社会的形成。

最近广东省官方宣布,将逐步从行业协会商会入手推进社会组织体制改革,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表示,凡社会组织“接得住、管得好”的事都交给他们。广东省民政厅还表示要放宽社会组织的限制,对公益慈善类和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推行“去行政化”和“去垄断化”改革,采用登记制。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改革范围。这是一个值得关注和推广的积极举措。

只有这样依靠和发展来自民间的维权力量,并与党政内部力主改革的明智力量结合,上下互动,政治改革和法治的进步才有希望。■

(作者为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大学宪法行政法博士生导师组成员、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责任编辑 洪振快)

## 启 事

**《炎黄春秋》杂志尚有少量  
往期刊物零售,有需要的读者  
可电话咨询购买。**

**联系人: 崔秀岭**

**手机: 13611159388**

**电话(传真): 010-60342528**

**汇款地址:**

**北京市房山区102488信箱3分箱**

**邮政编码: 102488 收款人: 崔秀岭**



# 经济转型的瓶颈是政改滞后

○ 陆 德

在今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再次强调了我国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他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温总理点到了我们下阶段改革和转型的要害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在发展中出现的不协调、不均衡、不稳定、不可持续的问题越来越多,且累积起来,越来越严重,已经到了不可复加、必须解决的地步。

例如,在经济发展模式上,我们一直依赖投资拉动,依赖廉价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的“粗放式”发展模式,但它是资源的超常消耗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为代价的。以2006年为例,我国GDP占世界总量的5.5%,但消耗了当年全球40%左右的煤炭、50%多的水泥、60%左右的钢和铁、70%左右的油和气,却仅仅创造了全球5.5%的财富,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倍以上。据联合国环境署的数据,全球20个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国就占了16个。我国自己的资源,按2009年的消耗量评估,石油资源仅剩7.08年,铁矿资源仅剩16年,天然气仅剩39年了。请问:我国还剩多少资源可供持续发展?我们又给子孙后代留下多少资源财富?所以,这种粗放的发展模式,必须转型,没有时间再等了。

又比如,在收入分配问题上,不可否认改革开放后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但是贫富差距也在不断地拉大,并且变幅更大。我国上世纪90年代基尼系数就突破了0.4的警戒线,2009年又逼近0.5的危机线,是联合国中有经济数据统计的150多个国家中贫富差距最大的8个国家之一。我国的贫困人口,从1999年庆祝建国五十年宣布的仅剩2000多万,增加到2011年的突破1.5亿人口(注:即使这样,我国的贫困标

准线仍低于印度等国)。我国的城乡收入比,据世界劳工组织统计公布的数据:全球城乡收入差距比大于2倍以上的仅有3个国家,而中国的城乡收入比是3.3倍,差距最大。我举这些数据时,希望大家心中要有个“前缀”,即: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是为广大劳苦大众服务的党,我们革命或改革的目的,是要让全体人民共同享受改革的成果。

再加上党风日下和腐败问题,这个问题已成为全国共识。我仅亮一下“三公”消费和“灰色收入”这两组数据:据有关研究机构的数据,2004年公款吃喝3700个亿,吃掉一个半国防军费;公款用车4080亿元;公款旅游3000亿元。当年的财税收入仅3万多亿元,三分之一被吃喝玩乐掉了。经济学中有个“政府支出成本”,资本主义国家中美国最高,它是世界“霸主”,哪里都要花钱,它的政府支出成本是9.9%,而中国的政府支出成本,据中共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的数据是37%,是美国的4倍左右。再看“灰色收入”,当前我国收入差距已经很大,但还有一部分收入是未统计进去的,那就是“灰色收入”。据有关研究机构透露,这部分收入约占GDP总量的15%,以2010年为例,那就是有约6万亿元的财富被少数特殊利益集团的人拿走了。

如此等等。

这些问题的长期积累,不仅影响了经济持续较快发展,而且,积累起来也会发展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

怎么改?中国当前改革和转型的主要瓶颈在哪里?

我们不妨用经济曲线走势或改革开放后几个阶段的发展变化过程,来分析之。

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说是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即1978年开始的。这一阶段的改革,有文章说是类似“帕累托

式”的改进,所谓“帕累托式”,即在诸多因素中改动某些因素参量而不影响原总体均衡的一种变革。这是一种增量改革。允许和扶植原有体制外的经济体发展,如联产承包责任制、社队企业等,而体制内原有的利益格局没有根本触及。这种改革释放出巨大能量,获得了改革后的第一份增长红利。但到80年代末,价格市场化改革受阻,国企承包制改革效益下滑,加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内则因“六四”政治风波的发生,以及一些保守势力对改革提出质疑,认为“和平演变”才是主要威胁,等等诸种矛盾,使改革一度失去了方向。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使全党统一了认识和方向。故此,1992年中国再度开启了进一步改革的航程,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战略目标。从1992年至今,中国经济的发展又经历了一次高速增长期。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出现的问题也愈来愈多,贫富问题、转型问题、垄断问题、腐败问题等等,愈来愈严重且积重难返。这一阶段发展的改革红利再度被吃完,采用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式来推动发展的改革空间亦基本用尽,而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弊端却愈来愈明显。从1992年开始的这一轮改革,总是经济改革先行,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跟进,使经济改革“一条腿在前”的状况,时时受到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拖累,只能在狭小空间“有限腾挪”,而始终创不出全新局面。

例如,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所谓“市场经济”,就是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我们离此还有很大差距,主要表现在政府过多干预市场以及国有经济、垄断企业阻碍和挤占中小企业发展等问题。中央也有觉察,所以在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提出了“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定”。但是,这个决定仍主要是企图从经济角度去改革、完善,没有触及深层次权力和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等改革的矛盾和问题。至今,已过去十年,这个“决定”执行得并不好,并且,还有反复。

反复之一,就是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问题。这个问题提出已有近20年了,要从“粗放型”发展向“集约型”发展转变,不是没有看出来,而是

早已提出。但结果呢?从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起,到21世纪初就放慢了脚步,各地追求GDP高指标,加上大规模的城市化建设和“铁公基”项目,大量资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流入,“三驾马车”(投资、需求、出口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又转而用投资和出口来维系经济的高增长,而不顾及经济的转型和提升消费等战略目标。到了“十一五”,中央又再次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是,其间又遇到世界金融危机,我们又用“4万亿元财政刺激”和“9.6万亿元天量信贷”去搞投资拉动,造成产能过剩和资产泡沫。“十一五”不仅没有转型,反而是向旧有增长模式倒退。到“十一五”末期,惊呼发现支撑旧有增长模式的廉价资源和廉价劳力已经近乎枯竭,又在十七届五中全会和“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转型“刻不容缓”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主线”。

从1992年的十四大提出市场经济目标,为什么经济转型问题20年都转不过来,到现在没有多少空间了,还在走回头路呢?旧的经济增长模式转不过来,造成我国资源匮乏,环境破坏,超发货币,通胀压力增加,房地产泡沫,劳动者收入增长缓慢,消费拉力不足等等一系列问题。

反反复之,就是权力干预市场愈演愈烈。我们在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是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现在却在走回头路。权力干预市场,造成庞大的权力寻租空间,致使腐败蔓延。而腐败问题和贫富差距问题的结合,又会引起社会和政治问题。今年“两会”,代表5000多人,据说会务服务人员是1:4,但是,大家知道各省、地、市自己派来的场外“维稳”干部是多少人吗?据说各地派到北京来围堵“上访”的干部有几万人,光河北就来了近2000名干部。表面看“两会”很“和谐”,但河北的干部对我说“两会”期间他们“累脱了一层皮”。我国当前的“维稳”开支,已经超过了国防开支,这还了得?!有些同志和地方的所谓“维稳”,实际是在压制和掩盖矛盾,而不是在解决这些问题。就像大禹的父亲鯀,在治水中不是像大禹那样去疏和导,而是去围和堵,结果水患越来越多,无法根治。

以上的变革过程告诉我们:在我们获得两次“改革红利”之后,再企图单从经济改革的方式取



得进展,其改革空间已经相当有限,改革效益也相当低下,经济转型20年来基本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说到问题的关键,为什么经济转型迟迟转不过去?转不过去的最大受益者是谁?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当前基本利益格局已经固化下的特殊利益集团,他们阻碍改革,是因为不想失去既得利益。而短短30多年快速出现的特殊利益集团,是由于在市场化改革的同时,未能配套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结果。比如劳动报酬问题,2002年以前我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基本在50%以上,但2007年已下降到39.7%,其余部分被政府和企业拿走。而在不断下降的劳动报酬中,又有相当大一部分被垄断部门的职工拿走。有这样两组数据:一是中国行业收入差距达15倍之多;二是占全国职工总数8%的垄断部门职工的工资福利,相当于全国工资总额的55%。所以,在国民收入中,收入分配问题亟待解决。但为什么看着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而我国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从2004年起草至今被修改5次,拖了7年也迟迟出不了台呢?说到底,就是特殊利益集团的阻挠。这些问题,不从政治体制上去改革,单单企图从经济改革上去触动,有可能吗?再比如“三公”消费、腐败、权力寻租等问题,权力滥用,不透明,缺乏群众和社会监督,这些问题不从政治体制上去改革,单单企图从经济改革上去触动,有可能吗?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既然用经济改革的方式推不动,那就只能以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式去推动它。

另外,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提出“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定”,但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同步跟进,而很多问题和矛盾又亟待解决,所以采用“实用主义”的办法,混淆了许多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概念,没有把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分开,没有把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分开。例如,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都是属于社会和公共服务领域,而我国却把它们当作是经济问题,要用经济政策去取代社会政策。医疗本是公益事业,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要财政支出、补贴,仅少数私营医院是个人支付,而我国提出“以药养医”,把它推向了社会,垂死病人躺在医院门口“没钱莫进来”;教育也是公益事业,公民有受教

育的权利和义务,而我国却提出“教育产业化”。什么叫“产业化”?产业化的目标是获取“利润最大化”,是做买卖,不是提高教育质量和全民素质,偏离了社会公益事业的轨道,拖延至今17年,我国仍达不到对教育投入占GDP4%的战略目标。等等。

我们是共产党员,马克思早就告诫我们,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生产关系要相应调整,与之相适应;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方面,也应该是相互调整和相互适应的关系。什么叫“和谐”?这才叫和谐。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据一些理论研究者统计,邓小平在1986、1987年曾经76次提到此问题。小平同志说: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两者是互相依赖、相互配合的。他并指出:所有的改革能否取得成功,最终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在最近的数个改革理论研讨会上,有的同志提出:前两次改革的重心是“还利于民”,而这次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心则应是“还权于民”,不仅生产要素和资源的配置权要让位给市场,而且还要改善我国的民主政治环境。

改革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不懂政治,是个搞经济研究的院士、学者,但从我对经济研究的角度预测,如果我国在经济转型上不能获得巨大成果,如果“十二五”工资不能“倍增”,还在那里拖来拖去,那么,我国在2017年左右,经济上将会遇到重大冲击,有几条重要的经济曲线将会出现“拐点”,留给我们的时已经不多了。

政治体制改革,我个人认为,从中国特有国情出发,应该是由上而下地进行行政改。它不像经济改革,由于企业经营和管理是市场经济中的一个单元细胞,相对独立,所以它的改革和创新有较大和较自由的空间。而中国由于是集权制国家体制,所以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式主要是由上到下的变革,这样的改革成本最低。只靠下层或个别地方从下向上进行行政改,是很难做到的,除非中央放权或明确支持。当然,全国和基层的改革呼声及民意是很必要的,这是政改的基本力量源泉和政治保障。

马克思主义讲辩证法,人类历史的发展变化是符合辩证规律的。在改革的辩证关系中,常提到一个悖论,即一些以前被认为是改革者的人,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获得了改革红利,而在进一

# 中共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

○ 米鹤都

今天,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分歧,人们对于中国未来走向及政治体制改革的热情,似乎又回到了1980年代中后期人们对于改革的热盼之中。

笔者有幸参加了1987年中央政治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下属社会主义民主专题组为期一年的集中研讨。1986年9月,中共中央成立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由赵紫阳、田纪云、胡启立、薄一波、彭冲五个人组成。其职责是:为政治体制改革探讨思路和设计蓝图,提供中央政治局常委决策。小组下面设立一个办公室,办公室由鲍彤、严家其、贺光辉负责(后来又增加了周杰)。同年底,在中央五人研讨小组下面,先后成立了党政分开、党内民主、权力下放、干部和人事制度、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制等七个专题研讨组,后又成立改革理论组。研讨人员由相关中央国家机关及研究机构抽调领导干部和少量研究人员参与,专题研讨组并与所在部门党组互动。(参见吴伟:《中共“十三大”前后的政治体制改革》,《领导者》总第43期)笔者当年曾经接触和参与的一些思想歧见、价值观念、路径和突破口的讨论,特别是体制内外表现出的重大差异,和今天的状况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感到有必要旧话重提,回顾一下那次为期一年的集中研讨中的一些基本认识。历史的回顾,也许可以为获取今日的改革共识提供一点可供借鉴的经验教

训,推动改革事业的良性发展。

## 一、十三大前后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次失败的尝试

首先,笔者认为,十三大前后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今天再度谈起政治体制改革,分析一下那次改革的经验教训,实为必要。

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改革开放。可以说,改革开放就是在文革极端条件下,逼迫人们进行反思的结果。这种反思在文革中首先是从两个群体中开始的,一是文革中受到打击摧残的老干部群体,一是具有红卫兵和上山下乡经历的第三代青年。(关于第三代人的定义及特征,参见拙著《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但是这两代人的反思有一个重大差别,即第一代往往回归到经典马克思主义中求解中国的方程式;第三代甚至在文革中就开始了全方位的探索。这两批人的结合,形成了最早推动改革开放的思想先锋。

邓小平、陈云等为首的一批老一代对专制制度弊病的反思、在解放思想和拨乱反正的基础上,推进了政治体制的改革。邓小平从文化大革命的国家命运和个人遭遇中,对国家制度中存在

步改革中,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反过来变成了改革的阻挠者,站到了改革的对立面。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不要等民意都不满时才被迫改革,那将是公信力丧失、政令不通的社会震荡了。那时的政改,将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触发,是不可控的。从历史的客观进程来说,现在是“改革”与“革命”两者的赛跑。执政党要把握历史脉搏,抓住主要矛盾,积极引领政治体制的改革。

中国的改革,经历了两个光辉的历史时期:

一个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和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第二个是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和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当前,正像多位中央领导同志强调的那样:我国正处在改革的“关键阶段”和“攻坚阶段”。

我们热切期望,党的十八大,将是我党讨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次盛会,将为我国的改革揭开第三个光辉的历史的篇章! ■

(作者为中国防卫科技学院副院长)

(责任编辑 洪振快)



的弊病有深刻的认识,率先提出:“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痛定思痛,他们开始寻求限制专权、建立防止文化大革命再次发生的国家机制。同时鉴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迅猛发展,也需要在政治制度层面上适应和保障。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第一次在国家制度层面的政治体制改革启动了。

这次改革首先在社会上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舆论准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党内以理论务虚会、反对“两个凡是”为代表,民间则出现了“民主墙”及很多论坛、刊物,各种思想、观点如雨后春笋般萌发出来,曾有过一段打破思想禁区的热烈气氛。这一过程中,也曾出现过各种小的波折,但总体上还是有一个健康的思想氛围。党内上下、体制内外共识性很强,即使遭遇到党内一些保守力量的抵制,邓小平依然坚定地将政治体制改革推上了议事日程。邓小平亲自掌舵,由尚未担任总书记的赵紫阳出马担纲,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启动了。

经过一年的研究,中央政治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下属七个专题研讨组分别提出了课题报告,由当时的办公室(十三大后各专题研讨组解散,办公室改为常设机构——中共中央政治体制研究室)。吴国光等人整理起草了十三大报告中的分报告——中共中央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报告。

今天看来,这个报告是一次夭折的改革的历史记录。为何这样说,是因为这个报告非常之空洞,题目很大,吊起了人们的胃口和过高的期待值,但却缺乏实质性的内容。它最后的落脚点,放在了实质上并不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党政分开”上面。中国的第一次声势浩大的政治体制改革沦为一次行政体制改革。

## 二、对这次改革失败的几点分析

关于上世纪80年代第一次政治体制改革尝试的失败,很多人认为是由于1989年的政治风波。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流于肤浅。严格地说,

即使没有什么风波,第一次政治体制改革注定也要失败。这是因为:

一是它并没有触动原有国家层面的政治制度。

这里需要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予以定义。笔者认为,必须是涉及国体和政体的改革,即对国家层面政治制度的改革,才能称之为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应当区分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执政党体制改革的内容,因为它们追求的目的和功能是不同的,互相间是不可替代的,不应混为一谈。

在这个意义上,以党政分开为主要内容的行政体制改革无论如何不能称之为政治体制改革。这一改革不仅不能对权力进行制约,反而使已经十分臃肿的官僚队伍急剧膨胀,一套班子成了两套班子。党、政在中国现实中不仅分不开,还增加了内斗。另一方面,更多的位置使更多的干部得到升迁和安排,成为这次“政治体制改革”的直接受益者。而人民群众不仅没有见到实质性的改革成果,反而大幅度增加了对社会管理成本的负担。即使党政分开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却走了样,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党企的关系却更加紧密。这又是一个悖论。在整个80年代中,我们可以感觉到邓小平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他前期强调的解决权力集中问题,目的在于防止文革重演;后期他强调的权力集中问题,则主要从解决以党代政、提高行政效率考虑。中共中央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报告最后落脚于党政分开,体现了邓小平思路上的变化,同时也反映了他对党内高层保守观念的一种妥协。

略有一点新意的是,十三大把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和多党合作,正式作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三大后的次年,中共中央又成立了中央政治协商和多党合作制度的研讨小组,笔者也有幸参与其中。这一研讨组由人大、政协、中央统战部为首组成,各民主党派等也参与其中。从这一组成的架构中,可以看出发起者初始是寄希望于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和党派的关系等国家体制上有所突破,对中国的民主改革起到破冰的作用。

而这次研讨过程中,恰逢1989年的政治风

波。受其影响很大,一度停滞并草草收场。其最终结果除了一些空洞的口号外,仅明确了建立中共中央领导人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的座谈会制度。它显然不可能触动原有国家层面的政治制度,而且缺乏程序上的设定。如我们今天看到的那样,这种座谈会实质上成了一种通报性质的、不定期的会议。这次研讨和其后的政策制定,对改善国家政治制度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笔者认为,这并不是其研讨的初衷。

二是它没有达到这次政治体制改革的预期。

根据当时中共中央和邓小平的最初设想,这次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要“使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步一步走向制度化、法律化,这是防止文化大革命重演,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但是,这次改革不仅没有解决“防止文化大革命重演”的制度保障,甚至没有建立经济起飞中防治腐败的制度保障。恰恰由于这一点,成为而后发生大规模社会动乱的制度上和体制上的根源之一,也是导致今天发生全面的、渗透至基层的体制性腐败的主要根源。以至于文革结束30多年后,人们依然在担忧二次文革的出现。

三是它没有满足中国社会改革的基本要求。

在政治权力和商品市场密不可分的中国特色下,当时制约权力和对遏制腐败的社会要求已经极为强烈了。人们在总结1989年政治风波的教训时可以看到,正是由于曾对此次改革寄予厚望的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阶层深感失望后,社会情绪开始躁动。当时社会的情绪集中在所谓反“官倒”上,人民对此深恶痛绝,希望执政党能够痛下决心从制度上加以遏止。青年学生是社会最敏感的群体,十三大刚刚结束一年多,他们就已经按捺不住而上街了。反过来认识问题,它也说明这一次政治体制改革已然失败。人民看不到任何有效的国家民主体制上的改善、看不到对腐败的制衡和监督,甚至看不到一个被承诺的具体措施及时间表,而是一些无关痛痒的空话。

四是这次改革的最高领导层缺乏明确的目的和改革的决心、魄力。

当时负责领导这次改革的中央领导小组,从一开始就没有充分重视这次改革,大有把这次改革作为完成老一辈革命家交办任务似地对待。他们没有看到,当年社会、党内的改革共识实际

上是千载难逢的,悲观地说,此后几乎再难有这样的历史机遇了。但是,领导层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过多地看到困难、阻力和不利因素,迁就于保守的、惰性的力量。他们的主体思路仍然希望遵循先经济、后政治的优先次序,最终让人民失望了。(由于笔者所处的地位,耳濡目染的多是间接的传达的信息,这一认识有其主观性。如有错误,希望得到指正。)甚至他们自身也成为其受害者。因为,把这次改革的失败说成是不久之后发生的政治风波的导因之一,并不为过。

五是各方面在改革突破口的选择上诉求很不一致。

从一开始,人们对这次改革的总体诉求上可以说共识很强,但是在如何选择突破口上面,又可以说上下不一致,体制内外不一致,甚至体制内各派之间也不一致。所有的改革派各抒己见,争论不休,也就无法找到一个执政高层能够接受的、又可以满足广大人民主要求的、同时还能够解决中国社会迫切现实问题的突破口。于是,在各说各话的基础上形成的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报告,基本上就是各方主张拼凑出来的,这样的东西怎么可能有政治生命力?当然,有人会说关于政改主要解决党政分开的提法来自邓小平,这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就邓小平而言,当时并非没有接受其他突破口的可能。

六是这次改革的启动时机并不合适。

1987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闯物价关”的前夕,整体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任何重大政治措施的出台,最佳时机显然是经济的上行期。但是这次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不是在一个稳定的上行期,而是在一个困难重重的门槛前提出的。且不谈人民群众的情绪和感受,就是从这次改革领导人的精力看,势必会更多地关注经济领域的问题。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五人领导小组参与和听取各研讨组的汇报,次数极为有限,领导人的指示和插话往往流于泛泛之谈。有人提出,1987年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次在错误的时间节点启动的一次错误的改革。这一说法,不能说毫无道理。当然,在经济形势的下行期,同时主导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领导人,在经济上拼全力闯物价关,将难度更大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稍许应付,也不是没有道理。如果这次改革启动于1985年,也许会是另外一番



风景。

从总结历史教训的角度,我们不能不说,当年主持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高领导层,积极参与其中的体制内外的改革者,以至于整个思想界、知识界,由于缺乏共识,导致关注的焦点分散,而酿就了重大的历史错误。于是,当代中国第一次政治体制改革的无疾而终成为必然。

这里所谓缺乏共识,当然不是指缺乏对政治体制改革必要性的共识,而是缺乏对改革目标和路径的共识,首先表现在无法选择正确的突破口上。于是造成我们今天的扼腕叹息,在一个得之非易的机遇中,中国社会没有出现制度上的改良,而走上了恶性循环的道路。以至于当年体制内还能支持改革的部分保守力量,之后也干脆摒弃了政治体制改革。更为极端的一些人,如前所述,更把社会自我完善性质的政治体制改革冠以意识形态色彩。另外,它的失败也给后来的领导者制造了障碍,而自我设立起樊篱,成为不作为的理由。

就当年改革派们所犯的错误的而言,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三点应当记取:一是继续着中国传统政治

的政见之争,宛若仇讎,缺乏现代政治中的妥协意识。即使改革派阵营中也不能放下一己之见,以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心态来选择突破口。二是不能以实事求是的精神,着手于社会迫切需要的实际问题。人们往往是从概念出发、从体系出发、从终极价值出发,以理想化、合理性作为衡量取舍的标准来探讨问题。而忽略了社会的热点、民众直接关切的问题以及执政高层的可接受性。三是诉求分散,缺乏在路径和突破口上的共识,不能形成诉求相对集中的、强有力的聚焦点,更谈不上有效的压力。这些问题是我们今天在讨论政治体制改革中,不能不考虑,也依然无法回避的。■

(责任编辑 洪振快)

## 炎黄春秋网上书城

网上购书 方便快捷

网址: <http://yh100.taobao.com>

本刊唯一授权网上书店

联系电话: 18611911105 15801313168

联系人: 关小姐 淘宝旺旺: zssy8888

SIEMENS

# 西门子助听器

## Hearing Aids

服务热线: 010-84608877

 声望听力  
www.sw-tl.com

请认准西门子听力集团授权证书 西门子听力仪器(苏州)有限公司

数字型耳背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准)字2010第2460986号 数字型耳内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准)字2010第2460987号

注:请认准西门子标识/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苏医械广审(文)第2010040048号

# 应该抛开“斯大林版本社会主义”

○ 王录生

何伟先生《我学的不是马克思主义》一文(见《炎黄春秋》2012年第1期)说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深切感受。我比何先生小10岁左右,1950年代中期,在大学里学的就是苏联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再比我小10岁左右的一代人,他们学的虽然已经有了我国本土作者编写的《政治经济学》,但整个架构还是那一套,大同小异而已。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当了老师,教给学生的东西,基本上没有变,只是对帝国主义是垄断的、寄生的、腐朽的资本主义的论述加以改进而已。这就是现在居于各领导岗位上的一大批人所接受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因此,大体上可以说他们脑子里开始装进去的还是“斯大林版本的马克思主义”。

苏联解体20多年来,他们对斯大林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可能会有些反思,但基本理解恐怕变化并不大。这可以说是我国的基本国情。这种情况大概也是我国改革处于胶着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何先生使用了“斯大林版本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本文主要涉及社会主义部分,为了更切题,本文将使用“斯大林版本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

我们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的?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给我们现成答案。斯大林却有一个答案: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加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这个答案对不对呢?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通过他们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了这个答案是错的,这条路走不通。

邓小平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并没有搞清楚。他又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说简单一点就是: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而斯大林版本的社会主义带给我们的却是共同贫困。这当然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应该予以彻底否定。

改革开放以来,在所有制方面允许民营经济发展,放弃了全面计划管理,发展了市场经济,实行了多种分配方式,使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但是,斯大林的那一套理论,并没有完全被否定。就计划经济而言,邓小平讲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大意),计委也已改名“发改委”,但在现实生活中,计划经济的那一套管理办法,并没有取消。尽管具体作法如指标体系等和计划经济时期已有很大不同,但实质性的改变并不多。例如资源的配置,主要还是取决于政府,取决于市场的,只有一小部分,大一点的项目需要发改委立项批准。在教育、医疗等社会领域,其作法基本上没有变,政府在计划经济时期管什么,现在仍然管什么,如高校的院系设置、招生人数等等,权力仍然高度集中。

可以这样说,关于计划经济,在理论上已经被否定了,但在实际操作中,很多作法还在继续使用。

从所有制方面看,斯大林版本的理论我们也是继承了下来。在农村,虽然实际上已经分田到户,但在理论上还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集体所有制,土地还是公有的,农民只有使用权。农民向银行贷款,土地不能抵押,把农民变成了真正的无产者。这是我国“三农”问题多年来解决不好的根子。在城市,虽然已经出现了民营经济,并且靠它使我国的经济获得迅速发展,成为GDP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大国。但是在理论上,是说因为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言下之意,发展到中级阶段(更不要说高级阶段),这种所有制结构是不行的,是要变的。因为“正宗”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是公有制。因而先富起来的人都纷纷搞投资移民,用钱去换外国的绿卡。没有钱搞投资移民的,则想办法把孩子生到境外去。实则和40年前中国人偷渡香港、东德人翻墙去西德以及最近的“脱北者”一样,是人们对斯大林版本社会主义的不认同。



尽管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定义中没有提到所有制,但在人们的观念中,国有经济的大小和作用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地位的反映,可见斯大林版本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有多大。

其实恩格斯早就说过,国有经济并不能说明社会的性质。如果说国有制就是社会主义,那么德国的俾斯麦就是最早的社会主义者了(大意)。

国有制属什么性质要看它起什么作用。我国的国有企业占据了国家巨额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赋予了垄断地位,制订垄断价格,给予了大量资源,可以不计代价地污染环境,还有种种政策优惠,更不要说办事方便等等,从而使它每年获得巨额的利润(2011年为2.2万亿元,相当于国家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强)却归企业所有,由企业自行支配使用。它们可以为自己规定天文数字的年薪。为了内部摆平,还为各级管理者和职工规定较高的工资、津贴和福利,从而使国企职工的平均工资高于社会平均工资的4~5倍,成为社会分配不公的一个重要方面。有人提出,“国有经济应负有保障社会公平,提供经济基础的社会责任”,“保障社会公平的重要职能”(见《人民日报》2011年6月21日刘国光《深化对公有制经济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一文)。这种良好的愿望能实现吗?被誉为“共和国长子”的央企纷纷在海外上市,它可以为外资利用其种种有利条件来赚中国人的钱,却不让利润进入国家主人之手。

在所有制问题上,马克思曾说过在消灭资产阶级生产资料私有制后,要重新建立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在资本主义世界出现股份制后,他曾高度评价并认为这是解决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矛盾的有效办法(见《资本论》)。根据以上两点,学界有人提出将国有企业的股权分给全国人民,让他们参与分红。这似乎也是“全民所有制”的一种实现办法。但是,却遭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抵制。

如果国有股不能分给老百姓参与分红,那么将国有股的红利交给财政,这也不失为另一个办法。利润交给“老板”,不留给“总经理”,这是名正言顺的。一年两万多亿元,可以用它解决多少民生问题?可以缓解多少社会矛盾?但是呼吁了那么多年,2011年,确定央企只给财政上缴利润的5%!再看看这些央企的背景,难怪有人称

之为权贵资本主义了。即使这样,还要“国进民退”。可以说,这些都是斯大林版本社会主义理论在起作用。

在苏维埃建政初期,为了巩固政权,列宁采取了新闻管制,取消了其他政党,实行了一党制。大家知道,马克思主张建立的新社会应该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他是强烈反对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的。可以说这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都知道的普通常识,而且马克思主义者还曾用这个武器去反对专制政权。所以列宁当时声称这是特殊条件下采取的应急措施,一旦政权巩固,再作改变。

但是斯大林却将其常态化,而且越来越严格,并使之成为斯大林版本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书报检查制度,剥夺了人民的最基本的自由权利。时间长了,报刊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使老百姓变成“老不信”,党和政府失去公信力,把人民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这也是当前群体事件频发,小事酿成大祸的重要原因。

列宁首创的一党制,在世界政党史上,也可以说是一种创新。一党制,有它的长处,“意见一致、决策迅速、办事效率高,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等等,但是在20世纪经过不同国家的实践,却证明这个制度是与世界文明主流背道而驰的,由于权力高度集中,没有监督,必然滋生腐败。不论在德国、意大利,还是苏联、东欧都纷纷垮台,虽然还有几个国家,但情况也不妙。历史已经作出一党制不是一种好制度的结论。

我国提出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从理论上讲,这也是一种新的政党制度。它是不是优于一党制和多党制,当然需要实践和时间来检验。但是,在斯大林版本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势下,目前我国党际之间的关系,与一党制的区别并不大,很难克服一党制的弊端。例如反腐败多年,揭露和处理大案不少,但似乎没有一个案子是民主党派揭露出来的,足见民主党派并不了解情况,也没有起到监督的作用。所以人们仍然把我国的政党制度归于一党制之列。

历史给一种新的政党制度进行实践的时间是有限的,不脱离斯大林版本社会主义的窠臼,前景恐怕并不美妙。

上个世纪中,我国新政权建立之初,实施了“一

边倒”政策,一切向苏联学习,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前面乌龟怎么爬,我们后面就怎么爬。”所以“斯大林版本的社会主义”理论渗透于我国的方方面面。后来的反修斗争,更是将它进一步强化。

改革开放以来,客观地说,我们对斯大林版本的社会主义,已有了重大改变。但是,并没有从理论上将它否定,仍然在明的、暗的起着决定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只是对斯大林版本社会主义的修正。“摸着石头过河”解决了当时的困难,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目前我们碰到的困难和问题,之所以迟迟不能解决根子还在这里。

历史往往给我们开玩笑,“斯大林版本社会主义”理论既是新、老左派反对我国改革开放的理论依据,它又是改革开放最大得益者——既得利益集团反对继续改革的理论武器。看来要将改革开放事业向前推进,已经到了必须正本清源,搞清什么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时候了。

人类的历史是追求文明进步和美好社会的历史。在历史长河中,有许多值得我们称道的先行者,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这些先行者中的佼佼者。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不是一

种宗教教义,它是要不断发展的。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一分为二了,相互指责对方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如果说当时,人们尚不能肯定谁对谁错的话,那么,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实践,今天已经一清二楚了。在讨论我国面临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时,我们不应该预设框框套套(如“斯大林版本社会主义”理论),还是遵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把“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为好。

老实说,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诸如腐败、贫富差距、国企效率低下、资源过度消耗、环境严重污染等等,都不是什么新问题,其他国家都碰到过,既有解决得很好的成功经验,也有导致失败的惨痛教训。我们只要不戴有色眼镜拒绝他人的经验,解决这些问题并不难,关键是要丢掉斯大林版本社会主义的框框套套。用我们自己的聪明才智去解决遇到的问题。只要生产力发展了,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了,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越来越好了,这不就是我们追求的美好社会吗? ■

(作者为贵州省政协原副主席)  
(责任编辑 洪振快)

社科人文 文学小说 党建管理 经济管理 书画摄影

## 正规出书 约稿通知

**书稿内容:**(一)社科人文类书稿:回忆录、自传或人物传记、年鉴、社科著作等;(二)管理和学术类书稿:党建管理、行政管理、经济、金融或企业管理等研究专著;(三)文学类书稿:散文、诗歌、杂文、时评、游记、通讯等;(四)小说类书稿:历史、当代、言情、武侠、反腐等长篇、中短篇小说;(五)美术类:画册、书法作品集、摄影作品等。

**书稿要求:**书稿(作品)内容健康,艺术性强,底蕴丰厚,文笔流畅。字数为6-8万字以上,个人专著、多人合集均可,公开发表或未公开发表均可。

**出版发行办法:**以丛书形式或独立书号形式出版,以畅销书或合作出版方式运作;达到畅销书要求的,签订标准出版合同,按版税或买断方式支付稿酬;根据作品和作者意愿,面向国内或海外公开发行。其中国内公开发行的,由专业权威出版社出版,国家标准书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备案查询。

全国免费投稿热线:400-680-8368

投稿地址:北京朝阳区八里庄东里3号654信箱

综合编辑部收;邮编:100025

电话:010-57733088、57733087、57733086;

传真:010-89506878;在线投稿:bookbj@126.com

联系人:伽悦、高晶、文馨(编辑)

新书欣赏、订购,请登录:<http://www.bookhk.net>

北京东方朝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 代写个人传记、回忆录

- 专人为您代写个人传记、回忆录等作品
- 只要您口述就行了,其余交给我们来做

作为历史重大事件的见证者、亲历者,曾经刻骨铭心,曾经心潮澎湃。一幕幕、一件件,至今历历在目,难以释怀,成为一生中挥之不去的心结。

**把这一切忠诚的记录下来,著作成文字,留给后人,就可以世代代流传,成为历史长河中永不磨灭的记忆!**

专人代写、排版设计、出书,全程服务

贴心服务,关爱之至——您省心、放心!

24小时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08-8708

欢迎来人、来函、来电联系咨询或登录网站查询详情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路8号朗廷大厦A-308 邮编:100024

电话:010-65735038 57192223 传真:010-85785578

邮箱:bookzj@126.com 联系人:汪芳、顾娜、牛萍萍(编辑)

网站:<http://www.zuojia.com>

北京东方朝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 苏东剧变：回归人类文明

○ 韩云川

以苏联解体为标志的苏东剧变已经过去20余年了。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苏东剧变说明了什么问题？我们究竟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教训？这些都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弄清这些问题，对于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 一、苏东剧变的根源

关于苏东剧变的原因，人们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讨和分析。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外因论。认为苏东剧变是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结果。这实际上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如果这些国家没有变化的根据，那么无论西方怎样推行“和平演变”的战略都是徒劳的。再说，如果西方的鼓噪就能把社会主义搞垮，那么这种社会主义也太脆弱了。我们还是应该从内部寻找原因。

二是叛徒论。认为苏东剧变是这些国家党内出现了背叛社会主义的领导人物，使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毁于一旦。这也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观点。我们在研究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时，一定要防止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要知道，苏东剧变不是一次武装政变，也不是某些“坏人”阴谋的结果，而是这些国家人民群众的一种选择。承认这一点是要有一点勇气的。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不是戈尔巴乔夫，而是像勃列日涅夫那样的强权人物，将坦克开到某些国家的街头，结果会怎么样呢？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多只能延缓事变的发生。苏联1991年不也出现过“8·19事件”吗？它

为什么会流产呢？因为它不得人心。可以这样说，苏东剧变反映了苏联东欧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我们要搞清楚的是，苏联东欧人民为什么要变。

三是腐败论。认为苏东剧变是这些国家执政党的腐败和特权造成的，苏联官僚特权集团严重脱离群众，最终被人民群众所抛弃。这种观点从某一个侧面看，也有它的几分道理。但从根本上说这是倒果为因。这些国家的执政党为什么会出现腐败和特权现象？为什么会脱离群众？根子在哪里？我们应该揭示背后的深层原因。

四是争霸论，认为苏联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进行军备竞赛，对外扩张拖垮的。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美国不也在争霸吗？为什么美国就没有被拖垮呢？

五是模式论，或说体制论。认为苏东剧变是斯大林模式（体制）造成的。这种观点接近于问题的实质。但是，只要我们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就会发现，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模式（体制），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六是合力论。认为苏东剧变是各种因素综合的结果。这种观点不过是把前述各种观点加以综合而已。

还有人说，苏东剧变是20世纪之谜，解不开，想不透。问题真有这么复杂吗？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什么叫彻底呢？马克思有一个解释，“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我们在分析苏东剧变时，一定要注意抓住事物的根本。

苏东剧变原因看起来很复杂，其实很简单，就两个字：“偏离”，或者说“背离”。也就是说，苏联东欧的所谓社会主义偏离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当然是不能长久的。这种偏离或说背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经济上的偏离。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说：“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也就是说，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而不是人们主观意志的产物。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中也指出：“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任何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阶段，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持久巩固，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衰落。”无产阶级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夺取政权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不是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然而这些国家忽视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直接向所谓社会主义过渡。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脱离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片面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变革，形成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另一方面，抛弃市场经济，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确切些说是行政命令体制。政府直接控制企业的人事安排、财政收支、物资调拨。企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生产多少，都由政府部门决定，产品价格由政府统一规定，生产资料产品由国家统一调拨，消费品通过国营商业系统按规定价格销售。企业完全成了政府的附属物。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统制经济。这种统制经济与市场经济背道而驰，严重地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物质产品极度匮乏，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与周边国家相比差距越拉越大。这种统制经济是难以为继的。实践证明，在客观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由所谓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组织领导人民群众“创造”出一种“崭新的”社会经济形态的作法显然是行不通的。

二是政治上的偏离。

人类进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应该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继承和发展。具体说来是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的继承和发展。无产阶级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取得政权后，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

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任务，建立民主政治体制，而不是建立专制体制。不能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会随着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就自然而然地完成了。而“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没有去认真完成民主革命的政治任务，而是以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人权等存在局限性为借口而简单地将其加以抛弃。在政治实践中，过度地使用暴力，实行一党制、任命制，等，国家的重大事情由少数人决定。结果形成了一种极权政治。在这种体制下，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导致权力被滥用，民主流于形式，有的甚至连形式都没有。人民群众没有选举自由，没有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言论、出版等方面的实质自由（宪法上规定的这些自由不过是一纸空文），如果谁想行使这些自由，就会遭到无情的镇压。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子虚乌有。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受到严重的侵害。“十月革命”后不久罗莎·卢森堡就对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极权政治进行了严厉的抨击。她说：“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公共生活逐渐沉寂，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由此可见，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不仅如此，这种情况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暗杀，枪决人质等等。这是一条极其强大的客观的规律，任何党派都摆脱不了它。”罗莎·卢森堡抨击的这种极权政治到斯大林时期更甚，并被移植到其他国家。这种极权政治是专制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是官僚特权集团产生的土壤，是滋生腐败的温床。这种极权政治违背了人民群众追求自由民主生活的愿望和要求，侵犯了人民群众的权利，扼杀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与世界民主进步的潮流背道而驰。人民群众对这种状况早就不满了。一旦出现适当时机，这种不满情绪就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人民群众要求与这种体制



决裂就毫不奇怪了。

三是文化上的偏离。

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等等是人民群众反封建的重要成果,也是人类进步的方向。然而这些国家在思想文化方面严加控制。对于不同意见、不同观点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压制,甚至党内都没有发表意见的自由,人们因对事物的认识和看法不同而受到迫害的现象比比皆是。在这些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似乎社会主义与文化专制主义不可分割。苏联东欧国家的人们长期生活在文化专制的氛围中。人民群众的思想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成了一句空话。这种高度控制的意识形态管理体制与体现人类进步方向的思想自由原则背道而驰。它遭到人民群众的抛弃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总之,这种经济上统制、政治上专制、思想上控制的所谓社会主义背离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侵害了人民群众的民主自由权利,不符合人类进步的方向,人民群众抛弃这样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理所当然的选择。

## 二、回归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同时产生。既然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偏离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那么正确的做法就是回归。苏东剧变正是这种回归的表现。回归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开会情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政治文明。左图为1935年斯大林在苏联苏维埃七大上讲话;右图为2010年4月27日乌克兰议会同意俄罗斯租借港口,执政联盟和反对党两派议员因意见不合扭打在一起,议长弗拉基米尔·利特温撑伞避鸡蛋。

一是回归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经历了一个从传统市场经济到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有效方式,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在向市场经济回归的过程中,列宁走了第一步,邓小平走了第二步。1921年春,为了纠正军事共产主义的错误,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报告,决定以新经济政策取代已实施三年之久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就是允许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存在的政策,就是允许一定程度的贸易自由的政策,实质上就是利用市场机制发展国民经济的政策。新经济政策与其说是一种退却的政策,倒不如说是一种回归的政策,即回归市场经济的政策。如果列宁多活若干年,或许他能够进一步认识这个问题,逐步引导俄国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取向可以说是新经济政策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是进一步向市场经济回归。苏东剧变也不过是向市场经济回归而已。我们在改革的过程中一定要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确实起到基础性的作用。

二是回归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是人类最伟大的创造。民主越发展,经济越繁荣,社会越稳定。只有民主政治体制,才能够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使国家大事由人民群众而不是由少数人来决定,使国家公职人员由人民群众而不是由少数人来选择、来安排,使权力能够受到有效的制约。只有民主政治体

制,才能真正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才能消除国家公职人员的腐败现象,国家才能长治久安,社会才能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苏东剧变体现的正是向民主政治的回归。有些国家后来发生的所谓颜色革命,只不过是这种回归过程中的余波或插曲而已。

我们在改革的过程中,要切实建设民主政治。由于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特别漫长,专制主义传统根深蒂固,因此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任务还相当繁重。

切实建设民主政治体制,首先要有理论勇气。要敢于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没有理论上的突破,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就迈不开步子。换句话说,没有理论上突破,就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性进展。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我们应该拿出像经济体制改革那样的理论勇气来。

切实建设民主政治体制,还要有政治勇气。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顾虑太多,要敢于触及敏感的问题,要敢于动真格的。要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依归,而不能以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为依归,不能维护一己的私利。我们政治体制中的许多弊端早解决比迟解决要好。否则就会积重难返,迟早是会出问题的。

切实建设民主政治体制,还要有政治智慧。这种政治智慧不是表现在想方设法来维持现状上(这不是智慧,是愚蠢),而是表现在政治体制的设计和 political 体制改革的进程上,既要使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实质性的进展,又不至于引起太大的社会动荡。也就是说,用尽可能小的政治成本获取尽可能大的政治收益。在这里,敷衍塞责和盲动都是对历史、对人民不负责任的。我们常说政治体制改革要循序渐进,循序渐进关键是要进,不能原地转圈。原地转圈不符合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要求,也违背人民群众的意志。原地转圈就会耽误改革的时机,损害中华民族复兴的事业。当然我们也不能冒进,而应该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逐步推进。在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注意学习、借鉴西方民主的

经验。西方的许多民主形式属于人类政治文明的成果,我们不能采取排斥的态度,而应该认真地吸取。如果我们不能切实建设民主政治,就会成为时代的落伍者,甚至沦为阻碍社会进步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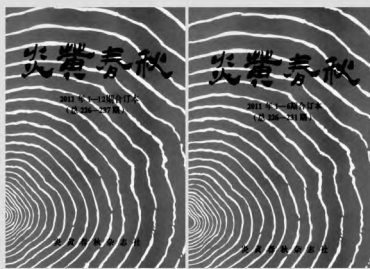
三是回归思想自由。思想自由是人的自由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也是社会活力的源泉。没有思想自由,就谈不上人的自由,社会就失去了活力。我们看到,苏东剧变就思想文化领域而言,不过是向自由思想回归而已,也就是回归信仰自由和表达自由,这符合人类的进步方向。我们在改革的过程中,要充分保障人们的思想自由以及各种自由,而不是加强思想控制,限制自由。这就需要我们改革高度控制的意识形态管理体制为允许不同观点、不同学派可以自由交流和讨论的体制。这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指马克思主义体系内的交流和讨论;二是指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交流和讨论。无论哪种情况,都有助于我们探求真理。如果在思想文化问题上随便给人戴帽子、打棍子,那实际上还是没有跳出专制主义的圈子,迟早是会出问题的。我们是共产党人,不是专制主义者,没有必要害怕人们说话。我们在意识形态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建立允许不同观点、不同学派自由交流和讨论的机制,使不同的意见有表达的渠道、阵地、方式和氛围。这样,有利于理论的发展、文化的繁荣、科学的昌盛、社会的稳定、人类的进步。■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

(责任编辑 洪振快)

## 炎黄春秋2011年合订本

最新推出



简装一册本 110元  
简装上下两册本 120元

本社发行部是《炎黄春秋》杂志合订本惟一正式发行渠道

合订本邮购免收邮费,订购者请通过邮局直接将款项邮寄本刊发行部。

务必在汇款单上填写清楚收件人详细地址、姓名、邮编、要求以及联系电话。

2009年、2010年合订本(均为上下两册,每年105元)存量稀少,如需要,请直接汇款购买。



# 盛世才统治新疆始末

○ 智效民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一大批中共高级领导人和“左翼”文化人士去过新疆,其中包括周恩来、王明、康生、任弼时、毛泽民、陈云、李先念、邓发、周小舟、滕代远、俞秀松、陈潭秋、方志纯、孟一鸣、林基路以及杜重远、茅盾、张仲实、王为一、赵丹等等。他们有的是路过,有的是到那里工作。另外,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后,尽管只剩下三万余人,但还是组织两万多人向西挺进。因此人们自然要问:在那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他们为什么要做出如此选择呢?这一切,都与被称为“新疆王”的盛世才有关。

## 一、1928年“七七”事变

介绍盛世才之前,需要先了解一下民国以来新疆的政治概况。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迪化(今乌鲁木齐)和伊犁两地的革命党人立刻发动起义以示响应。结果,迪化起义因遭到新疆巡抚袁大化的镇压而失败,伊犁的革命党人则取得了胜利。1912年1月,伊犁都督府成立以后,曾经派兵进攻迪化,但由于南北议和的消息传来,双方息兵停战。不久,袁世凯任命原新疆按察使兼镇迪道杨增新为新疆都督兼民政长,从此新疆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代。

1914年6月,杨增新担任新疆将军,1916年7月任督军,1925年1月改任督办,一直掌握着新疆的军政大权。作为民国的封疆大吏,杨增新始终以保持新疆的稳定和统一为使命。他深知如果新疆出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他曾经说过:“设若新疆一旦政纲失握,外有强邻之虎视,内有外蒙之狼贪,恐此大好河山将沦陷于异族之手。”与此同时,他对于内地的政坛风云和军阀混战,采取了“认庙不认神”和“纷争莫问中原事”的态度;对内地到达新疆的人员,则注意严加防范。1928年7月,杨增新发表承认南京国民政府的通

电,因此被任命为新疆省主席兼保安总司令。就在这时,新疆交涉署长兼军务厅长樊耀南突然发动政变,将杨增新杀害。

辛亥革命爆发后,樊耀南先后担任新疆法政学堂教员和副总统黎元洪的顾问。1917年黎元洪当了总统以后,任命他为新疆阿克苏道尹,后来又担任迪化道尹兼军务厅长、交涉署署长和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监督(校长)等职。1928年7月7日,新疆俄文法政专门学校举行首届毕业典礼,邀请杨增新等政要参加。典礼结束以后,樊耀南举行宴会。宴会期间,杨增新被樊耀南埋伏的杀手杀害。

正当樊耀南以为大功告成,前往省长公署宣布执政时,民政厅厅长金树仁一面派部队固守要隘,保护省城,一面率省政府卫队包围省署,并且在混战之中活捉樊耀南。这一事件在新疆历史上被称为“七七”事变。

“七七”事变后,金树仁将樊耀南用残酷的磔刑处死,然后召开各级军政要员会议宣布事变经过。于是他被推举为新疆省政府临时主席兼总司令。随后,南疆北疆的军事将领和少数民族的王公贵族也纷纷通电表示拥护。1928年11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为了承认新疆“七七”事变之后的现实,正式任命金树仁为新疆省政府主席。

## 二、1933年的“四一二”政变

金树仁主政新疆后,在继承杨增新统治方略

北京回忆久久文化传媒  
特 约 刊 登  
回忆久久为您撰写回忆录  
咨询热线: 400-653-6199



盛世才送给瑞典著名考古学家、探险家斯文·赫定的照片的基础上,又有很多创新。当时新疆孤悬塞处,外敌窥伺已久,而中央政府又鞭长莫及,一旦发生冲突,后果不堪设想。为了巩固国防,加强军队建设,金树仁于1930年派省府秘书长鲁效祖到上海、南京等地延揽军事人才。当时正在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担任科长的盛世才表示愿意到新疆效力,于是他辞去原来职务,取道苏联,于这一年年年底到达新疆。

盛世才入疆后,由于他来自南京政府参谋本部,金树仁对他颇有戒心,只给了他一个闲职——督办公署上校参谋主任。在此期间,盛世才委曲求全,唯命是从,想方设法获得金树仁信任。不久,他担任军官学校战术总教官,这为他拉拢学生、培植亲信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1931年2月,哈密王府军官和加尼牙孜、总管尧乐博斯发动武装暴动,甘肃马仲英乘机率部入疆,致使新疆陷入大规模民族仇杀之中。金树仁先后派鲁效祖、张培元为总司令,盛世才为参谋长率部进剿,终于在9月将马仲英以及和加尼牙孜击败。1932年,马仲英派马世明联合和加尼牙孜进攻哈密,盛世才出任东路剿匪总指挥,

又将敌人击退。1933年初,马世明率部进犯,盛世才两次解围,再次打败马世明。盛世才的屡战屡胜,使他获得“常胜将军”的美誉。

1933年4月12日,新疆省政府参谋处长陈中,联合迪化县县长陶明樾、航空学校校长李笑天等人,在“归化军”首领巴品古特的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归化军”由十月革命以后流亡到新疆的白俄组成。

政变爆发后,金树仁逃离迪化,并命令盛世才率部火速返回省城平乱。与此同时,政变领导人陈中也派人到盛世才的驻地,要他支持政变,共同主持新疆局势。第二天盛世才率部到达迪化城外,但是却按兵不动。这时,陶明樾找到东北义勇军的首领郑润成,请他出兵支援。东北义勇军参战以后,迫使据守城内的军队很快投降,陈中等人遂控制了局面。4月14日,政变发动者召开会议,一致推举盛世才为新疆临时督办,推举教育厅厅长刘文龙为新疆省政府临时主席。这次事件在新疆历史上被称为“四一二”政变。

### 三、盛世才控制新疆局面

盛世才上台后,南京中央政府于6月10日派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飞抵迪化,名为“宣慰”,其实是为了调查“四一二”政变的真相。黄慕松下车伊始,便与陈中等人联系。他们的密切来往,引起盛世才的猜忌。盛世才害怕陈中等人联合黄慕松取代他的地位,便决定先发制人。6月26日,他以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为名,在督办公署花园埋伏杀手,将应邀前来的陈中、陶明樾、李笑天等人逮捕,随后即以“谋叛罪”将他们押到东花园击毙。于是,在盛世才的逼迫下,作为“钦差大臣”的黄慕松只好悄然返回内地。面对这一局面,南京政府因为鞭长莫及,只好顺水推舟,任命盛世才为新疆督办,刘文龙为新疆省政府主席。这一年年年底,盛世才又以涉嫌谋叛的罪名,将刘文龙及其全家软禁,并指定年迈多病的朱瑞墀担任省政府主席。朱瑞墀于第二年3月病死,盛世才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开始对新疆实行独裁统治。

当时,新疆还有马仲英和张培元两股势力,与盛世才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马仲英拥有兵

力万余人,活跃于北疆等地。张培元有8000多人,占据伊犁一带。盛世才上台以后,马仲英和张培元先后率部进攻迪化,对盛世才形成夹击之势。盛世才除率部迎战外,还向斯大林求助。1933年10月,他派自己的外事处长借口去苏联治病,赴莫斯科与苏联当局接洽。随后,他从前线返回迪化,与苏联特使签订了秘密协定,其中包括苏联向盛世才提供300万卢布的军火(内有30架飞机和机枪、通讯器材)等内容。作为回报,盛世才答应向苏联出让开采黄金、石油和矿山的权利,以及在新疆修筑一条通向苏联的铁路。此外,盛世才还答应要在新疆“推行和扶植共产主义观念”。

在此前后,盛世才与苏联驻迪化总领事保持密切联系。他经常邀请总领事到家里做客,饭后还请对方参观自己的书房,并且说他在学生时代就信仰共产主义,书架上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问题》等著作,就是他的秘密藏书和必修之课。除了这种“精神贿赂”外,当客人离开时他还有贵重礼物相赠。因此,苏联总领事向莫斯科汇报:盛世才相信共产主义,对马列主义研究颇有心得。

不久,斯大林派红军进入新疆,换上中国军队的服装,先后将张培元、马仲英击败。张培元被迫自杀,马仲英也退往吐鲁番、喀什一带。在此之前,盛世才还以召集军事会议为名,把东北义勇军首领郑润成等人逮捕并处绞刑。至此,盛世才在斯大林帮助下消灭了全部异己势力,牢牢地控制了新疆的局面。

为了帮助盛世才在新疆建立苏维埃政权,斯大林除了直接派兵和提供大量军事援助外,仅仅在1935年8月,就向新疆贷款500万卢布,1937年1月又贷款250万卢布。在管理方面,苏联向新疆派遣政治、军事、财政等方面的顾问和专家300余人,其中有不少人是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培训过的中共党员或加入苏联共产党的中国人。

鉴于盛世才的上述表现和斯大林的战略决策,共产国际于1934年曾指示中共中央要重视新疆问题,并要求把新疆作为通向苏联的国际通道。于是,究竟是西进还是北上,便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争论的一个主要问题。关于这一点,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长征期间,他

与毛泽东在懋功会晤,当时他根据自己掌握的情报,知道苏联在新疆有相当力量,如果红军向那里转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毛泽东也认为,“新疆倒是红军可以休养整理的地方,只是离中国内地太远”。这一选择被张国焘称为“西进计划”。张国焘还说,由于当时还没有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因此无论西进还是北上,目的都是要背靠苏联。这些内容对于解读中国近现代史,颇有帮助。

1936年4月,盛世才在苏联的帮助下,颁布以“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为内容的“六大政策”。一时间,新疆各地红旗飘扬,到处悬挂着斯大林和盛世才的巨幅画像。

#### 四、全面奉行亲苏亲共政策

两个月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经过新疆,要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于是他成为中共与盛世才最早取得联系的一位负责人。随后,中共中央提出“宁夏战役”计划,其要点是:1.占领宁夏,控制河西走廊,打通与苏联的陆上交通;2.与东北军进行合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该计划经共产国际批准后,由中国工农红军组织两万多人的西路军渡过黄河,经河西走廊向新疆挺进。

同年10月,共产国际派正在莫斯科的陈云和滕代远率代表团专程赴新疆接应。在离开莫斯科之前,陈云向季米特洛夫提出需要大批军火的要求,季米特洛夫经苏共中央批准,准备了90辆坦克、90门大炮和其他武器弹药,一并运往中苏边境。12月中旬,当陈云、滕代远率代表团抵达靠近新疆的霍尔果斯时,看到苏联已经准备好大批坦克、大炮等军事物资。但是,由于西安事变的爆发,苏联当局改变原有计划,陈云以及大批军火滞留在中苏边境的苏联一侧。这时,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遭到马步芳和马鸿逵的顽强阻击,再加上中央指挥失当,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1937年4月,西路军残部1000余人被困在祁连山一带,当时还滞留在中苏边境的陈云受命去号称“新疆东大门”的星星峡接应。为此,盛世才派出专人专车,把陈云、滕代远等人从边境对面接到迪化,并专门设宴招待这些远方的朋友。随



后,他根据陈云的建议,派数百名官兵和数十辆军车,载着粮食、军装等大批物资,由迪化出发,前往星星峡寻找弹尽粮绝的西路军残部。当李先念等西路军残余人员被找到时,他们对盛世才伸出救援之手感动得流下眼泪。

1937年5月,西路军残部400余人到达迪化,以督办公署“新兵营”的名义进行训练。这些人由盛世才提供给养,由苏联提供枪支、弹药、坦克、火炮、装甲车等军事装备。两年后,其中30多人被选送苏联,继续学习军事技术。同年10月,毛泽东派周小舟赴新疆与盛世才商谈建立八路军办事处事宜。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成立后,周小舟、滕代远先后担任办事处主任。

### 五、盛世才提出加入中共的要求

1937年11月下旬,王明和康生从苏联回国路过新疆,受到前所未有的欢迎。利用这次会面的机会,盛世才向他们提出两个要求:一是请延安派更多的干部到新疆来工作,二是他自己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对于第一个要求,王明立即答应;但是对第二个要求,却因为事关重大,王明无权决定。据说,当时王明和康生听了盛世才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话以后,非常吃惊。大家觉得:“盛世才如能加入中国共产党,岂不意味着沃野千里、与苏联为邻的新疆,不费一枪一弹便成了共产党的天下?!”(袁南生:《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下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52页)

据《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一书分析,盛世才的要求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兴趣和重视。证据之一是毛泽东把他的弟弟毛泽民等数十名亲信派往新疆,并被盛世才委以重任;证据之二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了盛世才的入党要求。因此,1938年3月任弼时到莫斯科汇报工作路过新疆时,曾经对盛世才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他入党,但这件事必须先请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

这时,盛世才与苏联的关系更加密切。1938年初,苏联未经我国中央政府同意,就派一个骑兵团和一个空军支队进驻哈密。为了掩人耳目,该团采用新疆地方军队的番号,对外称归化军骑兵第八团,简称“红八团”。这个团的实际人数有

一个旅之多,是一支配备飞机、坦克的机械化部队。它不仅严重地侵犯了我国主权,还扼守着我国内地通往新疆的咽喉要道。

与此同时,盛世才还先后办了三件大事:一是以新疆各族人民支援抗战的名义,将大批衣物和军火运往延安;二是根据陈云带来的指示,尽快从新兵营中选拔一批优秀人才到新疆航空学校和兽医学校学习专门技术;三是经八路军办事处第二任主任邓发同意,从新兵营调黄火青担任“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秘书长兼审判委员会委员长。

### 六、盛世才秘密加入苏联共产党

为了进一步讨好苏联,盛世才觉得有必要亲自去苏联一趟。于是在1938年8、9月间,盛世才携全家以妻子“看病”为名秘密前往莫斯科。

对于盛世才访问苏联,国民政府并不知道。曾经长期在中国工作过的苏联外交官A.M.列多夫斯基根据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档案和相关资料,对这次会谈作了介绍。列多夫斯基说: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盛世才。当他回答了斯大林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新疆的托派、军队、资源和民族问题等等)之后,还向对方提出了加入苏联共产党的要求。下面是有关这方面的档案资料:

会谈记录中指出,他(盛世才)对自己要求入党的愿望作出的解释是,他了解马恩列斯的学说之后,知道这是惟一必须信奉的学说,况且他根据经验确信,世界上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践中援助较弱小的和被压迫的民族,所以他要求入党的愿望增强了。现在他得到了这样幸运的机会,亲自同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斯大林同志交谈,因此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来表达自己的要求。如果斯大林同志认为可以接受他入党,那他是很幸运的。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如果督办非常坚持这个要求,那他不反对,但是伏罗希洛夫同志说,这会损害督办的工作,因为蒋介石和杨大使(中国驻苏大使)知道后都会很不满的。

督办回答说,这需要保守秘密,无论蒋还是杨都不知道此事。([俄]A.M.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

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23页）

上世纪50年代，已经到了台湾的盛世才也谈到当时的情况。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

我对斯大林说：“我是马列主义的忠实信徒。一九三七年，我通过陈绍禹、康生和邓发，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政治局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绍禹、康生、邓发、陈云和任弼时等人对此一致同意了，但又说要与第三国际商量之后再作最后决定。”最后我说：“我希望能迅速受到党的考验和教育。所以，我也很渴望知道你们（引者按：指斯大林等人）关于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定。”斯大林立刻明确地回答说：“你现在就可以入党。你回新疆之前，我会再次和你谈这个问题。”（转引自李嘉谷：《新疆军阀盛世才秘密加入苏联共产党》，《百年潮》2000年第8期）

接下来盛世才继续写道：“当我们正准备返回的时候，一位党的官员带着斯大林的指示来旅馆拜访我。根据这个指示，这位格鲁吉亚独裁者（引者按：指斯大林）个人的意见是给予我特殊的照顾，立即吸收我加入苏联共产党。换句话说，即使我是中国人，也可以做俄国共产党员！这位特使又要我签署了服从莫斯科政治局的宣誓书，而在这之后我将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我犹疑不定的心情安静下来之后就表示了同意。以后不久，第二位官员给我带来了党证，号码是1859118和一本党章。”（同上）

随后，盛世才还与苏联签订了不平等的《新苏租借条约》（亦称《锡矿协定》）。条约签订后，苏联在新疆获得了驻兵、采矿、征用土地、出入境运输、利用一切自然资源、装设电话和无线电台等特权。为此，美国历史学家艾伦·惠廷认为：这个“协定给予莫斯科在新疆享有非常广泛的特权，以致使新疆成为一个既不受乌鲁木齐控制也不受中央政府控制的国中之国”。（《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下册，第657页）

盛世才与苏联反目以后，曾经向蒋介石描述了这个条约的签订过程。他说：“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间，苏联派员秘密到新疆来，给我一个绝对秘密文件，系租借新疆锡矿条约，内容非常荒谬与不合理，完全带有侵略性质。彼时职要求修改内容，以及缩短租借年限，苏方来员答复谓：你一个字都不能修改，你系联共党员，应该服从党的

命令，更应该为苏联的利益作斗争。”（同上，第657～658页）

此外，在1941年1月，盛世才再次向苏联提出成立新疆苏维埃共和国并加盟苏联的要求，但斯大林基于其战略利益的考虑，还是没有答应。

## 七、毛泽民执掌新疆财政大权

如前所述，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一大批中共领导人来到新疆工作，或者是经过新疆前往苏联“看病”，毛泽东的大弟弟毛泽民就是其中一个。

1938年2月，毛泽民偕第二任妻子钱希均（第一任妻子系小脚妇女王淑兰）赴苏联“看病”，从延安路过迪化。盛世才要求他留在新疆，他经过中共中央批准，化名周彬留了下来。盛世才任命他为省财政厅副厅长，代行厅长职务。

同年4月，毛泽民写信向中共中央汇报新疆的财政情况和改革新疆财政的设想之后，又提出两个要求：一是请党中央派一批能理财、懂会计的干部来新疆工作，二是希望把陕甘边区政府制定的关于财经方面的法令、文件寄过来，以备参考。为此，毛泽东在批示中说：“请陈云同志替他办，财政事情第一要紧，不但那里好，将来也大有助于我们。”（《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斗争纪事》，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17页）随后，中共中央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选派一批党员干部，乘汽车来到迪化，其中有毛泽民的第三任妻子朱旦华。

朱旦华来到新疆以后，先在迪化女中担任教导主任，后来又担任反帝会女中分会指导，省政府政务委员会委员和省妇女协会秘书长等职务。反帝会的全称为“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是盛世才成立的一个类似政党的组织。它的会长是盛世才，历任秘书长是俞秀松、黄火青、万献廷、王宝乾等共产党人。

1938年9月底，新疆召开第三次全省代表大会，期间毛泽民由财政厅副厅长改任代理厅长。

毛泽民掌握新疆的财政大权以后，认为新疆币制不统一给流通带来很大不便，于是他进行了币制改革。为了贯彻新的税制政策，毛泽民在全省财经系统和各地税务部门安排了大批共产党员担任重要职务。

1940年2月,毛泽民从苏联“看病”回来以后,他的妻子钱希均已经离开新疆返回延安。钱希均后来回忆:“当时,我很想不通,苏联派来许多飞机,运来大量的物资支援中国的抗日,我们不去抗日前线,却在这里与军阀搞统战。”于是在1939年冬党组织同意她返回延安,并批准了她的离婚要求。(参见《革命与爱:毛泽东与毛泽民的兄弟关系》,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版)

1940年5月,毛泽民经邓发介绍与朱旦华结婚。第二年他们的儿子出生,毛泽民为了纪念这个出生地,为他取名毛远新。

## 八、杜重远“四渡天山”

就在盛世才访问苏联的时候,斯大林发动的“肃反”运动已经进入高潮。当时,所谓第三次“莫斯科审判”刚刚结束。这次审讯的对象是以布哈林、李可夫为首的23人,罪名是“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审讯结束后,布哈林和李可夫等20人被秘密判处死刑。随后,被称为“杀人魔王”的叶若夫,也因为其助手贝利亚的告发被处死。与此同时,就连斯大林、加里宁、莫洛托夫等人的家属和亲戚,也纷纷被逮捕或处决。

从苏联“取经”回来以后,盛世才以斯大林为榜样,开始了大清洗运动。时任新疆学院院长的杜重远就成了第一个清洗对象。

杜重远原名杜乾学,1897年4月27日出生于吉林省怀德县,1917年东渡日本攻读陶瓷制造专业。1923年毕业回国后投身于实业救国的同时,曾发动抗日示威抵制日货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他化装逃往关内,在上海与周恩来取得联系,并买下位于淮海中路的一幢花园洋房。从此,这里就成为中共特工密使、上海救亡人士以及政府高官要员来往活动的场所。1933年,邹韬奋、胡愈之主持的《生活》周刊被查封后,杜重远于第二年创办《新生》周刊,其寓意和目的显而易见。

1935年5月,《新生》刊登《闲话皇帝》一文。该文因涉及日本天皇而受到日方非难后被上海当局查封,杜重远也因此锒铛入狱。1936年春,杜重远“因病”获准在上海虹桥疗养院就医,张学良曾化装赴上海探望。借此机会,他向张学良提

出与中共以及杨虎城、盛世才实现西北大联合的建议。不久杜重远提前出狱,赴西安与张学良共商大计,并参与策划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杜重远在太原与周恩来再次会晤并达成共识。他们认为,抗战的胜利取决于中苏联合,而新疆既是中苏联合的交通要道,又是抗日战争的重要根据地。因杜重远与盛世才有同乡、同学之谊,周恩来建议他去新疆工作。

1937年10月13日,杜重远“一渡天山”来到迪化,受到盛世才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款待。盛希望他能够留下,但杜没有答应。杜重远返回内地后,在邹韬奋主持的《抗战三日刊》连续发表《到新疆去》的通讯。后来,他把这些通讯汇集为《盛世才与新新疆》一书,由生活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面世后,在社会上反响很大,许多年轻人因此对新疆产生了浓厚兴趣,纷纷要求到新疆去。

1938年6月杜重远“二渡天山”赴新疆考察,但他因为当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要参加即将召开的大会,于7月初匆匆离开迪化。不久上海沦陷,杜重远把家迁到香港,与上海《立报》总编辑萨空了一同来到武汉,在胡愈之的住处见到周恩来和叶剑英。周恩来再次鼓励他们前往新疆,于是杜重远于10月初乘飞机“三渡天山”抵达迪化。

随后,盛世才委任杜重远担任新疆学院院长,萨空了担任《新疆日报》社副社长。为了安心工作,二人返回关内迎接家眷。1939年1月,杜



1937年8月,杜重远(后排左一)与马相伯(中坐者)及七君子在南京的合影



重远辞去国民参政员、国民政府监察委员的职务，谢绝了美国友人劝他去美国办实业的邀请，带领全家“四渡天山”来到迪化。

第二年2月，茅盾和张仲实（马列著作翻译家）应杜重远邀请来到新疆，分别担任新疆学院教育系和政治教育系主任。随后，茅盾又担任新疆文化协会委员长兼艺术部部长，于是他又把王为一、徐韬、赵丹、叶露茜等人请到新疆，成立了新疆实验话剧团，并排演了著名的话剧《战斗》。赵丹来新疆之前，曾向茅盾打听情况，但因为盛世才严格检查出入新疆的书信，所以茅盾不敢以实情相告。赵丹到达新疆以后，才知道这里的情况和他想象的大不一样，这让他追悔莫及。

1939年9月，周恩来路过新疆去莫斯科治病时，盛世才设宴招待，茅盾也应邀出席宴会。当时茅盾想送孩子去苏联留学，便悄悄托邓颖超给瞿秋白的第二任妻子杨之华捎信。后来杨之华回话说：只有中共领导人的子女，苏联才接纳上学，你的两个孩子不符合这个条件。

## 九、新疆开始大清洗运动

1939年下半年，杜重远发现盛世才对他不怀好意，便以生病为由提出辞呈，盛世才立刻同意并把他软禁起来。1940年2月，萨空了因调解盛世才和杜重远的矛盾无效，怕自身难保，便找借口离开新疆。为了营救杜重远，他在临行前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并把这封信留给毛泽民，请他等周恩来回国时转交。据说周恩来回国路过新疆时，曾与盛世才交涉，要杜重远与他同机返回关内，盛推托说：“等下次飞机送他返回关内。”同年5月，茅盾和张仲实看到形势不妙，也以母亲病重为由，请假返回内地。在此期间，盛世才又炮制“阿山案”、“回案”、“崔荣昌案”、“六星社案”等一系列案件。

1940年6月22日，中共驻新疆办事处主任陈



1937年，中共选调红军干部参加盛世才扩建的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学习。盛世才公开反共后，1942年9月，航空队的全体共产党员被软禁，后被囚禁。抗战胜利后，经中共中央多方营救，这批人员于1946年6月10日得到释放，7月11日回到延安。图为回到延安的32人合影。

潭秋向延安汇报工作时写道：“新疆政治危机日渐严重，督办在民族问题上，将蒙、哈、柯族代表全部扣留，并将其中一部分逮捕。不久前，又逮捕哈族领袖沙里福汗。今年二月间，阿山哈族因拒绝而发生暴动，盛世才派军队和飞机去镇压，屠杀了数百人。逮捕了维族三领袖。弄得社会不安，人人自危。”此外，盛世才还多次发布公告，“号召公务员及民众互相监督和检举敌控奸细，托匪……并允许直接向他告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斗争纪事》，第52页）

1940年9月，盛世才曾派毛泽民审理杜重远案。杜在法庭上慷慨陈词：“我决非托派，硬说我是托派，此系最大痛苦者也，比受酷刑还苦。”第二年5月，盛世才以“汉奸”、“托派”和“阴谋暴动”等罪名将杜重远正式逮捕，受其牵连，赵丹一、王为一、徐韬以及包括财政厅长、边务处长、新疆一大批高级官员纷纷被捕，总数在1200人左右。

1941年冬，盛世才密电苏联当局，说新疆日报社社长王宝乾是“陈培生阴谋案”的幕后策划者，其目的是推翻新疆的现政府。他要求立即逮捕王宝乾，或将其调回苏联处置。1942年3月，盛世才的四弟、曾任新疆督办公署卫队团团和机械化旅旅长的盛世骥在家里中弹身亡，盛世才认为是盛世骥的妻子陈秀英和苏联军事顾问合谋杀害了他的四弟，并因此发动政变。于是他陈秀英投入监狱，严刑拷打，逼她承认自己的罪行。事后，盛世才写信向斯大林绘声绘色地汇报



1941年，国民政府趁纳粹德国攻苏，苏联无暇东顾之际，成功策动了盛世才反正，并不失时机地于1942年底1943年初派中央军进驻新疆，夺取和保证了中国对新疆的控制权。

了这一案件。当然，也有人说是盛世才杀害了他的四弟，原因是盛世琪与他政见略有不同。事情发生以后，陈潭秋向延安和莫斯科汇报说：“盛世骥成为盛世才反苏反共阴谋的牺牲者。”苏联当局得知此事后，认为这是盛世才为了投靠蒋介石所做的准备。为此，斯大林派外交部副部长德卡诺佐夫携带莫洛托夫的信来到迪化，试图阻止盛世才继续行动。两人见面后，德卡诺佐夫对盛世才说：“你是联共党员，要永远信仰马克思主义，不能动摇。”但是盛世才对他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了。……作为三民主义的忠实拥护者，我要在新疆建立民主统治。”

## 十、盛世才离开新疆

事情发生以后，陈潭秋向延安和莫斯科汇报说：“盛世骥成为盛世才反苏反共阴谋的牺牲者。”苏联当局得知此事后，认为这是盛世才为了投靠蒋介石所做的准备。为此，斯大林派外交部副部长德卡诺佐夫携带莫洛托夫的信来到迪化，试图阻止盛世才继续行动。两人见面后，德卡诺佐夫对盛世才说：“你是联共党员，要永远信仰马克思主义，不能动摇。”但是盛世才对他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了。……作为三民主义的忠实拥护者，我要在新疆建立民主统治。”盛世才的转变，可能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以及蒋介石的威望在抗日战争中不断提升有关。

1942年7月，蒋介石派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

绍良、行政院秘书长兼经济部长翁文灏、空军总指挥毛邦初等人乘机抵达迪化。经过谈判，盛世才答应中央政府的下列要求：  
1. 严防苏联在新疆各地发动骚乱事件；  
2. 由内地抽调军队来新疆加强防务；  
3. 在新疆成立国民党党部；  
4. 中共人员一律停止在各机关工作，并集中起来听候发落；  
5. 中央政府派人接收新疆航空委员会；  
6. 由外交部派人接管新疆外交办事处。

一个月以后，宋美龄飞抵新疆，代表蒋介石任命盛世才为新疆边防督办，同时兼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主任委员、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等职务。1942年10月，盛世才向苏联当局递交一份备忘录，要求苏联政府在三个月内必须撤走包括军事人员在内的所有非外交人员。随后，盛世才将中共在新疆的人员集中起来，由陈潭秋领导进行整风学习。不久，任弼时指示陈潭秋说，莫斯科同意把他们转送苏联，但是陈潭秋认为：“我们过境大成问题，我们将处于东归不得，西去不能的危险境地。”

1943年年初，盛世才将软禁的陈潭秋、毛泽民等人投入监狱。随后，重庆派内政部次长王德溥率人专程来到迪化，以“特派新疆审判团”的名义对他们进行审判。6月5日，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以“危害民国罪”被判处死刑。9月27日，这三个人和陈秀英等人被秘密处决，并呈报重庆验证。这一年，罗家伦以新疆监察使和西北考察团团长的名义来到新疆。当时苏联的红八团还没有撤离，因此他不无忧虑地说：“时新疆反侧初定，然俄军第八团及空军飞机一大队仍驻哈密，扼甘、新闻交通之咽喉，随时可以酿成变乱。”后来，在中国政府的强烈要求下，这支军队才离开新疆。

1944年8月，国民政府明令撤销新疆边防督办公署，任命吴忠信为新疆省政府主席，调盛世才回重庆，担任农林部部长。至此，盛世才结束了他对新疆的十余年统治。■

（作者为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 洪振快）

# 光明日报社的“反右”运动

○ 皮学军

1957年6月1日,储安平在李维汉主持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上做了“党天下”的发言后不久,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政治运动开始席卷全国。《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交通部部长兼光明日报社社长章伯钧首遭讨伐、批判。接着,光明日报社上至副社长、下至伙夫等,都跳出来揭批储安平、章伯钧(因章伯钧是“大右派”,写他的文章已经很多,本文不再详述其事)。至1959年,光明日报社共揪出了除储、章以外的其他17名“右派分子”。

## 一、批判储安平的“右派”言行

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后来回忆,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并没有提出要“反右”。但是,“5月中旬已经放出一些不好的东西,什么‘轮流坐庄’、‘海德公园’等谬论都出来了,毛泽东同志警觉性很高,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们自己头上……就在5月15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同志已经下定反右派的决心”。当时,毛泽东的这篇《事情正在起变化》“秘而不宣,以便把更多的‘蛇’引出洞来”。

中共中央的整风运动指示是4月27日发布的,到5月15日毛泽东写这篇《事情正在起变化》,前后只有18天。短短的18天,中国的政治气候,就开始起了180度的大转变。就连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中国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等,也是“利令智昏”地蒙在鼓里。

储安平的“党天下”言论出台后,最先对之“争鸣”的是民革成员陈建晨,她在民革中央委员于6月3日举行的第四次座谈会上说,“读了储安平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很不舒服。国务院

12个副总理当中虽然没有非党人士,可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国务院所属的部会都有不少非党人士,而民主党派参加革命的目的也不是为了争交椅”。谈到储安平说的关于联合政府的问题,她说,“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是抗日战争时期写的,不能把过了时的真理搬到今天来说,宪法上明白规定我们政权的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阶级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为什么还要退回去搞各阶级的联合政府”。6月6日,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邀请党外人士座谈,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对储安平发言提出批评。他说,认为“‘党天下’的思想是一切宗派主义最终根源”的说法,是“严重错误的”。此外,他还在这次会上宣读了一封骂他“为虎作伥”、“无耻之尤”的匿名信,并表示他不怕辱骂,不怕威胁,他还要讲话。

看来,该引出来的“蛇”都出洞了。6月8日,毛泽东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指示向中共党内发布。该指示说:“现在形势开始改变,我们形式上处于被动,实际上开始有了主动……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同一天,《人民日报》刊发了社论《这是为什么?》,指出有人向拥护共产党的人写恐吓信,这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从这天起,中央各大报的舆论开始转向,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

当时,储安平受到的批判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光明日报》内部员工贴大字报、座谈会上发言指责储安平,二是社会上的一些积极分子,三是来自全国各大媒体连篇累牍的讨伐文章。



6月7日,光明日报社有人贴大字报批判储安平,当时他还天真地认为“只是个人意见罢了”,但第二天读了《人民日报》社论后,“我看情况已不容许我在《光明日报》工作了”。

6月8日,石景山钢铁厂的工人,又一批批地轮番到储安平住所,登门“说理斗争”。据说,“闹得他24小时不得休息”。在此情况下,储被迫于8日下午至章伯钧家递交了辞呈,从此不再上班。他成了《光明日报》历史上最短命的总编辑——任期仅69天。

递交了辞呈,并不意味着储安平就能卸职,还要经《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决定。因此,虽然储安平不再主管总编事务,离开了报社,但还得接受来自各方的批判。除了外界媒体和民主党派对他的“党天下”的批判,还有报社内部员工对他的指责。

6月11日,民盟光明日报社支部举行全体大会,对储安平所谓“党天下”的言论“进行了严厉的驳斥,并坚决表示决不容许把光明日报拉出社会主义的轨道”。在大会上发言的有《光明日报》编辑部各部主任、副主任和部分编辑、记者:张荫槐、熊剑英、谢公望、黄卓明、潘文彬、陈季子、张又军、张西洛、徐亦安、丘林、巴波、王少桐、许子美、陈端绍、荒烟、于友,以及《新建设》杂志编辑主任刘一农等。张荫槐、丘林说,“储安平给党加上‘党天下’思想的荒谬帽子,是对党的歪曲和污蔑”。巴波(即《光明日报》记者曾巴波)说,“储安平的发言,实质上就是从政治上取消党的领导,取消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这不是思想方法问题,而是根本的政治立场问题”。但巴波晚年沉痛地说:“当时,我也认为这是为了党的利益,我也说了与事实不符的话,我不是没有内心矛盾,我认为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我还认为我战胜了我自己。之后,尤其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我才发现我这个驯服工具的灵魂是多么卑下、可耻。我这样说并不是要求别人原谅。”

6月14日,《光明日报》工厂和行政部的职工举行座谈会,“愤怒谴责储安平以本报总编辑名义发表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坚决表示要保卫社会主义阵地,粉碎储安平将报纸拉向右转的任何企图”。汽车司机赵文说:从储安平到报社来的第

一天,我就觉着他的思想感情跟我们不一样。接着他举出有一天储安平同他的一个朋友在车子里的谈话,说明储安平对共产党的感情是有问题的……储安平的“党天下”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要搞掉党的领导。

锅炉房工人张静如说:“有的读者,就到报社来责问我们:你们为什么有这样的总编辑?我回到家里,我的孩子问我:你们那个总编辑怎么回事?我们不能和这种人站在一起。”老工人冯桂林说:我街坊有个老太太,平常排队买猪肉,也常为此发牢骚,她听到储安平的这种反社会主义的谬论,很不满意,问我:“你们怎么有这个总编辑?”储安平想将《光明日报》开倒车,我们要坚决挡住他。此次在会上发言的有排字工人、轮转机工人、汽车司机、锅炉房工人、炊事员和行政管理人員等20多人。

6月15日,《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在会上主要讨论了“最近一个时期内,本报的基本政治方向,为什么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总编室主任高天(中共党员)和副主任张友分别作了“揭发储安平反动言行”的讲话,对储安平任总编期间在新闻采访、改版、组稿等方面的言行都进行了严厉的“揭露”与“批判”。并重点批判了储安平派记者到九大城市“点火”、“复旦大学取消党委负责制”的报道等。

此外,《光明日报》的文艺部(6月18日)、学校教育部(6月20日)、国际部(6月22日)、要闻部、美术组、共青团支部也都相继组织群众“揭露”、“批判”储安平在《光明日报》的“反动言行”。

7月13日,储安平在第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了《向人民投降》的检讨。7月15日,《光明日报》作了长篇检讨《本报在章伯钧、储安平篡改政治方向期间所犯错误的检查》后,报社和各界媒体重点对储安平和章伯钧的揭发、批判开始转向批判其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至1957年11月12日,作为《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储安平和《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被同时免职。在1958年1月18日至24日召开的九三学社第四届中委会第三次全会上,储安平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职务被撤销。1月31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召开,决定罢免储安平人大代表的资格。此后,储安平被一顶特大号的“大右

派分子”的帽子死死地扣在头上。自此，储安平办刊、办报、采访的生涯彻底终结，他重振自由主义的理想彻底破灭了。

几年之后，文革爆发。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著名“大右派”储安平也成为被“扫荡”对象。8月31日，遭受多次批斗后的储安平投河自杀未遂，被造反派押回九三学社，看管起来。1966年9月上旬失踪，至今下落未明。

## 二、批判其他“右派”的言行

1957年夏秋，储安平、章伯钧被打成右派后，《光明日报》内部也全力以赴转入“反右”。这时，光明日报社“反右”运动由党总支书记张友、编辑部党支部书记吴克之领导。张友是位很有同情心的老领导，当划定右派占报社人数的5%时，他就想收兵。为了“安全”起见，张友请示文化部整风领导小组：《光明日报》划的比例是不是多了？一位陈姓领导回答：“《光明日报》是重点，划右派没有比例，有多少划多少。”这个电话询问后来作为张友“反右”中的严重错误记入档案。也因这电话，光明日报社“右派”直至划到近20%的比例才罢休。当时不到80人的《光明日报》编辑部，1957年就划定了“右派分子”15人。在1958年“向党交心”运动中，于友、丘林又因言行“不慎”，被补为“右派”。这样，光明日报社除储安平和章伯钧外，共有“右派”17人：学校教育部主任潘文彬（笔名“文冰”），党派部第二主任王少桐，要闻部副主任张荫槐，国际部主任于友，编辑、记者郑笑枫、徐颖（女）、许子美、殷毅、钱统纲、萧恩元、谢捷（女）、欧至培、韩洪文、李笑、丘林、范愉曾、韩逸云。其中有5人被开除公职，交专政机关处理。

在储安平“篡改”《光明日报》的“政治方向”中，派记者到九大城市“点火”是其重要“罪行”。据7月15日《光明日报》的“检查”说：“储安平抓业务的第一步，就是抓出记者到九大城市召开座谈会，处处点火，打乱整风步骤”。去九大城市“点火”的记者：东北（王少桐、殷毅）、中南（潘文彬、丘林、钱统纲）两路“全军覆没”，西北组揪出了郑笑枫、韩洪文、欧至培，只有华东组幸免于

难。为行文方便，下面将大致按“点火”区域分别谈谈这些“右派分子”到底“右”在哪里，“错”在何处？

### （一）东北组右派——王少桐和殷毅

1957年4月末5月初，王少桐和殷毅被安排到东北去采访“民主党派鸣放座谈”。临行前，原总编辑兼党组书记常芝青紧急传达中央领导的重要指示（储安平到职后，常芝青并未调走，只是不参与业务领导，党的工作照管不误）：“中央对‘放’的方针是下了决心的，现在就是要排除一切阻力，贯彻这个方针。”“看来，中央贯彻鸣放的决心很大。”据殷毅后来的分析，“我并没有发现储安平交代的报道任务与常芝青传达的讲话精神之间有什么差异”。他说，“听了这个重要传达，增强了我的责任感，觉得应该加倍努力地完成这次报道任务。而后来的事实表明，正是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将我一步步引入了雷区”。

王少桐在抗战初期是国民党中央社西安分社社长，做过卫立煌的少将参议，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度任南京《新民报》总编辑，爱国民主人士（民盟盟员）。1950年从新闻总署调到《光明日报》，一直任编辑，1957年春被任命为报社党派部副主任。据同事郑笑枫回忆，王少桐被打成“右派”的原因是“因不受重用，有些怨气，在党组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发过几句牢骚”。但给他的“罪名”是“积极支持储安平到处点火又挑衅”。

8月4日，《光明日报》刊文批判王少桐说：“直到5月23日，当他们已经完成‘放火’任务回到北京以后多日，王少桐还利用沈阳师范学院右派分子徐公振的一封信作引子，向沈阳射出一颗‘远程导弹’。把20天之前沈阳民主党派人士所谈对于鸣放的认识加以歪曲报道，大字标题，造谣诬蔑‘沈阳知识分子还不敢大胆发言’”。

《光明日报》编辑部“检查”中认为：“最恶劣的如沈阳，主持这个工作的本报党派部第二主任王少桐，甚至采取了向中共省委书记‘将军’的办法，用对立的态度提出难题，例如什么‘这里鸣放不起来有历史根源，你的看法怎样？’”

据报社国内新闻记者张歌今“揭露”：王少桐和储安平“一拍即合”，“恰逢共产党整风，他便乘机向党进攻”。

“王少桐为储安平‘党天下’的谬论四处喝彩,说储安平的话是‘一针见血’,‘这一炮打得真响’!他还形容说:储安平的临场发言,‘有政治家的风度,不愧为老报人’。‘真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被打为“右派”后,王少桐被流放到了贵州,被安排在贵阳群众艺术馆当《群众文艺》的编辑。“文革”中,又受到残酷打击,1968年自沉乌江。据说,死得十分惨烈,他投江前虑及被人救起,身上绑了一块大石头,才纵身一跃,岸边留下一纸遗书:“供鱼鳖饱餐一顿,亦人生乐事也。”

殷毅,1950年从北京新闻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光明日报社工作,先是做总编室秘书,后在群众来信部,很少外出采访,也很少写通讯。鸣放中报社派他和王少桐去沈阳采访“民主党派的鸣放座谈”。

殷毅被打为“右派”,主要是因为“第一朵迎春花”。1957年5月中旬,殷毅参加了东北工学院机械系的鸣放座谈会,会上许多教师就工学院1955年肃反中出现的一些伤害教师、致使教师自杀的问题展开鸣放。一位教师激动地说:“东北工学院教工共2000人,肃反中受审查批斗的达数百人,最后落实有问题的仅数十人。错打了那么多人,请问焦书记(沈阳市委书记),东工的肃反,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席间不少人齐声附和:“请焦书记回答!”焦若愚回答:“东工的肃反是有错误的,市委已指示东工党委纠正错误,做好善后工作。”他巧妙地回避了所谓“主次”的问题。后来给殷毅说,“会上有人认为东工肃反错误是主要的,成绩是次要的。我不能表这个态,因为中央对肃反已经做了结论——成绩是主要的。”事后,殷毅根据在此地采访的情况写了《本报沈阳专电》(5月12日刊出)、《沈阳春训》,《沈阳春训》经总编室主任高天亲自改为《第一朵迎春花——记东北工学院机械系教师鸣放前后》后,5月24日作为头条刊于《光明日报》第3版。

7月,沈阳高等院校开展“反右”运动,东北工学院机械系鸣放主席团成员被指控为“右派小集团”,首先被揪了出来。中共沈阳市委机关报《沈阳日报》配发了该报记者李刚的通讯《迎春花掩盖下的第一枪》,揭发东工这个“右派小集团”

如何猖狂向党进攻,并指名道姓地说,“殷毅是储安平的使者”,说“也许殷毅(或储安平)认为吴从枋对这一枪的估价太低,索性改为‘第一朵迎春花’发表在章罗联盟把持下的全国性报纸《光明日报》上”。

这样,殷毅为响应号召,帮助党“整风”,结果被打成了“右派”。此后,殷毅被下放到当时的劳教农场之一——北大荒850农场。

## (二)中南组右派——潘文彬、钱统纲、丘林

1957年4月27日,潘文彬被派到武汉举行民主党派知识分子鸣放座谈会。后来,钱统纲、丘林也被派来支持潘文彬工作。但是,“党天下”言论出来后,潘文彬、钱统纲被打成“右派”,而在第二年的“向党交心”运动中,丘林被划为“漏网右派”。

潘文彬,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1949年曾协助李锐在长沙创办《新湖南报》,后来进《光明日报》工作,任教育部主任。1957年4月,他在去武汉“纵火”之前,采写了《春天的感应——访北大副校长汤用彤》《关于“六经注我”的谈话》《政治待遇与书斋生活》三篇采访知识分子报道。他还赶在4月27日清晨4时写完“五四社论”,“七时就动身到武汉去替储安平放火”。

潘文彬到武汉后,本来只要组织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开一个“鸣放”座谈会的他连续开了三个。他还撰写了《武汉书简》《四顾无知己比邻若天涯》两篇通讯,大胆地将知识分子的“怨气”“春风不度武胜关”、“春风已度武胜关”、“春风绕过武胜关,又吹到别地去了”写了出来,“到底度了还是没有度,是不是绕到别处了?有一位教授说,那只有春风自己知道”。这些报道在当时产生了广大的反响。7月,光明日报社“反右”进入高潮,在“鸣放”期间通讯写得漂亮,备受报社内外赞扬的潘文彬,成为报社的重点批判对象。

《光明日报》在7月19日的“检查”中说他写的“五四社论”是“本报利用社论形式,向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进行煽动的一篇具有纲领性的文章”;说他在武汉写的两篇报道是“强调所谓‘春风不度武胜关’、和党与知识分子关系不正常”,还说他操刀的《复旦大学取消党委负责制》是因为“他在思想上早就认为高等学校中的党委负责制‘毛病’很多,迟早要取消”。说潘文彬受储安



平指使撰写的《北大开辟“民主墙”》(5月26日)的报道“尽管他‘煞费苦心’,一点也不能避免这个报道的强烈的煽动作用和恶劣后果”。

在《光明日报》创始人之一谢公望的文章中,潘文彬更加“恐怖”:他写的“五四社论”是“射出了一颗向党进攻的信号弹”;说他写的《春天的感应》《关于“六经注”我的谈话》《政治待遇与书斋生活》是“散布火种,欲为“五四社论”安下伏笔,阴谋掀起一次所谓‘文化革命’”,“潘文彬要‘革’谁的‘命’呢?要掀起一场什么样的‘革命’呢?他是假借反对教条主义之名,来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说“他一到武汉就拍来一条《武汉知识界的鸣放密云不雨》的电讯,鼓动群众向党进攻,以便打乱当地整风步骤”。“他在武汉又写了两篇全篇都没有一个真实姓名的通讯,潘文彬借用‘一位先生’、‘一位教授’之口,骂尽了共产党和新社会。”最后谢公望说,“我们要正告潘文彬:在你根深蒂固的反共思想支配下的点火活动,罪恶昭彰,不要再怙恶不悛,自绝于人民”。

就这样,潘文彬成了“右派”分子。7月后,潘又被升格为“极右分子”,报社对他的处理是第一类第二种,即“保留公职,劳动教养”。

一天半夜,“老潘被抓走了”,老工友说,“那么大冷天,老潘只穿一件呢大衣,抱床被子就走了,别的什么也没带。我听公安局的人问他:你怎么连个脸盆也不拿?老潘说,脸都不要了,还要脸盆干什么”。潘文彬被送到兴凯湖公安局农场劳改,后在“文革”中默默死去。

钱统纲被打成“右派”的经过令人感到滑稽。“大鸣大放”时,报社领导派他去中南地区“推动鸣放”。他被请去参加武汉大学学生会的鸣放座谈会。会上,学生们一定要他讲讲话,并要求《光明日报》一定要刊登他们鸣放的消息。钱统纲平素谨言慎行,尽管他再三推辞,还是经不起学生们的齐声要求,只好简单敷衍了几句:“《光明日报》虽然派我到外地报道鸣放,但报道对象主要是知识界的上层人士。对于同学们要求鸣放,我是同情和支持的,因为鸣放是中央提出来的。”“然而同学们的鸣放,不在我的报道范围之内,即便报道了,《光明日报》是否刊登,还得由报社领导决定”。说完,他就离开了会场。第二天一大早,他就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至于学生

们是否鸣放,或怎样鸣放,他都全然不知。

不久,“反右”风声骤起,储安平被定为“大右派”后,钱统纲也因“同情、支持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成了一名“右派”。然而事实上,武汉大学的男女学生们那一天并没有鸣放,仅仅是要求鸣放而已,压根儿谈不上“进攻”,怎能定他为“右派分子”呢?最终,钱统纲接受了“开除团籍,撤销记者职务,降五级工资”的处分,去了北大荒850农场。

### (三)“三个纵火犯”(西北组)——郑笑枫、欧至培和韩洪文

1957年4月中旬,郑笑枫受光明日报社派遣,到西安采访“鸣放”情况。4月29日,欧至培和韩洪文也被派来协助郑笑枫的工作。但是,《人民日报》记者朱波后来在“反右”时撰文称“西安的人民把光明日报派到西安来的三个记者——欧至培、郑笑枫和韩洪文叫作三个‘纵火犯’”。

郑笑枫,1944年起在国民党统治区参加新闻工作,1950年由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研究室调《光明日报》任记者。1957年4月中旬,郑笑枫被安排随全国人大代表和郑振铎、田汉及全国政协委员、原国民党行政院长翁文灏等去西安。在采访中,他发现一些高校未传达毛泽东于2月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和3月间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两个讲话,当时虽然没有正式公开发表,但根据讲话的录音记录稿,早已在党内外作了广泛的传达)。他接受了巴波的建议: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就写报道,否则就写内参。于是,他写了一条内参发回报社,并很快收到编辑部领导回电:“速将内参内容发新闻电回来。”结果,这个《西安大部分高等学校尚未传达毛主席讲话》的新闻稿在4月20日刊出,当时还受到彭真的表扬。在“反右”高潮中,这条由内参改新闻的报道,则成了郑笑枫向党猖狂进攻的“纵火犯”的大罪,被打成右派,送北大荒监督劳动。因受他株连,其母亲上吊自杀,二女儿得了精神分裂,小女儿得了急病后无钱送医院,眼睁睁地看着她死去。

1957年,欧至培与韩洪文一起被派到西安,协助郑笑枫采访“大鸣大放”座谈会,被指为“纵

火犯”。《人民日报》记者朱波“揭露”说，“欧、韩等为了把这一炮打响，为了使这把火能更快地燃起来……对约请的人进行了个别访问，了解他们发言的内容，并且对这些出席会议的人进行动员鼓动工作。他们在很多人面前，把光明日报吹嘘了一番，有意地污蔑人民日报。”朱波还说欧至培在民主党派座谈会上讲，“‘有什么说什么。因为是整风，主要提缺点，不要谈优点，你们敢说，我们敢登，不要害怕打击报复，光明日报一定为你们做主撑腰。’欧还说‘今天这个会没有党员，这是为了畅所欲言，所以不约请党员’……欧还为储安平吹嘘了一番”。私营工商业者郑立斋“揭露”说，“座谈的目的，据说是为了‘帮助’共产党整风，因此，专门找一些‘敢说话’的人谈一谈。他们特别介绍储安平是光明日报——各民主党派的报纸——的总编辑，并转达了储安平的‘希望’，‘鼓励’大家大胆地放，大胆地鸣，不要怕犯错误。”“他们在兰州举行的这十二人座谈，实际就是在那里点火”。后来，他们两人都被打成“右派分子”，被发派到外地改造，再也没回北京。

#### （四）财务科长韩逸云

韩逸云是财务科科长、民盟盟员，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报社内部鸣放时他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后来被点名批判。“罪名”也很大，说鼓吹要和党“平分天下”，“轮流坐庄”。但在批他的会上，不管人家揭发什么问题，韩都“照单全收”、“诚恳检查”，故被认为“态度好”，后来被发派到850农场的云山牧场。他原本很消瘦，加上“大跃进”因口粮减少后的饥饿折磨，更加消瘦了。为填饱肚子，他竟将目光投向了北大荒肥大的耗子。据殷毅回忆：一天，韩逸云背着大伙儿，不知用何妙法，逮住了一只耗子，用空罐头盒当锅子，在野外架火煮熟后吞食。不料被好事者发现，报告了管教干部。当天晚上，排长奉命召开全排批判大会。与会者各个饥肠辘辘，无精打采，根本没心思搞什么批判。但有的人竟昧着良心上纲上线批判说：“韩某煮耗子吃，是给社会主义社会脸上抹黑！”老韩则惊恐万状地站立在窝棚中间，不知如何“认罪”是好，只是垂头丧气地重复着一句话：我不该吃耗子……

#### （五）两个女“右派”——徐颖和谢捷

徐颖，在4月到5月的“鸣放”中，她写过《中

国人民大学像个教条主义的大蜂窝》，该文说，“许多教授抨击了人民大学的教条主义。新闻系许孟雄教授说：人民大学不像个学校，倒像个教条主义的大蜂窝。培养出来的蜂不是去采蜜的，却是去散布毒素的，并且散布的很广。”许教授继续说，“学习任何外国先进的东西都是对的，但是必须注意到外国的东西有它自己的特定的历史背景，搬到中国来，就必须把这些理论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可是我们的学生学习马列主义，只是学着背些条文，却没有叫他们联系实际。而更严重的是学校领导把背条文背的最熟的人，看成是优秀学生、积极分子，于是，教条主义者便成了天之骄子，这对青年教师，对青年学生，有什么好处呢？”

《光明日报》开始抓“小右派”后，徐颖也被揪了出来。因为徐颖如实报道了中国人民大学的“鸣放”情况，人民大学副校长邹鲁风，带着一批人大学生到《光明日报》告状：她是“帮助这些右派分子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毒素的帮凶”。报社对她只开过一两次“批判会”，就定了个“右派”。后去黑龙江850农场接受改造，忍受了恶劣的环境、饥饿的煎熬。1959年11月，徐颖回到北京。但1963年，她又被安排去大庆教书。1979年8月改正后，徐颖丈夫所在的新华社给她回城指标，《光明日报》只给她恢复了工作。

谢捷。女记者谢捷被打成“右派”的原因很蹊跷，报社仅凭她一篇未见报的通讯稿，就说：“谢捷在全国人民开始反击右派之后，她还企图通过采访农工民主党一个座谈会的新闻，别有用心地诬蔑反右派斗争。农工民主党在6月11日举行了一个座谈会，谢捷集中写了这个会上反对反批评的意见，如说什么‘现在是不是用围剿王蒙的方法来围剿储安平和葛佩琦呢？’和‘必须考虑到不要阻碍了鸣放’以及‘反批评不恰，就会引起不平’等等（这个别有用心报道，没有见报）”。这样她就被无端地戴上了“右派”帽子。

#### （六）蹊跷的“右派”——范愉曾、许子美、萧恩元、李笑、张荫槐

为了完成“反右”任务，“有多少打多少”，当时许多提了一些正确意见或发表了一些见解的无辜者，都被统统划为了“右派”。

范愉曾，1957年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被

分配到光明日报社。范愉曾被打成“右派”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是复旦大学毕业的,储安平过去曾在复旦新闻系讲过课,与他有师生之谊。范因此与储安平多有接触,还曾向储提交过一份改进报纸工作的建议书。储安平成了“大右派”后,报社人员在搜查储的办公室时发现了范愉曾的这份建议书,结果受牵连,理由是他同储“时相过从”,故有了“同气共类”的罪名。被打成“右派”后,范愉曾也被“发派”到了北大荒的850农场。

许子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当年满怀革命热情投奔解放区。“反右”运动前,编辑部有人提议,请毛主席为本报题写报头(原报头为沈钧儒先生题写),他在旁边随口冒了一句:“沈老写的就很好,何必都要‘毛记’呢?”被人以对领袖“大不敬”的罪名汇报了上去,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后来也被“发派”到北大荒850农场。

萧恩元,1950年起在《光明日报》任记者。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因“疯狂攻击党”,被送劳动教养。

李笑,也因在“反右”中“疯狂攻击党”,被送到新疆劳动改造,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的“右派”冤案才得到纠正。

张荫槐,1950年入光明日报社,任国际部记者、编辑,后调任国内政治部副主任。张荫槐曾经在光明日报社民盟支部大会上批判储安平的“党天下”思想:“‘党天下’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这种说法是要取消党的领导,是对党的诬蔑,是想挑拨党群关系。‘党天下’是不符合事实的,储安平自己是全国人民代表,他自己没有参予国事吗?”不久,在一次党组座谈会上,张因提了一些意见,被点名批判,甚至上纲上线,说他鼓吹要和“党平分天下”。张荫槐被打为“右派”后,受处理“右派”的第三类“留用察看”处理。

#### (七)被补划的“右派”——于友和丘林

丘林,抗战胜利后,曾任昆明《观察报》编辑主任、桂林《广西日报》编辑记者,解放后,任《光明日报》记者。

1957年在帮助中共整风中,丘林被光明日报社派武汉协助潘文彬组织“鸣放”座谈会,并写了通讯《马哲民教授谈武汉为什么“鸣”不起来》,

“马(哲民)教授跟记者谈到如何开展‘争鸣’的问题时,说:现在这里的高级知识分子仍然顾虑重重,要想真正鸣起来,首先要领导方面大胆地‘放’,要让大家‘吐苦水’、‘发牢骚’,才能解除思想上的压抑和束缚。”“马哲民教授说:像这样的苦水和牢骚不让他们倾吐出来,要他们‘争鸣’别的问题是很难有真实的兴趣和感情的”。但《光明日报》编辑部在7月19日的“检查”中说“全篇谈话都是贯穿着恶意和煽动。记者竟然全部有闻必录,替马哲民的谬论作了宣传”。1957年没有被打为“右派”,但1958年“向党交心”时,丘林认真检查自己的思想时,上纲上线,自投罗网,被报社补划成“右派”。

于友,1949~1959年任北京《光明日报》国际部主任、编委,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反右”运动中,为了洗清自己,于友在“揭露”储安平、章伯钧“右派言行”上也发表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言论。8月,于友又写了一篇《民主个人主义者必须向人民投降》,“中国有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是过去由帝国主义培养出来的”,“这些人都是旧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也就是1949年美国发表的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中所谓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最后,于友催促他们“赶快向人民投降!”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及其支持者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被打成“反党集团”,全国也掀起了“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这次运动中,于友被莫名其妙地挨批斗,因“在批斗中我认真自我批评,激动中说了一些夸大自己缺点的话”,故被以莫须有的“反领导”罪名,被错划为“漏网右派”。这样,他就成了“全国最后一批右派分子之一”。之后,他和他的一家都在北大荒“过了整整18年的屈辱生活”(根据作者后来回忆,应该是20年)。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不只《光明日报》抓出了近20名“右派”,《人民日报》《大公报》《文汇报》等报刊也都各自揪出了20多名“右派分子”。据笔者考察,他们被打成“右派”的罪名不是“攻击党”、“攻击毛主席”、“向社会主义进攻”,就是“散播毒素”、“造成恶劣影响”等。■

(作者为湖南吉首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责任编辑 洪振快)



# 饥荒年代青海“三类人员”死亡情况

○ 尹曙生

1958年夏、秋,《人民日报》连篇累牍报道全国各地农业生产大丰收、产量放“卫星”的新闻。7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西平县和平农业社小麦平均亩产7320斤的最新、最高纪录。因7月以后小麦已经过了收获季节,看来西平县小麦高产“卫星”之最已成定局。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9月22日,还是《人民日报》,报道青海省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小麦亩产8585斤6两。西平县小麦高产“卫星”被打破了。

柴达木盆地平均海拔约3000米,属于高原气候,春天播种,9月收割。在这个时候放的这颗“卫星”,别的地方要赶超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已经过了小麦收获季节,要赶超只能等来年。在全国各地农业生产放“卫星”的“凯歌”声中迎来1959年。春节刚过,饥荒就开始蔓延,越来越严重。到了夏、秋收粮食收获季节,没有什么地方放高产“卫星”了。所以,赛什克农场1958年放的这颗小麦高产“卫星”,是全国最高的,全世界最高的。

笔者在青海省公安厅工作16年,到过全省所有的劳改农场。赛什克农场就是省公安厅劳改局的一个直属农场。在柴达木盆地的诸多劳改农场中,它的生产条件并不好,好的年景小麦亩产量最高也就是两三百斤。那么,8000多斤的亩产量是怎么来的呢?

1962年10月11日,笔者随领导到赛什克农场检查工作,询问该场生产科科长(1958年放



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开始登载粮食亩产放“卫星”的浮夸报道。截至9月25日资料,小麦亩产最高数是青海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的8586斤,稻谷亩产最高数为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130435斤。

“卫星”时他是副科长,对放“卫星”一事很了解),了解1958年小麦亩产放“卫星”情况,下面是对话记录:

问:1958年第一生产队小麦亩产8585斤6两是怎么来的?

答:领导吹的呗!

问:怎么能上《人民日报》? 他们的记者来过吗?

答:《人民日报》有个记者住在西宁,我们场长给他打个电话,发了个电报,没想到报纸就登上了。

问:第一生产队1958年小麦实际亩产量是多少?

答:292斤。

问:亩产才200多斤。你们报了8000多斤,太离谱了,不感到心虚吗?

答:那时候报纸上天天报道农业生产放“卫星”,哪一个是真的? 都是假的。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广西省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

水稻亩产14万斤,我们小麦亩产才8000多斤,和他们比差远了,为什么心虚?!

我无言以对。

下面让我们来仔细考察一下青海省劳改单位“大跃进”、粮食放“卫星”情况。这些情况,是王昭1961年到青海主政、纠正原青海省委在“大跃进”运动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中揭发出来、并被事实证明是确凿无误的。

1958年到1960年,公安部从内地将20多万已判刑的人犯(很多人是因对“大跃进”不满而被判刑劳改的)调入地处高原、干旱少雨、气候恶劣的青海省。为了响应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号召,青海省劳改系统积极开展“大跃进”运动。青海省是个长期缺粮的省份,每年需要从其他省调入大量粮食,这么多犯人一下子调进来,吃饭成了大问题。于是开荒种地就成了“大跃进”的切入口。省里领导人不问青红皂白,不管有水、无水,不管气候异常能种不能种,不管种了是否有收获,也不管“三类人员”(劳改犯人、刑满就业人员、劳教人员——下同)身体吃得消吃不消,大规模地开荒种地。提出“以开荒为纲,边开荒边播种,开一亩种一亩”,“不吃也得种;不打粮食也得种;只要能收些草,就得种”,“不种,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在这些完全失去了理智的错误口号指导下,在全省范围内,大规模地垦荒种地。

1957年,省劳改局直属劳改农场全部耕地20万亩,到1960年达到211万亩,增加了近10倍。但是,开荒越多,死人越多,经济损失越大,开垦出来的耕地很多不能种庄稼,把草原变成了荒漠,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1958年播种面积由1957年的20万亩,开荒扩大到430751亩,粮食总产量为130948304斤。单位面积产量为304斤;

1959年播种面积为820997亩,粮食总产量为209353235斤,单位面积产量为255斤;

1960年,播种面积扩大到2115086亩,粮食总产量为105754300斤,单位面积产量仅为50斤,仅仅是1957年单位面积产量266斤的19%。

以上是这三年的实际产量,可是报上去的产量比实际产量平均多2~3倍,国家按照上报的粮食产量征购。征购后,农场所剩粮食不够“三类人员”吃,怎么办?压低口粮。于是从“三类人

员”口中夺粮开始了:

1957年,“三类人员”粮食定量每人每月45斤(原粮——下同),1958年降到25斤,1959年降到20斤,1960年降到18斤。

在高原、严寒、缺氧的环境下,从事重体力劳动,粮食定量这么低,结果造成“三类人员”大量死亡。从1958年到1961年,省公安厅劳改局直属劳改、劳教单位(下同)共死亡“三类人员”49604人,占这四年“三类人员”平均人数164340人的30%。

按年份分:1958年死亡“三类人员”4415人;1959年死亡“三类人员”12652人;1960年死亡“三类人员”20988人;1961年死亡“三类人员”11549人(1961年死亡时间主要是在春天)。

在死亡的这些“三类人员”中,有刑满就业人员2375人,劳教人员4159人,其余都是服刑的犯人。

青海省从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办劳改农场、工厂,到1957年底的7年时间,共死亡“三类人员”1363人,占这个时期“三类人员”平均人数21304人的6.4%,每年平均死亡200人左右。而1958年到1961年死亡的“三类人员”占平均人数的30%,死亡率增长3.7倍。创造小麦亩产“世界纪录”的赛什克农场,1958年死亡“三类人员”215人,1959年死亡307人,1960年死亡826人,1961年死亡133人。占“三类人员”总数35.2%。创造“奇迹”的第一生产队共死亡“三类人员”357人,占“三类人员”总数的40%

不仅劳改农场“三类人员”大量死亡,劳改工厂同样大量死人。因为同是“三类人员”,享受同等的粮食定量。在省会西宁市周围有十几家劳改工厂,死亡“三类人员”8000多人。青海省西宁新生第二砖瓦厂,共死亡“三类人员”2601人,占该厂原有“三类人员”4465人的58%。这个厂死亡人数这样多是因为每人每天只能吃几两粮食,没有肉、油,蔬菜也很少,而当时砖瓦生产却是原始的手工劳动,是最容易消耗体力、热量的重体力劳动。瘦骨嶙峋的犯人手推砖瓦毛坯进入高温的窖里,有人当场倒下,永远也爬不起来,被人拖出来,扔到山上了事。

人死了以后,不通知家属,埋在一起,甚至不加掩埋,扔在无人烟的旷野,任由野狗、豺狼、秃鹫享用。唐格木联合企业公司共死亡612名“三

类人员”，其中没有通知家属的538人。该公司铁基农场一站，在死亡的123名“三类人员”中，就有48具尸体没有掩埋而扔到野外；其余75具尸体叫犯人掩埋，而每个坑只有40厘米深，有的埋后被野狗掏出吃掉，有的在来年拖拉机开荒时被带出。

青海湖畔的江西沟渔业公司（青海湖盛产湟鱼，肉嫩味美，省劳改局在这里设一个劳改单位，专门捕鱼）共有“三类人员”706人，从1960年5月到1961年4月共死亡318人，占总人数45%。死的这些人没有通知家属，也没有掩埋，多数被胡乱扔进青海湖了事。1962年在部分死者家属来信、来访的强烈要求下，王昭下令打捞遗骨，结果打捞出52具残缺不全的遗骨，无法鉴定，集体掩埋，在墓碑上写上所有死者的名字。文革中这也成了王昭包庇、同情反革命的一条罪状，墓碑被红卫兵砸烂，遗骨被焚烧。

西宁市周边都是山，有十几家劳改、劳教单位，2万多名“三类人员”中死亡8000多人，尸体都是在山上处理掉的。

西宁新生第二砖瓦场死亡的2601人中，通知家属的597人，没有通知家属的2104人；有棺材、有坟墓、有标志的只有51人，挖大坑集体掩埋的2550人，一个坑一次埋几十人、几百人不等。

青海省新生第二建筑公司，犯人刚开始非正

常死亡时，死一个埋一个；后来死人多了，掩埋死人的犯人也奄奄一息，哪有力气挖坑，于是用浮土盖一下，或用石头压住，最后没有办法，用挖掘机挖了几个大坑，一次埋下305具尸体。

从1963年起，青海省直机关干部在周边山上植树造林，从上海调到青海省高级法院担任院长不久的郑文卿看到山上有很多人骨头，不禁感叹：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当他了解这些抛撒在山上遗骨的来源后，向省委反映，王昭指示公安厅劳改局派人将这些骨头收集起来焚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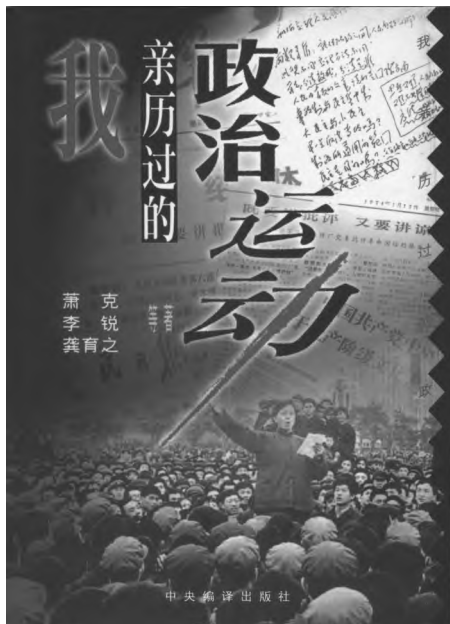
在此我要特别提起1958年到1960年三年中，从内地送往青海的劳教人员2.5万多人，分散在38个劳改、劳教单位，三年中共死亡4159人，其中有1325人是因为右派问题被劳教的，他们没有能活到1978年平反昭雪（官方说法是“改正”）的那一天。人犯服刑期满，应该释放，可是中央制定的政策却是“多留少放”，刑满了也不得回家，被判了“无期徒刑”，否则那2000多人也不会死在青海高原。■

**作者注：**本文所涉及的仅仅是省劳改局直属劳改单位的数据，不包括看守所、拘留所、收容审查所、集训队，也不包括州、县办的劳改、劳教单位。

（作者为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

（责任编辑 洪振快）

## 图书介绍



1949年以来，中国有过诸多政治运动 1951—1952年是“三反”、“五反”，1957年是“反右”，1959年是“反右倾”，1963—1966年是“四清”，1966—1976年是“文革”，中间还有“镇反”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意识形态领域批判运动等等。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辑录了历次运动中一些重要回忆，作者包括李雪峰（原北京市委书记）、萧克（上将）、李新（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慎之（新华社国际部原副主任）、龚育之（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韦君宜（著名作家）、于光远（著名学者）、李锐（原毛泽东秘书）、李昌（中纪委原副书记）等。看一看这些亲历者的回忆，体会一下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凡有人性、有良知者，谁会期望通过“七八年再来一次”的这种毫无理性可言的运动，来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那些令人不平的社会问题呢？

（定价28元，邮资7元，汇款地址见本刊址）



# 习仲勋在广东主持平反冤假错案

○ 李盛平

文革前夕,全国干部共有1200万人,其中有230万人在文革中被立案审查,占总数的19.2%,高级干部有75%被立案,当时有6000多名中央各机关的干部被“挂”着,还有大量基层非脱产干部的落实政策问题。党的正确的干部路线受到“四人帮”“左”的势力及其帮派的严重干扰。

胡耀邦主持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据1983年7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的报告》指出:清理文革中发生的案件达30万件之多,复查建国前后的历史遗留案件更达110万件。结果使300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纠正,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党籍,上千万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解脱。

文革结束后,受“两个凡是”思想的影响,党的指导思想和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工作处于徘徊状态,广东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步履维艰。

胡耀邦和习仲勋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卓越领导人。两人早年投身人民解放的事业,长期的革命生涯锻炼了他们坚韧的意志和豁达的胸怀。建国后,两人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新中国的开国、初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62年习仲勋因为小说《刘志丹》被打成“彭高习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随后,胡耀邦在陕西主持工作时因为反对“左”的做法,革故鼎新,被打成“彭高习在西北的黑线”。两人先后被打成一个反党集团,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备受迫害。在逆境中,胡耀邦和习仲勋开始思考中国发展的新道路。

1977年底,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部长,在叶剑英元帅的支持下,胡耀邦主持为习仲勋平反的工作,并安排习仲勋赴广东工作,称“把守南大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胡耀邦在北京组织领导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等工作;习仲勋主政广东,支持和配合中央的部署,同时进行了经济

体制改革的大胆尝试,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开创了广东发展的新局面。胡耀邦受叶剑英委托写信转告习仲勋:“仲勋同志去广东后,大刀阔斧,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工作是有成绩的。我们完全支持仲勋同志的工作。如果有同志感到有什么问题,希望直接找仲勋同志谈”。这一时期,胡耀邦和习仲勋突破教条主义的夹击,杀出本本主义的重围,批判“左”倾路线,在工作上鼎力扶持、患难相助,推动了三中全会重新确立正确的路线,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航程。

习仲勋到广东后,按照中央的指示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冤假错案逐一加以平反、改正。1978年4月,他在中共广东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疾呼:“必须坚决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统一战线政策,侨务政策,民族政策,对敌斗争政策,以及经济建设中的各项政策。”(习仲勋:《在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78年4月6日)

习仲勋排除“左”的干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开创广东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新局面。

习仲勋在平反冤假错案的时候,以处理大案要案为线索,同时带动处理一些规模相对小的冤假错案。

## 严肃处理反彭湃事件

彭湃出身大地主家庭,但散田散产,毁家纾难,周济农民。上世纪20年代,他在家乡海陆丰开展农民运动,是中国农民运动的先驱。文革期间,在海丰大反彭湃,诬蔑彭湃是“叛徒”,迫害彭湃母亲及其亲属。在广东南路地区(原高、雷、钦廉地区和广西东南、中南两个地区)则大掀“叛徒网”,把当年地下党打成“叛徒党”,因为抗战期

间,南路党隶属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南方局领导,以此为突破口,可以达到诬陷周恩来、叶剑英的目的。1978年6月18日,习仲勋和广东省委有关负责人听取关于海丰问题、南路地下党问题的汇报。7月到8月间,习仲勋考察了海丰县,详细了解了文革期间在海陆丰发生的大反彭湃问题,大为震惊。据习仲勋在1979年春回忆:“去年七八月我到汕头,解决海陆丰反彭湃的问题,海丰县委常委19人中,有几个参与杀了人,他们手上沾了血。”(《习仲勋同志第二次接见李正天等人的谈话记录》,1979年2月1日)习仲勋指示汕头地委领导干部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把海丰问题揭开,解决好这一问题。

11月初,习仲勋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上,他对文革中广东的冤假错案,进行了揭发批判。关于反彭湃问题,他结合视察海丰时了解到的情况说:他们在海丰制造的反彭湃的反革命事件,把彭湃同志宣布成“叛徒”,迫害彭湃烈士90多岁的母亲,把彭湃烈士的儿子彭洪迫害致死,还残酷杀害彭湃同志的侄儿彭科、彭竞等同志,把彭科斩头示众。这一事件造成死160多人,伤3000多人。全省不少老革命根据地的党员、群众也受到类似的迫害。(习仲勋:《关于广东工作问题的汇报(稿)》,1978年11月8日)

1979年1月8日至25日,广东省委召开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习仲勋在会上宣布:“文化大革命”中,海丰发生的反彭湃事件,是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矛头指向周总理、叶副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一次反革命事件。在这个事件中,著名的海陆丰农民运动遭到诋毁,彭湃同志被打成“叛徒”,彭湃烈士的亲属和维护革命烈士英名的干部和群众遭到残酷的镇压,激起了广东人民以至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今天,海丰冤案得到了彻底平反昭雪,被颠倒了的历史重新恢复过来了。(习仲勋:《在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979年1月25日)

2月11日,广东省委、省革委会决定:严肃处理反彭湃烈士事件。犯有严重罪行的原汕头地委副书记孙敬业已被捕;残杀彭湃烈士亲属及群众的反革命分子洪桂文等交司法机关严惩。彭

湃冤案得到平反,相关人员得到处理。

## 为陶铸和所谓的“陶赵死党”平反

陶铸在文革期间遭到陷害和打击,含冤去世,成为文革中的一大冤案。1979年1月20日,广东省党、政、军和各界代表隆重举行悼念陶铸的仪式,习仲勋出席仪式。习仲勋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陶铸的一生,号召大家学习他的高贵品质和高风亮节。他说:“事实充分说明,在陶铸的领导下,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原中南局和广东省的各项工作中,是始终占主导地位的。”(《在陶铸同志悼念仪式上习仲勋同志的讲话》,《南方日报》1979年1月21日)与此同时,习仲勋还为因陶铸问题受到牵连的所谓“陶赵死党”平反。习仲勋说:“原中南局和广东省委是红的,不是黑的。原中南局和广东的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林彪、‘四人帮’一伙把原中南局和广东省的许多干部诬蔑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陶铸死党’、‘陶赵死党’等等,这完全是恶毒的诬蔑和陷害,是为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服务的”(同上),“陶铸、赵紫阳同志主持广东省委工作期间,对广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广东的广大干部和群众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在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在1967年1月4日陶铸遭到林彪、‘四人帮’诬陷后,同陶铸、赵紫阳同志一道工作的原中南局和广东省的大批干部被诬陷为所谓‘陶铸死党’、‘陶赵死党’,大批老干部被揪斗、关押,原中南局的工作和解放后17年广东的工作被说成漆黑一团。现在陶铸同志已经得到平反昭雪。所谓‘陶铸死党’、‘陶赵死党’之类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统统应当推倒。因为所谓‘陶铸死党’、‘陶赵死党’问题受到迫害和株连的,都应该彻底平反昭雪。”(习仲勋:《在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979年1月25日)

## 平反广东“地下党问题”

广东地下党问题牵涉的干部和群众甚多,习仲勋到广东之后,就对这一问题非常关注,在听

取了有关部门对广东“地下党问题”的汇报和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之后,习仲勋认为平反这一事件的机会已经到了。

1978年11月,习仲勋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时说:文革中的广东领导人按照江青“审理广东地下党”的黑指示,揪所谓“南方叛徒网”,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私设专案,搜集整理诬陷周总理、叶副主席的黑材料,并由此几乎把所有全国解放前在广东从事革命活动的烈士、干部和党员都打成“特务”、“叛徒”、“土匪”。(习仲勋:《关于广东工作问题的汇报(稿)》,1978年11月8日)

在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上,谈到广东地下党和广东的革命武装队伍问题时,习仲勋说,“抗日战争时期广东党组织是在周恩来同志为书记的南方局领导下从事革命斗争的,是我们党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南方叛徒网”这个大阴谋,应该彻底揭露和清算。全国解放前活跃在广东各地的人民武装队伍,都是党所领导的革命武装,在革命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把广东的人民武装叫“土匪部队”,完全是诬蔑之词,必须彻底平反。(习仲勋:《在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979年1月25日)

1979年4月27日,广东省委正式做出《关于为所谓广东地下党问题彻底平反的决定》。《决定》道出了这一问题的事实:“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在广东搞了一个‘审查广东地下党’的政治大阴谋。1967年5月,戚本禹等人煽动一些群众组织揪所谓‘南方叛徒网’,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同年10月,林彪死党黄永胜及其一伙,秉承江青关于‘弄清广东地下党的情况,解决一批干部问题’的黑旨意,成立专门机构审理所谓广东地下党的十起重大历史事件。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冤、假、错案”,同时宣布:“过去林彪、‘四人帮’一伙强加于广东地下党及其领导的武装队伍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彻底推倒;对因‘审理广东地下党’问题无辜受迫害的同志,一律给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他们的结论如有不符事实的应作相应修改;其家属亲友受株连的要做好善后工作,消除影响”(《中共广东省委关于为所谓广东地下党问题彻底平反的决定》,1979年4月27日)。

## 主持为王德平反

文革期间,江青等罗织罪名,炮制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件。文革结束后,耀邦同志开始着手为其平反。在他的安排下,中组部干审局副局长贾素萍等人进行了细致的调查。

根据大量内容翔实的调查材料,在耀邦同志的领导下,中组部同志起草给中央的报告。1978年11月20日,中组部向中央报送《关于“六十一案件”的调查报告》,《报告》列举了大量事实后提出:“文革”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错案。12月16日,三中全会召开前一天,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向所属全体党员和党外群众广泛传达。

王德是“六十一人案件”成员之一,在文革中被撤职并长期被批斗,广东省委于1973年5月18日上报中央关于他的审查报告。1977年10月18日,中央批复广东省委的报告,王德被定为叛徒。

中央为“六十一人案件”平反后,由习仲勋主持,广东省委正式做出《关于王德同志平反的决定》。《决定》指出:“1978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中发[1978]75号文件对‘六十一人案件’已明确指出是一起重大错案。因之,省委1973年5月18日的审查报告,中央的批示定王德同志为叛徒是错误的,应予撤销,推倒强加给王德同志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 平反“李一哲”事件

习仲勋对文化大革命期间闻名全省乃至国内外的“李一哲”大字报和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平反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

1974年11月,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等人以“李一哲”的笔名,在广州闹市区张贴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矛头直指林彪集团封建法西斯专政的实质,不点名地批判了江青等搞所谓“反复辟”、“反回潮”的活动,联系这些反常现象,分析我国上层建筑领域存在的严重缺陷,同时提出要求全国人大制定法律“保障人民群众的一切应有的民主权利”的六点要求。大字报贴出之后,广州为之



震动,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应和争论。

1974年12月,中共广东省委决定组织内部批判,到清查“四人帮”运动时,“李一哲”的问题升级。1977年12月中旬,广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开宣布“李一哲”是反革命集团,罪名是“‘四人帮’大乱广东的社会基础”,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等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批与“李一哲”有关系的干部和青年,受到牵连。

习仲勋到广东后亲自抓这个问题。从1978年的8、9月开始,习仲勋主持省委会数次研究“李一哲”案件问题。省委常委会一致认为“李一哲”不是反革命集团,他们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不是反动大字报,应予平反,并决定于1979年2月召开大会公开平反。此前,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曾四次接见李正天等人,诚恳耐心地做他们的工作;对召开平反大会的有关问题,也听取他们的意见。其中2月1日这天足足谈了三个多小时,习仲勋谈话语重心长,主动承担上届省委的责任,令在场的人为之感动,有力地维护了广东安定团结的大局。

4月25日,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习仲勋,以中共广东省委名义上送一份报告给胡耀邦并报党中央,汇报了与李正天等人多次谈话的情况。鉴于北京有的单位来函要求调李正天等人去工作,或邀请他们去参加一些会议,报告提出意见:“最好还是让他们留在广东目前的工作岗位上,扎扎实实地经受一些锻炼,对他们的成长较为有利。建议耀邦同志是否在适当的时候和适当的场合说一下,不要轻易调这些人去北京工作或邀请他们去参加什么座谈会”(《中共广东省委致胡耀邦同志并报党中央的报告》,1979年4月25日)。

5月8日,胡耀邦在习仲勋、杨尚昆同志接见“李一哲”谈话情况及要求北京有关单位不要直接同“李一哲”个人联系的报告上批示:“按广东省委所提意见办,务必不使广东省委感到麻烦难办”。这个批示,表示中央及耀邦同志支持广东省委对“李一哲”事件的处理意见。

### 广东平反冤假错案整体情况

据统计,文革中广东省抓出“反革命集团”、“叛徒集团”等集团性假案669宗,涉及干部9432人;干

部个人冤假错案12427人。在习仲勋的领导下,这些冤假错案的平反纠正工作都得到妥善的解决。

此外,习仲勋还领导复查了广东文革以前的其他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一是复查改正错划右派案件;二是对反地方主义进行平反;三是对反右倾等政治运动所受到牵连的干部案件的复查;四是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区别政策;五是落实侨务政策;六是落实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七是全面贯彻落实知识分子、党外人士以及宗教政策;八是为100多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人及他们的子女重新划定成分,等等。

1980年习仲勋从广东离任赴中央工作时,全省经复查改正的右派分子36550人,占原划为右派分子的99.3%;建国以来广东在土改、“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倾、“四清”等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错误对待的党员干部,被撤销原处分的8741人,减轻处分的2833人,占复查总数的63.82%;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处分的非党员干部和群众撤销和减轻处分的共9000多人,占总人数的60%;历次政治运动挨整的农村基层干部中减轻或免于处分的14985人,恢复党籍的14264人,重新安排工作的26732人,改正错划成分的2500多人,给予经济补偿的53312人;全省公安、司法系统对文革以来的全部政治案件、刑事案件和文革前有申诉的部分政治、刑事案件进行了复查,其中全部平反和部分纠正平反的合计28307人,占复查总数的55.5%;全省文革中判处死刑以及各种徒刑复查后改判纠正的18063人,占已复查总数的49.4%;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从原工商业者“区别”出来,摘掉资本家或资本家代理人帽子,恢复劳动者身份的共52458人;全省纠正历次政治运动因“海外关系”而造成的冤假错案5481宗、14271人,落实了侨改户政策,发出47752份证明书,以确认提前改变华侨地富成分;落实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2005人,重新安置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725人,占总数的94.9%。

在习仲勋的主持下,广东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密切配合着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的统一部署,共解决了大约20万人的问题。通过平反昭雪,调动了社会各个方面的积极性,为广东的改革开放事业创造了重要条件。■

(作者为胡耀邦史料信息网负责人)

(责任编辑 洪振快)

# 宪政民主应成为基本共识

○ 张千帆

近年来,中国思想界异常活跃,不仅通常被认定为“右翼”的学者一如既往地倡导自由主义,执政党内也出现了回归“新民主主义”的声音,民间的温和“左翼”学者则提出“宪政社会主义”概念。不论这些学说是“对”还是“错”、对中国未来发展“有利”还是“有害”,它们都有存在的权利和表达的自由。然而,良性的社会变革是需要一定的政治共识作为基础的。即便在观念高度多元化的自由社会,依然存在超越左、右分野而为绝大多数人认同的基本共识,如共和、民主、法治、分权、平等以及对基本人权的尊重。一个没有基本共识的社会必然一盘散沙。处在大变革前夜的中国尤其需要寻找基本共识。其实,只要仔细梳理不同学说的理性脉络,不难发现这种共识是存在的。无论是“左”还是“右”,也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宪政民主代表了中国社会中温和理性成分的最大公约数。本文通过考察“新民主主义”和“宪政社会主义”,认为两者具有价值的部分都是宪政民主。事实上,两者都存在各自的表述缺陷,而宪政民主更为恰当准确地表达了两者的基本诉求。

## 一、新民主主义“新”在何处

近年,执政党内有一种声音,主张回到“新民主主义”。(参见张木生:《改革要回到新民主主义》,《领导者》2011年第10期,第91~92页)这种学说原本是从苏联移植过来,在中国经过毛泽东等中共领导的理论和实践发展改造后获得“本土化”。有人认为,新民主主义包括革命、建设、政治实践等不同阶段和方面,在内容上不仅包容了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而且有所超越。从中共领导人及其媒体在1940年代的阐述可以看到,新民主主义还涵盖了新闻自由、议会选举乃至军队国家化等主张。然而,这些主

张在本质上仍然属于传统的民主理论范围。新民主主义论者强调民主之“新”,但是究竟“新”在哪里?“新”是不是就等于“好”?这些问题至今没有说清楚。

在“回到”新民主主义之前,首先要看看“新民主主义”的主要阐释者毛泽东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他的《新民主主义论》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分为两步:传统的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一般的(“旧”)民主主义(如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比,新民主主义之“新”主要体现在社会主义上。然而,中国的社会主义不同于一般的社会主义。用毛泽东的话说,这是一种“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特殊在什么地方?特殊在“中国国情”。事实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与其说是“新”,不如说是“旧”。毛泽东认为,中国当时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因而其革命既不是纯粹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不是纯粹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认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必须基本相同,也就是“几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而要夺取国家政权,必须依靠社会中占多数并有革命觉悟的阶级。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为自己准备了“掘墓人”,因为强大的工人阶级应运而生,但是20世纪初期俄国和中国的中世纪生产力显然不符合这一基本条件,尽管俄国或许比中国更接近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阶段。在当时的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这就决定了苏维埃式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并不适合中国,中国革命只能采取不同形式并建立不同形态的国家。在毛泽东看来,“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

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解放》第98、99期合刊,1940年2月20日)

由此可见,新民主主义就是一种不彻底的社会主义,或者说是社会主义的一种过渡形式(或“初级阶段”)。它基本上体现为1949年《共同纲领》前言所确立的“人民民主专政”,也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共同纲领》第3条宣布“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但是不仅没有立即从根本上改变土地所有制,而且还宣布“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总之,所谓的“新民主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过渡阶段;在“无产阶级专政”尚未稳固期间,执政党可以宽容的社会各阶级组成“统一战线”,并在一定程度上分享统治权。

应该看到,无论在理论上还是事实上,毛泽东的阶级分析及其对中国的“半殖民地”定性显然是不准确的。民国之后,除了日本大规模侵华之外,中国整体上并不受制于任何“帝国主义”势力的直接控制,“殖民”从何谈起?在此不妨将其视为一种意识形态策略,目的在于从道义上孤立国民党及其经济支柱——大资本家或“官僚资本”,并团结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等“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取得革命胜利。1949年夺取政权后,政局尚不稳定,国民党刚刚退居台湾,“光复”大陆的野心未死,其在大陆的残余势力也频频企图颠覆新政权。在这种格局下,仍然有必要团结那些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力量以巩固局势。更何况革命时期就已经对这些阶级做出了“新民主主义”的妥协姿态,革命也是依靠他们的支持才可能取得胜利,不能一成功就翻脸不认人,至少在短时间内还有必要维持原先的承诺。等到大局已定,执政党自认为没有必要再和任何“资产阶级”或知识分子合作,那么等待他们的是一波又一波政治运动,甚至连农民也没几年就失去了“打土豪”分来的土地,成为“人民公社”的“农奴”。由此可见,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在本质上是联合社会多数、取得革命胜利并

维持政权巩固的斗争策略,在此不妨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策略版”。

在改革30年后,这个版本的“新民主主义”对中国是否仍然具有积极意义?我对此持怀疑态度。事实上,现行宪法及其前身1954年宪法在意识形态上继承了《共同纲领》的基本脉络。宪法第1条规定了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1993年修宪在宪法序言中强调,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且“国家的根本任务”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1999年修宪明确宣布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在宪法第6条中加入“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2004年修宪更是将“三个代表”加入宪法序言,要求执政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从而变相否定了国家的阶级性;第33条则加入“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条款,表明不分阶级、“成分”乃至政治见解的普遍人权都应该受到法律保护。这些规定虽然未能落到实处,但是足以表明中国社会的共识已经超越了原始意义的“新民主主义”。现在再“回到”毛泽东当年的“新民主主义”策略,已经没有什么“新”意,甚至是一种历史倒退。

当然,“新民主主义”概念未必限于毛泽东的理解,而可以根据当时的中共舆论获得一种扩充的意义。事实上,毛泽东自己也承诺“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只不过这些在他看来不够“新”而已。他所说的“民主集中制”就是现行宪法规定的人大制度,“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但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再看看其他领导人的言论,也都是极其自由民主的。譬如刘少奇在1940年代的讲话中驳斥“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



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2~177页)董必武则明确反对党政合一,主张党政分离:“党对政府的领导,在形式上不是直接的管辖。党和政府是两种不同的组织系统,党不能对政府下命令。”(《董必武选集》,第54~55页)

与此相比,当时中共控制下的媒体舆论甚至更为激进。例如“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社论)“让我们……继续奋斗,一直到‘人民的宪法’出现的一天吧!”(《新华日报》1947年2月22日)可想而知,在一党独裁、贪腐横行的国民党统治时期,这些言论对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诱惑力。它们构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版”。其实,也正是其所表达的打破一党专制、建设民主宪政的理念才赋予共产革命以合法性,并赢得众多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的支持。

不可否认,和作为斗争策略的“新民主主义”不同,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版”对于当今中国仍有重要意义,因而如果要“回到新民主主义”,就必须回到它的“宪政版”。在革命成功之前,宪政一直是中共宣传的目标。尤其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作为对抗国民党一党专制的策略,共产党一直在争取自己的宪法权利。因此,宪政确实是“新民主主义”一以贯之的题中之义。问题在于,这个“宪政版”基本上就是经典的自由民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新意”。无论是中共领导人还是在其控制下的媒体,他们表达的诉求无非是言论自由、民主选举、取消独裁专制,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一部真正的“人民的宪法”。其实这些东西在现行宪法里都有,因而只要认真施行宪法,也就回到了一直没有实现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版”。

既然如此,与其笼统提倡“新民主主义”这个很容易产生歧义和误解的口号,不如直截了当地打出宪政民主的旗号,因为在我们今天看来,新民主主义的进步意义不在于它的“新”,而在于它表达了自由与民主的宪政理想;我们今天真正想要的与其说是某个版本的“新”民主主义,还不如说是简单、朴素而货真价实的民主,哪怕这种民主很“旧”。事实上,没有任何前缀的“民主主义”比“新民主主义”更加简单明了,对当今中国也更有意义,只是民主和宪政尚不能相互替代、混为一谈。尤其在一个以前常常把“人民民主专政”挂在嘴上的国家,“民主主义”很容易沦为极权势力玩弄概念、操纵国家、奴役人民的工具。没有宪政,民主也会变质,因而在当下中国实行民主,还不能没有“宪政”这个前缀。换言之,只有宪政下的民主才是真民主、“好东西”。(参见周舵:《什么样的民主才是好东西》(上),《领导者》2011年第10期,第84~90页)

## 二、“宪政社会主义”的困惑与出路

和执政党内的有限理论创新相比,中国民间的思想更为活跃。已故的谢韬先生曾提出“民主社会主义”,基本上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解释为西欧式社会民主,反对以暴力革命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或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实施暴力统治,引起了社会的热烈反响。近年来,以胡星斗、华炳啸等为代表的中青年学者则提出了“宪政社会主义”概念,尝试用“宪政”重新诠释和界定“社会主义”。他们提出“只有宪政才能救社会主义”、“只有宪政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等主张,希望把宪政中的自由主义(“右”)和社会主义中的平等主义和集权主义(“左”)结合在一起,在现体制下形成一种可控民主。华炳啸指出,宪政社会主义理论的目标是超越西方式的自由主义宪政制度模式,试图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并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宪政民主新路。(参见华炳啸:《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西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按此设想,宪政社会主义理论既保留了传统社会主义中固有的平等主义理念,包括普遍平等、普遍自由、普遍民主、普遍公正、普遍幸福,又用自由宪政主义约束了

社会主义内生的政府集权倾向,尤其是有助于克服斯大林模式的“集权社会主义”顽症。宪政社会主义概念的提倡者仍然保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战略共识”),但是坚持这种社会主义的性质必须是“宪政”的。

这个设想听上去很完美,我也赞成将中国的社会主义定位于“宪政”的,而非“集权”的,更不是“国家”的。问题在于,宪政社会主义的提法不仅容易引起概念混淆,而且似乎新意不多。首先,“宪政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和一般宪政民主相比,它的独特之处何在?这些问题尚待解释清楚。宪政社会主义的倡议者希望“超越自由主义”,但是他们诉求和主张似乎基本上是自由主义的,或者说通过经典的自由主义就基本上能够实现。譬如华炳啸将其定义为“以公民社会为主义,依宪治国即以宪政民主为国本”,其特征是“以公意为引领、以公民社会为基础、以共和治理为原则、以宪政民主为保障、以共同富裕为条件、以‘自由人的联合体’为奋斗目标的共同体社会”。(另一个大同小异的定义是“社会主义简言之就是以公民社会为主义”,具体而言是“在尊重个人自由权利的基础上以公民社会为本位,以人民为权力主体,以民主宪政为权力载体,以社会公正和平等为核心价值,以促进个人的自由发展为己任,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同上。)

然而,“社会主义”和“公民社会”显然是相关而不同的两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假如公民社会、依宪治国、宪政民主、共同富裕就是宪政社会主义的本质,那么美国也完全符合这种标准,因为联邦宪法不止一处规定了公民选举权,第一修正案保护公民的结社自由等各种言论自由,第十四修正案则规定了法律的正当程序和平等保护。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更是开创了司法审查先例,国会、总统及各级政府行为都受到法院的合宪性审查。因此,按照这种定义,美国也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北欧等社会民主国家更不用说了。和它们在本质上相似,宪政社会主义“主张平等价值优先,尤其是强调平等的自由权利保障优先”,如果有差别的话仅在于左、右程度不同而已。事实上,所有的宪政国家都必然以公平、正义、平等为立国原则,因而也都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

这样的概念界定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虽然由于实行民主制度,宪政国家的社会福利水平普遍比较高,但是“社会福利”不等于“社会主义”,几乎没有人会把美国称为“社会主义”国家,即便将北欧国家定性为“社会主义”也是不准确的,因为所有这些国家仍然是以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为主导,只不过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和税收杠杆等手段进行相对全面的市场干预和财富再分配而已,因而至多只能说这些手段取得了和社会主义殊途同归的效果。然而,因此而将它们称为“社会主义”国家,显然言过其实。再说,假如当前所有宪政发达国家都成了“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宪政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不就显得多余了吗?

关键在于,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而“宪政社会主义”主张者恰恰对这个概念淡而化之、一带而过,只是笼统提到“以社会所有制为根本经济制度”。“社会所有制”是否就是国有制或公有制?如何实现所有制的社会化?如何防止政府在公有制经济体制下高度集权或滥用公权?这些才是必须回答的真问题,而宪政社会主义理论却恰恰在这些问题上语焉不详。虽然“社会主义”本身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但是至少按照马克思的经典定义,其本质在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历史表明,实质性的公有制(譬如土地国有制或集体所有制)很容易造成政府集权(甚至极权);名曰“公有”,实为无人所有,最后一概蜕变为政府乃至官员个人所有。因此,“宪政”和“社会主义”不仅不是一回事,而且存在内在的紧张关系。宪政社会主义学者只是定义了前缀“宪政”,而没有充分展开主语“社会主义”。一旦把真正的“社会主义”放进定义来,绝大多数宪政国家确实是“不合格”的,但是这也恰恰凸显了“宪政社会主义”概念的内在矛盾。

宪政就是宪政,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实行宪政,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实行宪政。如果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那么中国宪政必然带有某种社会主义特色,但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没有必要人为强调,否则很容易造成教条主义和话语混淆。既然有“宪政社会主义”,也就必然应该有“宪政资本主义”乃至“宪政封建主义”,但是如果几乎所有的发达(即“宪政”)资本主义国家都是

“宪政社会主义”，由此是否可以推断“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或者说成熟发达的“资本主义”已经进化到“社会主义”，尽管没有发生无产阶级革命？假如这样，“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将成为无意义的文字游戏，本来颇有意义的学理探讨将淹没在当今美国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口水仗之中。这些只能说明，无论什么主义，问题的根本在于有没有宪政，而不是那个主义。

不可否认，在当今中国的意识形态话语下，“宪政社会主义”或许有助于将宪政引入中国政治实践，但是这个好处也伴随着一个显然的弊端，那就是把好不容易已经基本解决了的“姓社姓资”问题又人为带回来，并徒然引发不必要的非议和争议。早先，邓小平的“猫论”已淡化了“主义”问题，九二南巡终结了市场经济的“姓社姓资”问题，尽管宪法中的“市场经济”和“法治”仍然带有“社会主义”的前缀。虽然宪政社会主义论者的初衷是“给社会主义戴上宪政的紧箍咒，强调以宪政规制社会主义”，并力图澄清“宪政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宪政”之间的区别，但是一般人恐怕很难分清两种高度相似的话语，也很难不将这种话语中的“宪政”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并产生宪政究竟“姓社姓资”的无谓争议。

以上分析基本上适用于谢韬先生的“民主社会主义”。事实上，谢先生在文章最后明确指出：“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贪污腐败问题，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换言之，主义不重要，重要的是实现主义的手段。如果采用暴力的强制手段，那么再好的“主义”也会异化；如果用和平的民主的手段，那么民主本身就足以取得社会主义者所追求的目标。由此可见，“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是“民主”。

总之，宪政强调民主、分权和资源的公平分配，因而施行宪政民主必然和社会主义强调的平等不谋而合，但是这并不足以将“宪政”、“民主”和“社会主义”绑定在一起。事实上，宪政民主完全可以实现“宪政社会主义”建立在公民社会基础上的公平、自由、平等、共同富裕等政治与社会诉求，因而“宪政社会主义”这个提法也就显得有

点累赘。既然如此，不如直截了当换为“宪政民主”。有了宪政民主，即便是美国这样的经典“资本主义”国家也带上了显著的“社会主义”特色；没有宪政民主，则几乎不论什么版本的“社会主义”最后都会蜕变为赤裸裸的垄断资本主义。

### 三、宪政民主是基本共识

本文分析了“新民主主义”和“宪政社会主义”两种左翼理论的基本脉络，旨在说明宪政民主是当今中国社会的基本共识。如果说“新民主主义”有任何值得今天回归的“新”处，即在于宪政的话，而“宪政社会主义”的正义、平等、均富等价值目标则只能是践行民主的自然结果。没有民主，社会平等必然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梦想；没有宪政，任何招牌的“民主”都必然堕落为专制独裁。中国未来改革所追求的并不是某个特定版本的“新”民主主义，而就是宪政民主。假如改革还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进行，那么确实有必要将其纳入宪政轨道，但是在执政党自己都对改革“姓社姓资”没有兴趣的时代，把宪政和一个意识形态符号捆绑在一起究竟有多大意义呢？既然“新民主主义”之“新”不足以清晰表达其内在的宪政诉求，“宪政社会主义”又没有必要地陷于“姓资姓社”之争，而未能充分彰显民主制度的社会功能，那么对于两者来说，宪政民主似乎都是更为确切达意的表述。

作为理智温和的左、右双方都能接受的制度设计，宪政民主代表了中国改革的未来走向。当然，各派仍然可以自由提出自己的概念、理论、诉求，但是都应该旗帜鲜明地将宪政民主作为自己坚守的底线。遮遮掩掩、欲言又止只能造成词不达意、表述不清乃至目的不明，最后背离“曲线救国”的初衷。既然宪政民主早在其执政前就是中共公开表达的追求，执政数十年后反而避讳这个追求是极不正常的。对于执政党当初的承诺，中国民间社会需要做的是提醒并要求兑现之，而不是帮助它隐晦之。■

（作者为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

（责任编辑 洪振快）



# 1976年天安门事件：和吴忠说的不一样

○ 马懋如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举国悲痛。为悼念周总理，清明节首都人民纷纷到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向周总理敬献花圈、诗词，表达哀思，遭到了“四人帮”的镇压，被打成“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四人帮”粉碎后两年被平反，宣布是“革命行动”。我是天安门事件的一个亲历者，36年过去了，仍历历在目。

《炎黄春秋》2012年第3期刊登了吴忠将军的口述记录《我经历的1976年天安门事件》一文，读后受到了不少启示，也从中知道了当时中央上层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内情，以及吴忠将军对“四人帮”的抵制和苦衷，同时知道了他在天安门事件中所处的地位。

吴忠将军当时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是包围天安门调兵的当事人，是“四人帮”镇压群众的现场指挥（被迫上阵）。我是到天安门悼念周总理的百万群众中的一个，我曾几次去天安门，也曾参加了部分清查工作。我耳闻、目睹了很多的人和事，和将军“口述”的不一致。将军是官方、上层，是镇压的一方；我所知来自群众、下层，属被镇压的一方，有差异不足为怪。将军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天安门事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是当时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在江青等人的左右下），经毛主席圈阅。但天安门事件过去10年、平反8年后，将军所说与当时群众的感受、与事实并不一致，让人难以理解。下面主要谈我的所知，兼谈和将军“口述”的分歧。

## 1. 事件的起因

将军说：“诱因是悼念周总理的‘规格’”。事实是“四人帮”反对周总理。

悼念周总理的规格不仅太小，也太低，不符合总理丧事的规格，对周总理大不敬，人民很不满。上面下令不准戴白花、不准戴黑纱、不准单位开小型追悼会，人民更加不满。3月5日，“四人帮”控制的上海《文汇报》，在一篇报道中删去

了周总理给雷锋的题词；3月25日《文汇报》在一篇文章中说：“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明目张胆反对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更大不满。南京的学生首先起来，上街贴标语，谴责《文汇报》，并去雨花台和梅园新村悼念周总理，各地群众纷纷而起。一列火车路过南京，工人和学生用油漆在车厢上刷了“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等标语，随着列车的运行，消息迅速传向四方，也传到了北京。当时我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工作（医科院属卫生部领导，下有三个医院、五个研究所、一个出版社，职工数千人），我们单位有不少人提出质疑，并谴责《文汇报》。“四人帮”将“南京事件”打成“反革命事件”，人民更加义愤！“南京事件”成了天安门事件的前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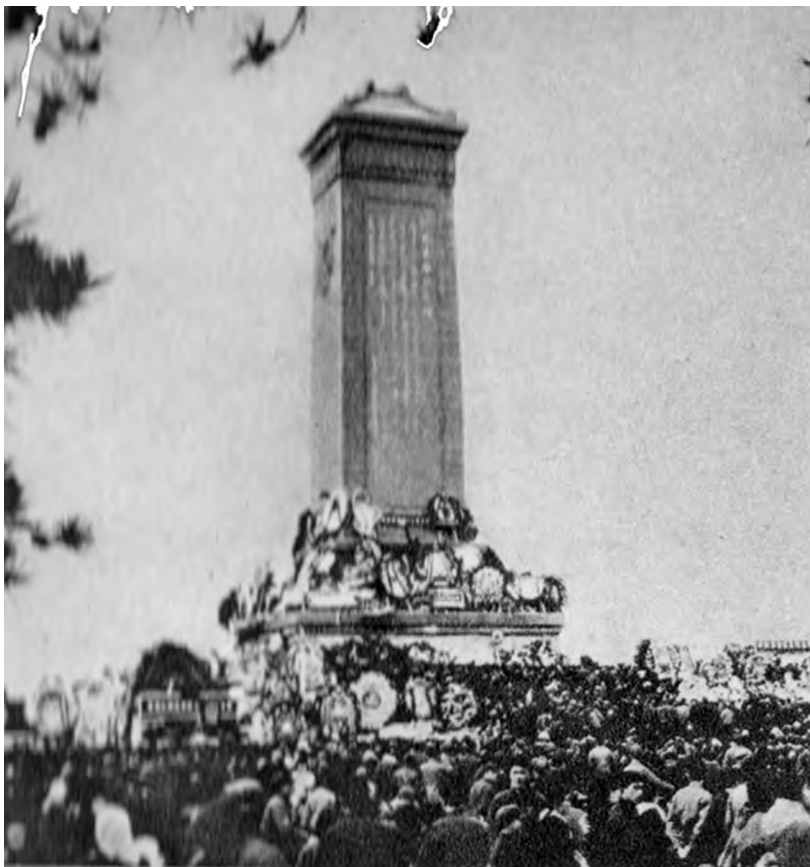
## 2. 事件的经过，即人民群众和“四人帮”的斗争

清明节是我国人民祭奠亲人的传统节日，人民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是很正常的事。1976年的清明，是周总理逝世后的第一个清明，因而去天安门广场的人更多。事实不是吴忠将军所说的去“劝阻”，而是禁止、镇压、打成“反革命”！

3月19日，北京的一群小学生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了第一个花圈。以后陆续有人去献花圈。

30日凌晨，解放军第二炮兵后勤部的同志到天安门献了两个花圈。军人起来了！“四人帮”恨之入骨，把他们打成“反革命第一炮”，100多人受到审查。人们称为“革命的第一炮”！镇压由此开始。

当日，北京市总工会的29位工人，把决心同“四人帮”“血战到底”的悼词贴在了纪念碑的下面，表达了首都工人的心声，遭到“四人帮”的迫害，被打成“第一号反革命事件”，为首的工人被捕入狱，达7个月之久。人民群众和“四人帮”的



1976年清明,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上堆满了花圈

斗争公开化。

31日晚上,有人数了一下,有102个花圈。随着清明的来临,悼念总理的人越来越多,花圈、诗词也越来越多,再也无法数清了。

我们医科院及所属单位的同志们没有沉默!31日开始有人去送了花圈。4月1日下班后,大家聚在办公室,连夜赶制花圈。党委第一书记杨纯同志托人做了两朵白花,放在群众的花圈上,表一表对周总理的哀思。次日晨,上面下达紧急禁令,院党委推迟传达,我们赶在禁令下达前,抬起花圈奔赴广场。花圈已经很多,最佳位置很难找到。这里已经发生有人受指使夜间来偷花圈,群众叫他们“偷花鬼”。人们自动组织护花,被称为“护花神”。他们主动来帮助,用他们带来的绳子、铁丝帮我们将花圈固定在纪念碑的栏杆上。眼看许多花圈已被绳子连成了群,以防“偷花”。我们献了花圈,默哀后回到机关。顷刻,卫生部(部长刘湘屏是谢富治的妻子,跟“四人帮”很紧)来电话“问罪”,并命令将送去的花圈拿回来。事实并非如吴忠将军所说,“协助群众

把花圈放好”。原来刘湘屏部长派人在天安门广场窥视。大家一致抵制,众口一声:花圈是献给周总理的,谁也不能去拿!我们医科院系统一共送了10个花圈,其中1个花圈上写有一首诗,内容是:“花圈虽小情义深,怀念总理泪浸心。人民继您革命志,防修反修除毒根!”这首诗被刘湘屏宣布是“反革命诗词”,作者受到了重点审查。还有一位技术员在天安门拍了不少照片,被人无意泄露,宿舍被抄,照片被劫,当时本人正出差外地,被骗回京,一下飞机,一副镣铐,被诱捕入狱。事实非将军所说的:“保护群众安全”。

### 3. 事件的性质,是镇压与反镇压、正义与非正义的斗争

人民是通情达理、顾全大局的,很多花圈上写着“请保留到4月6日”。“四人帮”迫不及待,提前行动。

4月4日,广场上空升起了两束气球,挂着“悼念总理”、“革命到底”的挽联,这是人民发出的最后誓言。深夜,卡车、吊车一二百辆,民兵数千,花圈、诗词被洗劫一空,一些人被抓走。

5日晨,不见了花圈和诗词,不见了人,广场一片凄惨!“四人帮”反对周总理、践踏诗文、侵犯人权,人民岂能容!在一片“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愤怒声中,人们烧了镇压群众的指挥小楼和指挥汽车……“四人帮”镇压,当场一些人被捕,被投入监狱。这是一场反镇压、反迫害、争民主、争人权的正义斗争,吴忠将军却说是“一伙人闹事”、“引发”了“冲突”。

4月4日当晚我值夜班,一个家住长安街的同乡来电话说,形势紧张,一队队人,手持木棍、手铐正向天安门聚集,一辆黑色小轿车在长安街上转来转去……夜深,民兵、警察、卫戍部队等近十万大军包围了天安门,未及离去的人被抓、遭毒打、罚跪、双手被上背铐,而后投进监狱。一个熟人是民兵,目睹了一切,含泪告诉我们,他不愿当帮凶,装病逃脱。

5日晨,我借故去广场,不敢步行去,乘公交车路过,目睹了劫后的天安门,一片凄惨,没有了人,没有了花和诗,满地是水,残留有片片浅红色的血迹……抬头一望,一个花圈迎着寒风矗立在纪念碑的高处。车上不多的乘客同时向纪念碑行注目礼!返回时,这个花圈不见了。这天又有人送去花圈,上面写着:“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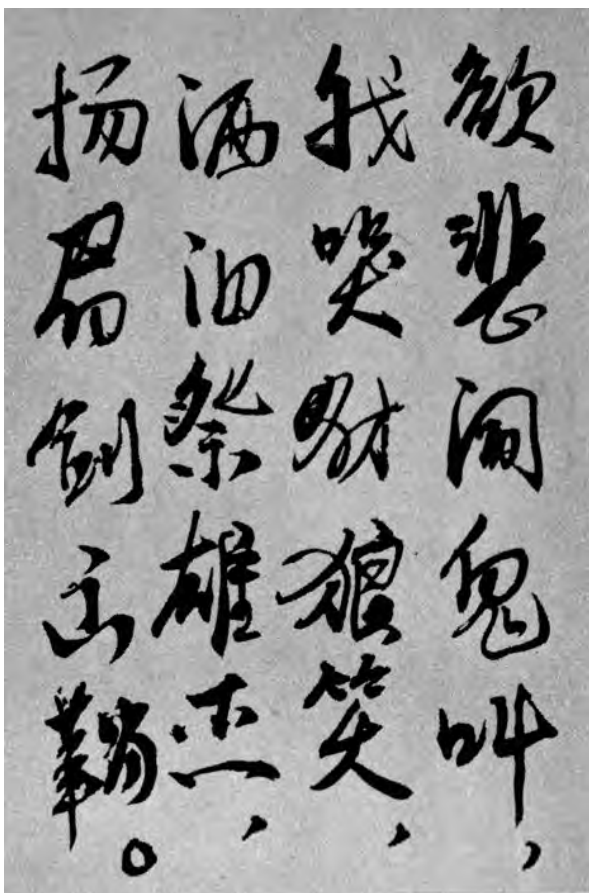
公开镇压和内部清查相结合,追查诗词、照片,追查去天安门的人,追动机、追后台。听说,立案追查的有1984件,拘捕388人,被作为罪证撕下的诗词原件583件,收缴的诗词抄件和照片等10万8千多件。

“四五”运动,在江青等左右下,被中央政治局会议定为“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邓小平同志被定为“总后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还要追查叶剑英、邓颖超、胡耀邦,等等。医科院是刘湘屏追查的重点。突然传来,住在首都医院(现协和医院,医科院下属单位)的胡耀邦同志,在病房里背着手踱来踱去对人说:不让悼念总理,可以换个地方,换个方式嘛!意指耀邦同志鼓动群众去天安门。又传来医科院及所属首都医院,清明节突然挂出了许多幅周总理的遗像。意即与天安门事件相呼应。确实许多办公室、诊室挂着周总理的像。挂周总理的像何罪之有?说明人民大众和周总理的感情之深!果然,刘湘屏派人来明察暗访,大家团结一致应对,未能得逞!

从4月2日起,上面每天要我们汇报去天安门的人数和送花圈的数量,即“阶级斗争新动向”。我受命办理。医科院下属肿瘤医院党委书记李冰同志,挺身而出,她对我说,医院的青年送花圈,是她同意和支持的,一切责任由她承担。我汇报的口径(领导默许)是:群众自发,出于对周总理的悼念,不牵涉领导和其他任何人。去天安门的人数只汇报每天上下班和因工作路过的人数。刘湘屏不满,嫌我们报少了。

上面几次下清查令,提出要“追根”要查个“水落石出”。我看到了北京市公安局6月1日下发的通知,其中影印有“〇〇一号、〇〇三号……一四三号案件”的11首诗的笔迹,下令要把作者“挖出来”。

在那一片白色恐怖下,保护诗词、照片,留下



这首诗曾被“四人帮”列为“001号反革命案件”

历史见证,人民和“四人帮”展开了新的战斗。诗词、照片被隐藏起来,埋在了土里,封在了蜡里,转移到香山顶上,送往外地乡村,不少人默默背诵,记在了心里……

1976年10月6日,天安门事件半年后,“四人帮”垮台了。在陈云同志的提议下,1978年11月,“四人帮”粉碎两年后,天安门事件终获平反。北京市公安局释放并宣布被捕的388人中,没有一个是“反革命分子”(只有3人犯有偷盗等罪行)。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而吴忠将军在天安门事件平反8年后的1986年,却强调天安门事件是“极个别”的“攻击毛主席”,“是少数人”“起哄”、“胡闹”,是“一伙人闹事”,这与民众的亲身经历、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结论、与北京市公安局公布的均不一致,这令人费解。■

(作者为中共中央宣传部离休干部)

(责任编辑 洪振快)



# 我所知道的“联动”六冲公安部

○ 马小冈

过去,坊间流传着文革中北京“联动”六冲公安部的说法。其中的首次,是说在1966年12月26日,两名北航附中的“联动”成员因为偷窃摩托车被“北航红旗”当场抓住,“联动”为解救“落难弟兄”,在北展剧场首次聚会的当晚即首冲公安部;其后又连冲五次,最后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一声号令,“联动”终酿灭顶之灾。

据我所知,上述说法并不足信。特别是首冲,与事实有较大出入:第一,时间有误。事实上“一冲”是在1966年12月16日,即在“联动”首次大规模聚会之前10天。第二,对象有误。“北航附中红卫兵”确实有人偷了摩托车,但事出有因,且“北航红旗”所抓的两人均不是偷车人。第三,原委有误。“一冲公安部”的真实起因源于一场大规模武斗;其后几冲则是“一冲”的延续。

“六冲”的最初版本源自1967年蒯大富(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麾下的《井冈山》战报,其后被转抄演绎,逐渐在坊间广泛流传和引用,至今难闻不同声音。40余年过去了,作为当事人之一,我觉得有义务对事件的原委和经过做一些追述,以便后人对那段历史有更符实情的了解。

## 一、时代背景和武斗双方的结怨过程

北航附中在海淀区学院路的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园西南角。那时附中与大学园区仅隔一道铁丝网,没有围墙。附中的体育课和运动会基本都在大学的大操场进行;而附中同学流连忘返的地方常是大学校园的飞机停机坪。

那是一个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除了学校安排的政治活动以外,一些干部子女比较多的学校往往自发形成一些小团体,大家时常凑在一起分析形势,纵论天下,例如议论流传的毛主席与毛远新的谈话等内部资料,这其实

就是后来“红卫兵”的雏形,活动方式则采用“桃园经验”的扎根串联组织“阶级队伍”。因在海淀区内的大学附中基本都是住校,与城里走读的四、六、八中类似的小团体相比,附中的学生朝夕相处,凝聚力更强。

1966年6月文革发动初始,因为国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我们的小团体活动增加了。6月8日当清华附中红卫兵受到围攻时,尚没有正式打出“北航附中红卫兵”旗号但已初显组织能力的一大批同学赶到清华附中声援,我们随时能够调动起来的强大能量让进校的第一个工作组(由团中央派出)十分吃惊。这支以阶级斗争理论与“桃园经验”为指导的工作组,竟然把用同样理论武装起来的我们这个团体当成了整肃对象。6月14日召开的全校大会上,在工作组的安排和支持下,个别教职员煽动说:“咱们学校有个裴多菲俱乐部,他们经常进行非法活动,他们眼睛是红的,要杀人……”此言一出全场大哗。高三的岳小东挺身而出愤然反驳,陈昆岗、丁林生、张志平、刘平东等众多同学纷纷站到了他的身边。不久,工作组撤出了附中。

“北航附中红卫兵”就此成立,且声名大噪。当时北航的赖瑞瑞找到我校刘会远,要求加入附中红卫兵。刘会远表示愿意帮助他们成立大学红卫兵组织,并向其提供了一些文件,于是附中与北航的文革运动有了比较密切的联系。

时值文革初起,无论是附中还是北航,校园秩序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有一次参加全市大型活动需要成立一支纠察队,在北航拒绝派车的情况下,附中红卫兵采取“革命行动”,撬开体育场的看台大门,抢了几辆存放在车库里的摩托车;其后北航红卫兵派了原校体工队的王向当教练,此事在附中几乎尽人皆知,但也为日后的“一冲公安部”埋下了伏笔。

“北航附中红卫兵”最初与大学的造反派组

织“北航红旗”尚无纠葛。运动发展到1966年11月，“北航附中红卫兵”因与北航红卫兵的“八一纵队”在反对中央文革方面观点一致；而以韩爱晶为首的“北航红旗”在中央文革的鼎力支持下掌控北航大权并残酷打压“八一纵队”，强迫赖瑞瑞（建材部部长赖际发之子）、孙倩玲（交通部部长孙大光之女）等人身背“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牌子在附中北侧的必经之地“劳动改造”，以此向附中红卫兵施压；又以掌权者身份强行收缴了由我们控制的摩托车，而且大力扶持我们的对立派“北航附中红旗”，插手附中内斗，这冤家自然就结下了，从此双方势不两立。尽管“北航红旗”位势居高，但“北航附中红卫兵”并不服气。

## 二、还原46年前的场景

1966年12月16日，“反革命分子伊林·涤西”（伊林·涤西为化名，此两人因对林彪提出质疑于12月20日被捕）被拉到北京林学院（现北京林业大学）批斗，“北航红旗”开着校体工队的摩托车去站脚助威，被前去声援林院附中红卫兵的我校陈昆岗（老高三，红卫兵头头之一）和叶文毅（老高一，红卫兵鹰派）等人发现，出于对“伊林·涤西”的同情和对“北航红旗”的反感，叶文毅故意捣乱从林院把“北航红旗”的捷式“佳瓦”摩托车偷走。陈昆岗觉得在人家地盘上惹事不妥，曾竭力劝阻，但未成功。

1966年本人在北航附中上高二。12月16日当天下午，我和李冀安、叶文毅、黄建新等人正在楼前空地上练杠铃，忽见来了5位“北航红旗”的人（4男1女），言称来找摩托车并欲直接进楼搜寻。因对“北航红旗”没有好感并觉得对方擅闯宿舍楼，我们与对方先是发生口角，其后对方一高个男子出言不逊，被李冀安一拳击中腹部，此人当场倒地，5人遂迅速撤离。

约20分钟后，北航广播站传出紧急集合的呼叫声，因估计不妙，我和叶文毅便急忙跑到教学楼踹开体育器械室的房门抢出一些体操棒和铅球，随后大伙把宿舍楼道用双人床堵塞，我方留校的约15位男女同学则全部撤到三楼。当时一楼的电话突然断线，李冀安在被围之前骑车到八一学校和石油附中告急；岳小东则到清华附

中告急。我们刚刚准备完毕，就见从教学楼东侧校门闯进黑压压一大群人迅即将我宿舍楼团团围住，人数将近300人之众，为首者即“北航红旗”的二把手井岗山。

围楼者中似乎有外地赴“北航红旗”串联的人马，他们二话不说上来就用砖石将一、二楼的玻璃全部打碎。尽管他们把宿舍楼围了个密不透风，然而因发现我们有所准备而无人敢直接进楼。我们将三楼窗户全部打开以免玻璃飞溅伤人，下面的砖头石块则不断飞进来，我们一边躲闪，一边还击。我在三楼309房间冒着不断飞来的石块探出身子用照相机拍照，楼下的人群迅速闪开（以为我手里有什么神秘武器），我感觉他们人虽多却无心硬攻，便与各位同伴商定，死守待援。

双方就这样僵持着。“北航红旗”虽然20倍于我方人员，但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事情，我认定他们占不到什么便宜。没想到大约半个小时后，陈昆岗突然说：“我下去和他们谈谈……”我一把没拉住，这家伙竟从塞满床的楼梯空隙中钻下楼去了！结果还用说吗？没人上前与他握手，众人一拥而上拳脚相加，顿时将陈昆岗胳膊扭脱臼，又像捆猪崽一般将他绑了个结实拖着就跑。我等明知寡不敌众，但为了救他只能冲下楼去，黄建新刚刚冲出门口，就被对方用大块炉渣拍在头上，鲜血顿时盖住了半边脸；王青抡着体操棒狂呼着冲进人群，可没几下就已力竭，登时被人按倒在地并被四脚朝天强行拖走，叶文毅扑到王青身上奋力相救，但敌不过“北航红旗”人多势众，陈昆岗和王青两人最终被他们抓走了。

这就是坊间传说的“当场抓住”的两个“偷车贼”。其实陈昆岗和王青与偷车毫不沾边，但因陈昆岗是我们的头头，“北航红旗”就是冲着他来的；而王青拼命过猛又身材瘦小，方便了人家拿住做了陪绑，实乃冤枉也！井岗山见我狂吼着直接奔他而去，指着我说：“我知道你能打架，我不理你……”他身边的人迅即将我围成半扇，但却无人靠近。女生钟锦屏也冲进人群与他们厮打，董偃琴等其他几位女生则手挽手站在宿舍楼门口，欲堵住他们进楼再去打砸抢……顺便提示一下：“北航红旗”抓走陈昆岗和王青并非因为他们“偷车”，要借机狠狠教训“北航附中红卫兵”才是

他们的真实目的,摩托车只不过是个由头。井岗山见任务已经完成,便指挥队伍迅速撤离。约半小时后,石油附中红卫兵“赤飙”战斗队的蔡东北、甘朝生、张小光等二三十人赶到,可武斗已经结束。

这其中有一个阴差阳错的细节。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北航红旗”把陈昆岗和王青弄到什么地方去了,石油附中蔡东北等直接到北航要人,他们听说已将陈昆岗和王青送往公安部,于是乎二三十辆自行车便风风火火直奔了长安街。其实“北航红旗”当时先把陈昆岗和王青押到北航主楼过堂审讯,然后扭送到五道口派出所,但派出所认定这是群众打派仗,拒收;于是“北航红旗”才分乘两辆卡车把人扭送公安部,这也就是“老兵”(即老红卫兵,一般指毛主席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首次检阅红卫兵之前成立的组织)的自行车轮子能够追上他们汽车轮子的原因。

正当“北航红旗”在接待室交涉时,石油附中蔡东北和人大附中王洪等人也赶到公安部北门前,此时大约在下午四五点钟。他们发现了正押在卡车上的陈昆岗和王青,大伙随即一拥而上,“北航红旗”眼睁睁看着“老兵”把人抢走了,那一刻“北航红旗”的人虽占多数,但他们看见眼前的汹汹气势,竟然没敢争夺。师大女附中的郑中伟等“红卫兵16纵队”的人即时赶到,遂迅速将陈昆岗塞进一辆小车里接走,王青则暂时返回距公安部不远的红霞公寓家中。

当时公安部尚未接受“北航红旗”的捕人要,在公安部北门外“劫车”成功后,事情本该结束了,但却横生枝节。因为在争抢的同时,得到消息的各路“老兵”已逐渐汇集到公安部北门,一部分人与“北航红旗”的人发生争执,公安部的接待人员看见局面几乎失控,便向“老兵”提出派代表向于桑副部长说明情况,于是石油附中蔡东北、甘朝生、张小光和人大附中王洪等人被“请”进接待室,“北航红旗”的人则悄然撤退了。在接待室内大伙刚和于桑副部长谈了没几句,穿着军大衣的常务副部长李震突然出现在接待室并厉声说:“吵什么!把他们全抓起来!”于是这群被“请”进去的“老兵”先被押到公安部大礼堂,紧接着就被一群警察抓捕并戴上手铐,由警车送到陶

然亭半步桥某监狱监禁。后来蔡东北调侃说:“如果那就叫一冲,我们是被他们请去冲的。”

从学院路的北航附中到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公安部,路程约有14公里,骑车需要一个多小时。我们后期赶来的同伴并不知道前面的人已经把陈昆岗和王青抢走了,而后期的自行车队伍却在不断扩大,那个年头虽没手机但处于青春躁动期的红卫兵一呼百应,中途相识的不相识的纷纷入列,甚至在马路对面骑车的人也调过头来凑热闹,于是乎上千人的自行车洪流直接涌向了公安部。

到了晚上七八点钟,天色已黑,但聚集在公安部北门前的人群仍在不断增加。当人们得知蔡东北、甘朝生、张小光和王洪等人也被抓了,“老兵”们更是群情激愤地狂呼:“放人!”公安部对此突发事件不知如何处理,于是干脆不予理睬,结果反而使矛盾升温,人群开始骚动,一部分人便顺势冲进公安部内。此后公安部紧急调派解放军战士组成人墙,封锁北大门,把人群分割成了内外两部分。而门外的人群又分成了“文”、“武”两拨,“文”的部分有我校岳小东、清华附中卜大华、张小宾、宋柏林以及人大附中杨小平等共计9人,到北门东侧的一座小灰楼的二楼与在场的公安部副部长于桑等11名干部据理力争,此时公安部已经知道“北航红旗”抓了人,但言称中央文革支持左派;卜大华则指称公安部下放专政权力,此举毫无道理而且会造成天下大乱。对方渐感理屈,于是只好“打太极拳”,“谈判”整整进行了一夜,始终没有结果。岳小东、卜大华等人离开公安部已是黎明时分,当时天降小雪;而“武”的部分则彻夜在北门抗议和喧闹……随着时间拖延,误解开始发酵,分割在里面的人饥渴难耐打算出去,但受解放军战士人墙阻挡根本出不去;外面的人以为里面的人也像蔡东北他们一样被扣押,于是口号声此伏彼起一浪高过一浪,一时间闹得鸡飞狗跳不可开交。为了支援里面的同伴,我们有人又骑车返回学校,掏出所有饭票求食堂大师傅给了一筐箩馒头,然后由李森和谷永胜硬是蹬着一辆平板三轮车从北航附中骑行两个多小时送到公安部门口,由众人举着筐箩将馒头越过人墙传进里面。但是人多馒头不够吃,在里面的钟锦屏等人冲进公安部食堂,发



现那里居然有粉肠(那时的粉肠算是奢侈品),于是众人开了一次洋荤。

有意思的是,人群中有一“首都三司”的人马——侯×华(此人后来成为著名小品演员)等二三十人在公安部南门外与我校女生任敏敏等红卫兵相遇,侯×华上前逼问任敏敏:“你们带刀了没有?带了就交出来!”任敏敏回敬说:“你敢搜身?我有把指甲刀,你要吗?”于是双方发生激烈口角,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清华《井冈山》战报有了一个“六冲”的“原创”。

事情一直闹了一通宵,公安部始终不作答复,无论是围堵的红卫兵还是阻拦的解放军战士都已人困马乏力不能支,可能公安部的头头觉得差不多见好就收,于是撤走“人墙”,众人随即逐渐散去。

陈昆岗和王青被营救之后藏进北京八一学校。这里说明一下:因八一学校离我校不远,而我校的许多同学都毕业于该校,八一学校红卫兵组织也由学校刘会远的弟弟刘历远、李森的弟弟李旦生领导,因此两校关系非常密切。约一周后,王青耐不住寂寞,从“八一”溜回我校看望大伙,被我们的对立派“北航附中红旗”发现,王青在返回“八一”到海淀镇上去买烧饼时,被跟踪而来的“北航红旗”再次抓捕。12月24日夜里2时,“北航红旗”的大批人马在北京卫戍区的协助下,大肆查抄八一学校。因“八一”的中、小学生在坚守的楼房正门做了工事(用各种家具堵住了通道),大学生的造反派们趁李莎莎(副总理李富春的外孙子)年幼贪睡,从他的房间越窗而入,绕过了值班人员防守的工事,把陈昆岗逮了个正着;同时把正在睡梦中的李旦生等八一学校的其他中学生也一并抓走,然后将整个八一学校作为“联动据点”给“查封”了,其后即在该校举办了所谓的“联动罪行展览”。“北航红旗”如此兴师动众的抓捕行动,如果没有得到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和中央文革的指使,是不可想象的。

陈昆岗和王青等人被关进北京陶然亭半步桥某监狱共计22天,1967年1月被释放。蔡东北、甘朝生、张小光和王洪等人被关押10天,由警察送回家中。当时陈昆岗和王青曾问过警方:“我们是什么罪名?”回答倒也干脆:“不知道。”

自12月16日北航附中的陈昆岗、王青被抓

与被救,石油附中蔡东北、甘朝生、张小光和人人大附中王洪等人被捕入狱,以及陈昆岗和王青又于12月24日被“北航红旗”再次抓捕,北京城的“老兵”立即做出公安部公然偏袒“北航红旗”的判断,于是被中央文革打压的怨气终于按捺不住,12月26日“联动”首次大规模聚会即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那时由北京老红卫兵组成的“联动”已经毫不掩饰地将矛头指向江青和中央文革,比11月“北航八一纵队”质问中央文革仅支持“三司”,打压其他群众组织的言论,更显出了露骨的“反革命”立场;公安机关随即与“三司”携手有计划地抓捕“联动分子”,此举必然引发“老兵”更加激烈的反弹。至于具体有几次冲击,因为其他几次本人没有全部到场,故不宜随意评说。但除了“一冲”以外,一些坊间描述的第二、三、四、五次明显带有分拆拼凑之嫌;而描述第六次“有10万北京市民奋起保卫公安部”,此说太过离谱,故所谓“六冲”之说没有确凿依据。

我和我校杨松林等人曾在1967年1月初再赴公安部参加抗议活动,但那是第几次,如今已无法确认。另据我校丁林生回忆,“联动”12月26日首次聚会之后确实有过几次“老兵”到天安门广场和公安部门前的示威行动,同时人群中也混杂大量的“三司”成员,他们与“老兵”呼喊同样的“反动”口号以达到混淆视听之目的,但最终被“老兵”识破,双方爆发过肢体冲突。

当时与陈昆岗、王青被同时关押的除了蔡东北、甘朝生、张小光、王洪等人外,还有董良翻(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之子)、孔丹(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之子)、李明清(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之子)等人。后来李明清被“北航红旗”吊在单杠上以酷刑折磨致死,只因为李明清是北航红卫兵“八一纵队”的成员。1973年北京市公安局逮捕了两名凶手并报告李井泉,但因“北航红旗”是轮番上阵毒打,分不清楚李明清最后死于谁手,李井泉表示不追究他们的责任。打死李明清后不久,“北航红旗”在中央文革的授意下又以“刺刀见红”的恶劣手段将彭德怀的两根肋骨打断,又将陪斗的张闻天头部打伤。■

(作者为原深圳绿鹏农科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责任编辑 洪振快)

# “伤心桥下春波绿”

## ——读李锐流放日记

○ 奚 青

李锐一生中,有四段婚恋经历。其情感生活的不尽波折和苦难,皆与党内斗争和政治运动密切相关,可谓若干历史的折射与照影。迢迢回顾,发人思省。

### 重庆的洞房

李锐的第一个爱侣,是武汉秘密学联领导成员之一的万国瑞。“一二·九”运动中,万是汉口女一中的学生,但却担任了该市学生大游行的总指挥,可见其英武与飒爽。1936年她考入武汉大学化学系,同高两班的秘密学联负责人、机械系的李锐接触更多。志同道合,并肩战斗,彼此渐生爱意。由于找不到党,以李锐为首的学联中最积极分子,酝酿建党,于1937年2月自发建立“中国共产党武汉临时支部”,万国瑞是9名成员之一。这年春天,李锐和万国瑞先后秘密离开武汉大学,到北京找到党组织,他们的党籍得到认可。6月的一天,警察在李锐住处搜查出进步书刊,将其逮捕。李佯称自己从长沙来北平考大学,书刊是一个刚回老家的同学放在这里的。敌人查不出其底细,得到释放。在这段颠沛和动荡的岁月里,李锐与万国瑞经历了惊险加热恋的革命浪漫,从此双双走上职业革命的道路。在京期间,李锐为万国瑞起了个化名“杨纯”(延用终生),以纪念两人纯洁之爱情。

不久发生卢沟桥事变,李锐、杨纯和一批流亡学生撤往济南,参加了省府组织的培养抗战人才的青年训练班。继而李锐随中共山东省委转移到泰安,万国瑞并一批女生去了济宁。分别前,李锐将自己的名字李厚生改为李锐。所以取“锐”字,是“锐”、“瑞”同音,含深深眷念之意。

从此,这对革命情侣天各一方,失去联系。1938年3月,李锐以山东平津流亡同学会代表的名义,

到武汉参加全国学联大会。其间还拜见了冯玉祥、沈钧儒、王昆仑、许宝驹、罗隆基等名人,为流亡学生募得一笔捐款。由于山东泰安等地都已沦陷,被中共长江局派往徐州李宗仁所辖的第五战区开辟青年工作,任该地区青年救国团总负责人。徐州突围前,李锐率救国团部分人员赴东北军于学忠部,组建战地工作团。在突围过程中,部队被打散,李锐突围出来,从苏北到上海,再取道香港、广州,回到武汉。接着受中共长江局委派,到湖南省委负责青年工作,任省青委书记。

武汉沦陷前夕,大批进步人士和团体撤到长沙,李锐频繁接待。其间,原武汉秘密学联领导成员、懿训女中的范元甄,担任了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所属抗战演剧九队的负责人(为地下党支部书记),与李锐邂逅。他俩在“一二·九”运动中便已熟悉,有时在东湖泛舟聚会,有时去教堂布置任务,过从较多。“大江东去浪滔滔,似火青春万丈苗。”(此句并以下未注明诗词,皆为李锐旧作——笔者)意外重逢,彼此自然而然萌生慕恋之情。未久范元甄调去重庆《新华日报》当记者。李锐在信中要求范元甄给他半年时间,寻找杨纯;如果找不到杨纯,两人再发展关系。范元甄反对这一动议。因为李锐的俊帅,特别是他的革命胆识、才干和理论修养,都使她倾心。尽管范元甄不肯许诺“等待半年”,但她还是真诚、友善地打听过杨纯的消息,只是没有结果。或许,这正是她期望的结果。

1939年夏,李锐去重庆参加中共南方局(原长江局)青年工作会议。开会期间同范元甄结婚。

失散两年多的杨纯,此时流转向何方?

她起初留在山东,参加了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历经无数次浴血战斗,升任第四游击支队(相当于团)政委。后调皖苏新四军根据地,任皖东北特委书记、苏北区党委组织部长(黄克诚为书记)。

她曾与张爱萍结婚,后离异同宣传部长张彦结婚。

1943年,在延安“抢救运动”中,李锐被诬为国民党特务而受关押。其中一个荒唐的指责是:传说他的前女友杨纯,在新四军中有严重问题。直到这时,即分别6年之后,李锐才得知杨纯在新四军中。不久刘少奇从新四军回到延安,郑重澄清:“整个新四军中,杨纯是第一个最好的女干部!”一言九鼎,使李锐在这个纠结上得以解脱。

杨纯与李锐同龄,范元甄则比李锐小4岁。1938年,世界青联代表团来中国,支持抗日战争。武汉各界召开大会,欢迎代表团,17岁的范元甄代表中国青年即席讲话。王明对她的精彩发言,朝气蓬勃的风采,特别赞赏,说“这种人应该是共产党员”。实际上,小范经其国文老师何伟(解放后任广州市委第一书记、驻越南大使、教育部部长等职)介绍,已经入党。

小范年轻,漂亮,写一笔好字,写一手好文章,口才极好。抗战初期,她是与彭子冈齐名的中共女记者,在《新华日报》上用本名发表多篇文章。李克农对她亦有好感,曾布置她作过一些情报工作。周恩来和邓颖超尤其欣赏她,视为干女儿。小范曾把李锐写给她的情书,送给周、邓过目。

范元甄写信给吴淞、光未然(著名诗人张光年笔名,《黄河大合唱》《五月的鲜花》词作者)等朋友,说她很钦佩李锐,两人已经相爱。光未然回信祝福范元甄:“在那许多勇于逐鹿中原的人中间,你选择了他,当然是不会错的。”范元甄在写给李锐的信中坦陈:“在一个可爱的男孩子面前,对果(李锐昵称——笔者)的思念就会被挑起。也许因为他正是可爱而为我所爱,又最恰合的男孩子吧。”

由于行踪不定,聚少离多,李锐利用赴重庆开会之机,和范元甄匆匆结婚。那年他22岁,小范18岁。婚礼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举行。所谓婚礼,只是叶剑英给两人拍了若干照片,大家吃了顿便饭而已,并没有举行正式的仪式。当时周恩来(并邓颖超)在苏联治疗臂伤,新婚的洞房,便是周恩来夫妇的卧室,婚床即周、邓的睡榻。

## “抢救”爱情

1939年底,李锐和范元甄双双去了延安。

周恩来回到重庆后,责问为什么把小范调走了?得知是博古(南方局组织部长)决定的,小范到延安后进的不是抗大、女大,而是中共最高学府马列学院(其中女同志较少),便没再说什么。在延安期间,小范曾收到周恩来关怀和勉励她的一封长信。她一直珍藏到晚年,上交组织。

抗战中的延安,男女比例约为18:1。李锐和范元甄郎才郎貌,女才女貌,一个金童,一个玉女,人人艳羡。李锐在闲谈中对笔者讲过:“那时候,范元甄比我有名,是所谓‘四大美女’之一。最出风头的一次,是中央举办一场关于宪政问题的辩论比赛,范元甄代表马列学院扮演国民党的代表,抗大学员为共产党的代表。结果,小范把共产党一方的代表给辩倒了。这事成为笑谈,传了很久。”

还有一个例子,说明范元甄卓尔不群。有次她走在清凉山的小路上,正好碰上毛主席带着警卫员下山。毛闪到一边说:“小范同志你先走。”范元甄非常惊讶:主席怎么知道自己?还有一次,她在窑洞前纺线,突然发现纺车前面出现一双大脚。抬头一看,毛主席正微笑着看她纺线。主席怎么认识她,知道她是小范?她一直没搞清楚。

在马列学院学习一年多,范元甄调入中央政策研究室(相当于中共中央的“翰林院”),任弼时是主任,副主任陈伯达负责实际工作。20岁的小范,在研究室国际组工作。

1943年4月1日,时任《解放日报》评论编辑的李锐,在“抢救运动”中突然被保安处逮捕。范元甄自然不肯相信夫君是什么特务,她在两天后的日记中写道:“看是什么王八蛋捣的鬼吧。”20天后,她又动摇了:“在所谓感情上,我真是对他毫无留恋了。……整风以来,即使不是敌人的问题,我已不能满意于他,满意于他之对我。”“除了一个党员与反革命之间的关系外,再没有一点私人关系。”可是,5月9日凌晨小范却又做了个梦:“说是他回到报馆,他并没有问题,误会都弄清楚了。还有博(《解放日报》社长博古——笔者)讲了些话。”就在思想反复之际,老邓表态了:“小范在小事上比谁都聪明,大事上比谁都糊涂。”范元甄对此“觉得亲切,意味着对我的爱护的责备”(43.5.10日记——指1943年5月10日日记,下同)。此后,老邓在小范的日记中频频出现。



老邓即邓力群，政治研究室指派“抢救”范元甄的干部。当时运动的逻辑是：既然李锐是特务，那么妻子多半是同伙。范元甄日记称：“我在梦中！人们都以为我是特务。只要我说出怎么加入的，就赦免我。……我真盼望我曾是加入过特务机关的。”小范没有李锐那么坚强、刚毅，她心里灰溜溜的，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情绪。她在43.5.23日记中坦露：“昨晚他们跳舞，起初我没跳（昨天例假第三天），后跳了几次。都没有上次那样高兴。烦，我又有点不想管束我自己了。这是很危险的。”其所指，很可能是她同邓力群的关系——她已经被邓“抢救”到自己的床上。

1944年春，范元甄“为了改剧本，与恩来同志长谈了一次。有一点新的感觉：党看问题并不像研究室个别同志那样简单幼稚的。一席话，使我发觉，反特斗争以来，连我自己也把事情太简单化了，仿佛什么都是特务、特务。”（44.3.15日记）

这年6月，经周恩来亲自干预，李锐平反出狱。此前，博古专门找范元甄谈话，嘱咐她千万不要把她同邓力群的事告诉李锐，以免再度打击他。可李锐放出来当天晚上，范还是如实讲了，说她敬佩邓力群，崇拜他的学识和能力，两人是属真诚相爱。李锐听完，当即走出窑洞，决然和范元甄离婚，并为此大病一场，在医院中抢救。

邓力群当时有老婆孩子，他和小范如此胆大妄为（同床时曾先后被他妻子和胡乔木撞见），影响极坏。鉴此，杨尚昆主持中央直属机关学委（整风中成立的学习委员会，总学委负责人为毛泽东）大会，连续五天对邓、范两人进行批判。杨尚昆严肃指出：“在审干中发生这种挖墙脚就会影响到对党的政策的怀疑，甚至刺激起对党感情的决裂。”“从这次事情的责任说来，双方是一样的。之所以特别着重责备一方（指邓——笔者），是因为他在这件事上犯了政治上、思想上的错误。”其根源，是“狂妄的个人主义”。

批判会后，范元甄被下放到延安周边一个乡当文书。不想邓力群竟追到那里，冒充丈夫，与范同居一周。用当今的话讲，是属“顶风作案”（此事系范元甄在悔改中告诉李锐的，杨尚昆等领导始终不知）。

“挖墙脚”一事，无疑成了延安一大丑闻。范元甄名声扫地，从昔日的一朵花变成了“豆腐

渣”，精神一下子垮了。她把杨尚昆在批判大会上的长篇总结发言认真誊抄一份，交给李锐，表示忏悔，同时提出复婚要求。李锐骨头很硬，但心肠甚软。当时黄乃（黄兴之子）和刘祖春（解放后曾任中宣部副部长）等挚友都劝止李锐，可在蔡畅等人的说和下，两人还是于一年后复婚。

2011年一个春日，笔者去看望李锐。李把范元甄誊写的杨尚昆发言原件拿出来，给我和他外甥看。60多年前的蝇头小楷，甚是娟秀工整，透着范的才气和自疚。李锐感慨地说：“扪心自问，我这一生没做过对不起人的事，也没犯过什么错误。”他外甥脱口说：“你和范元甄复婚，就是最大的错误。”我亦表示同感，进而问李锐：“你那时候干嘛要复婚哪？”他说：“当时我想，我离了她，我好办，找个什么样的都有条件。可是她怎么办？臭成那样，谁还要她？”

在阅读李锐和范元甄数十年日记、书信的过程中，本人有个深刻的印象：李锐总是迁就范元甄，让着她，宠着她。即使是复婚之后的头几年，范也常常对李使性子，发脾气，仿佛出轨、受批判的不是她，而是夫君。我问过李锐：这是为什么？李说：“到延安后，她早（流）产一次，还堕过两次胎；再后，生了三个孩子。这些，都影响了她聪明才智的发挥，所以我总觉得亏欠了她，对不起她，也就总让着她。”

## 大难来时

1949年在北京时，周总理去医院探视张西曼教授，听说小范也在这里住院，便特意去病房看望了她，一时引起轰动。1952年到北京以后，30出头的范元甄，便担任了三机部（后为航天工业部）重点军工厂——青云仪器厂的总工程师，名位显赫。正当姹紫嫣红之际，不料一场暴风雨兜头而至——李锐在庐山会议中逆鳞惹祸，牵连到她。常言道：“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如此男女，当属薄情寡义的少数。范元甄走得更远：她竭尽全力揭发李锐，把“大跃进”中李锐议论毛泽东的私房话全端了出来，必置夫君于死地，以求得自身的解脱。结果导致李锐被开除党籍（这场反右倾运动中，只有李锐被开除出党），劳改，坐牢，20年不得翻身。

李锐罢官后，田家英给他打电话，有这样一句：“我们是道义之交”。范元甄听到后马上举报，致使李锐家中的电话被拆除，田家英挨整。水电部部长刘澜波对李锐比较同情、爱护，曾抚慰他：“留得青山在，续受委屈吧。”范元甄认为刘与李划不清界限，亦向上揭发。这一切举动，并没能保住她的官位。李锐的秘书在清理李办公室的东西时，发现抽屉深处有范元甄写给李的一封信，其中有质疑粮食放卫星等当时犯忌的内容。该秘书没有揭发李锐一个字，但愤不过范对丈夫落井下石，于是主动将此信交给组织。为此，范总工程师同样受到查处，被贬为热处理车间炉前工。

庐山会议后，水电部揪出一个“李锐反党集团”，一百多人受到株连。李锐白天在部里接受批斗，晚上回家挨范元甄批斗——无止无休的高声责骂。

李锐于1960年5月流放北大荒劳改，在这之前，范便提出分手。李锐1960.2.7日记载：“晨，范正式冷静提出离婚问题。经济安排等均谈到，置我于困境，类扫地出门。过去之恶吵，全由政治也。”1960.2.10日记：“因抽出存款4300+1100，留条，引起大吵，并大出拳掌！我前世何孽！”1960.2.11日记：“手中无一文。为理发，取走彼袋中款，又大吵谩骂一顿，并将孩子叫来……”1960.3.7日记：“昨天晚上发展到爆炸程度。……结果高举钳子，以门代人泄忿，将我的房门打个窟窿。”

由于田家英找李富春援助，1961年11月20日，差点饿死的李锐得以从北大荒回到北京。没等他缓过神来，范元甄即于11月31日逼他同到法院办理了离婚手续。此前，她把李锐从北大荒寄给她的讲“大跃进”真实情况的信，全部上交组织，以示大义灭亲。李锐1961.11.30日记吟诗慨叹：“世事当今正反闻，亲人终竟变仇人。为避边寒返都日，一台压轴办离婚。”

离异后，李锐住进一个小单间，后搬到另一栋楼里，自己单独起伙，保姆蔡嫂有时偷偷给他送些饭菜。没有搬出前，范元甄经常打上门来。李锐1961.12.3日记：“又大发作，要强撵我出屋，守住将窗户打开（知我疾咳嗽多日也）。最后一招是将被窝、什物掷之窗外。出手一拦，则出泼

皮撒赖：‘你还打人’。于是我眼鼻之间被抓破，又手持菜刀破门而入，幸蔡嫂死命抱住，否则是要大流血的。好在这些都有精神准备，并非意外之击，还破口骂刘（指水电部部长刘澜波——笔者）。此人实令人心死。抱小妹一阵，心痛之至。”1961.12.6日记：“晚上又大发作：为何回来不检讨，无歉意。从此屋到彼屋，马上滚蛋。今天痰咳转重，有气喘之势。只有拼命应付，穿上大衣，戴上口罩，全副武装也。直僵持到夜三点。”1961.12.18日记：“六点即从床上叫去，要清算这二十年。沉默是不行的，道歉更不行，认错是空洞，必要一件件谈，真正沉痛。……呜呼！当然就不能再给饭吃了。我宁肯饿死，也不能再受此训凌。拿到4.5斤粮票，总还有饭馆。但就是怕，不吃饭仍不得安静。我生何孽！”搬出去后，仍有感叹：1962.2.13日记：“此人之反复任性，人类之空前绝后。”1962.9.8日记：“夜听《茶花女》话剧（演员水平不高）。小仲马留给人类这样崇高的灵魂，美丽的悲剧。马格里特死前终于还能见到悔悟的阿芒，还得到公平。呵！我是——夜半不能寐，服药独伤心。”

这种日子，持续了一年多。

1962年7月7日，李锐于日记中感伤：“七七廿五年了！北京十年，从没去过一次翊教寺。现在真有此意愿。”翊教寺，即“七七事变”前他和杨纯到北京寻找党组织关系时的住所，亦即两人热恋之地。李锐经常想起第一个爱人杨纯：倘若当年不曾失散，何以至此……

解放后，杨纯先后担任华东纺织管理局局长、周恩来秘书、中国医学科学院党委书记和卫生部副部长等职。1953年杨纯是人大代表，自上海来京开会，找到李锐，两人回顾既往，感慨万端。李锐对范元甄一向宽厚、忠诚，没想到灾难来时，范元甄竟恩断义绝，把她的不顺和失落，化作无尽的仇怨，统统发泄到李锐身上！

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水电部党组本有为李锐恢复党籍、降为局级干部使用的意向。怎奈范元甄不断告发李锐，使刘澜波等难以援手。1979年回京复职后，李锐才从刘澜波处得知：邓小平看完范元甄揭发李锐的两大本材料后，说：“太恶劣了，烧掉！”范元甄于“文革”中得知这一情况后，引以为荣：全党第二大走资派如此这

般,更说明自己是正确的……

笔者问过李锐:“邓小平当年指的什么?是说范元甄的告密行为和怨毒的言语太恶劣了,还是你的‘反党言行’太恶劣了?”李锐说:“搞不清。”我说:“可能是前者更重一些,倘若是你的‘反党言行’太恶劣了,作为重要的文字证据,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是不会让人烧掉的。”

李锐在1962.10.5日记中写道:

夜听《钗头凤》。陆游与唐惠仙悲剧。剧本不算顶好,仍有诗剧之感。陆游如此多情的诗人。还是“沈园”两首动人,引起我的许多感伤(剧中“淡了,远了”的是真情)。

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  
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  
此身行作稷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

陆游与表妹唐婉(惠仙)青梅竹马,婚后琴瑟和谐,但却被他母亲蛮横拆散。陆游无奈另娶,唐婉郁闷他嫁。两年后,这对棒打的鸳鸯于绍兴沈园偶遇,陆游悲情难抑,在墙壁上写下千古绝唱《钗头凤》。唐婉和了一首给他,因伤情过度,未久香消玉殒。40年后,陆游重访沈园,百感交集。李锐钦慕陆游和唐婉的深情,更为两人的离散而叹惋。李锐的感伤在于:自己和范元甄同样有过美好的恋情和婚姻,而毁掉这一切的,却是两次错误的政治运动,以及范在逆境中的不贞和寡义……

李锐在1963.12.13日记中感怀:“昨夜看《州委书记》(前苏联长篇小说——笔者),九点多即上床。屋子很冷。有一段爱情与友谊的话颇值得抄下,这是我长期考虑过的:‘大家知道,爱——这是一种不如友谊那样巩固的感情,而且,无论如何也是更自私的,只有在与友谊并存的时候,爱情才是巩固的,长久的,忘我的。在困难的时刻,在人生的道路上时时可以遇到的容易摔跤的地方,友谊会扶助爱情。在爱情无能为力和不忠实的地方,友谊却能坚持,能经得住一切。’”李锐联想到的,显然是自己同范元甄的关系。他在

1964.10.12日记中叹喟:“高音(指高声吵骂的范——笔者)之虐待,很像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世上公私生涯如我者,确是稀有稀有。”

## 红颜知己

1975年,李锐离开关押他8年的秦城监狱,再次被遣送到大别山中的磨子潭水电站。这年,他58岁。此时“文革”已进入末期,不像初始那般雨骤风狂,人们的情绪亦多松弛、懈怠。李锐的勤谨、耐劳、亲和,尤其是超凡的文化造诣和思想道德修养,给水库职工留下良好的印象。尊敬、同情和盼望他(并彭德怀等)洗雪冤情的人,相当多。就在这期间,一位上海女知青走近他的生活。

李锐在给大姐的信中讲:“这里有一个女孩子,很关心我,知道跟我接近能获得一些有益的东西,常帮我做一些我做不好的生活事情。如补毛袜、毛裤之类,还想学我的字(她未婚夫嫌她的字写得不好)。”

姑娘聪颖,敏学,勤快,是当地有名的“一枝花”,即将结婚。为答谢她的照顾,李锐托大姐寄来竹制笔筒和茶叶相赠。却不料,其未婚夫很快被癌症夺走生命。姑娘请李锐代拟电报、信件与悼词等,把他视为精神依托。而此前,当地领导以阶级斗争观点,已禁止她与李锐来往。

巨大的悲痛和人生挫折,使姑娘把自己的关切、怜惜和真挚的爱,转移到李锐身上。此时,李锐已醵居14年,此种关爱如一股清泉,浇灌着他那荒芜既久的情感沙漠。李锐信告大姐:“如此逆境,得此人缘,确是一种莫大的安慰。”

笔者阅读李锐“文革”日记,通篇皆感沉郁。唯有同小姑娘交往的短暂记述,漾动着生命的绿色。

1976.1.30:“今日除夕,我也未能免俗。上午洗衣、做菜,将琬姐寄来腊味蒸了几小块。晚上食堂不开餐,自煮腊羊肉面,并小饮自制橘子甜酒一杯。下午与晚上,见此孤独老人可怜,一位小客人(指姑娘——笔者)来与我做伴。特请吃京沪糖果,琬、灼(李锐的大姐、二姐——笔者)寄来尚未开盒也。”

1976.1.31:“昨夜看《多雪的冬天》(苏联长篇小说——笔者)至一点,也是守岁,但六点不到即醒来,听老鼠掘洞声。整个下午至夜晚,小客人包元宵(有



人送了糯米粉),各种甜、肉馅,欣然自赏。”

1976.2.6:“六点起床,锻炼。下午沿公路下金家冲漫步,路遇旧识漫谈。还我青春,想作首诗,难得的愉快心情。夜续摘《冬天》。”

1976.2.8:“六点起床,锻炼。招待小客人。夜再观《杜鹃山》。”

1976.2.15:“因雨,起床稍迟。自午至夜蛰居房中,难得随意倾心。”

李锐每同小姑娘相聚,日记上端皆作个记号,不过内容都相当简略。唯1976.2.16日记,赋诗抒情:

一系红绳合一人,喜传海上太湖滨。  
时烦双鲤漆胶谊,岂阻重山鱼水情。  
志趣相投偕白首,短长互补葆青春。  
风霜冰雪莫何奈,祝愿长如梅竹亲。

这是已知李锐诗词中,独有的一首情诗。从中可见,他和小姑娘情感之深挚,意趣之投合,且有白首偕老之愿。“时烦”、“岂阻”,指当地领导已经监视他们。李锐认定自己和姑娘的关系是正常的、正当的,故而表示:“风霜冰雪莫何奈”。结果,风霜冰雪还是很快到来:两人遭到粗暴干涉和多次大会批斗,最大的一次是在磨子法的领导单位下游佛子岭电站举行的,那里更人多势重,被上纲到“阶级斗争新动向”的高度。为此,李锐日记中断数月之久——他和姑娘所蒙受的奇耻大辱,实难笔诉。

“文革”的一大功效,便是摧残人性和良知。一缕美好的情缘,就这样被斩断了。其后,李锐在给二姐的信中,诉说了他的愤懑:“翻《龚自珍全集》(‘不拘一格降人才’作者)。这个开一代风气的人,终身微官,志不得伸,辞官回乡,颇有些‘艳遇’流传。于是有人论述,因不得志,‘于是乃横逸斜出,为红粉知己之想’。……我何感相伴!且龚归乡二年而逝,仍是一直埋头著述的。这种‘情不自禁’的咏叹放诞,也是诗人一时难免。我之写上这段,就在花事(指同姑娘交好并被批斗——笔者)。当时也颇有‘红粉知己’聊慰寂寞之感,而终坠聊斋故事也。”

多年之后,李锐这段“花事”仍被若干人视为“污点”,包括他的女儿。本人则完全相反,认为

这是李锐人生中的一个亮点,耀眼的亮点。试想:小姑娘当年26岁,年轻,貌美,她同大自己32岁的李锐相爱,图什么呢?或者反过来说:李锐乃戴罪之钦犯,除了“彭德怀反党集团追随者”、“阶级异己分子”等沉重的政治帽子外,一无所有,他依什么条件与姑娘牵手呢?唯一的解释是:李锐以其独有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姑娘的芳心。这场爱情悲剧,无疑映照出姑娘的纯洁、真挚和勇敢,令人激赏!

事过多年,李锐始终对姑娘心存感念。他告诉我:“这姑娘后来结婚了,留在安徽某县城,而没有回上海。她知道我回京担任了要职,但从没找过我,没要我帮她解决什么问题。仅此一点,也可以看出她的自尊、自重,品德是很不错的。”

## 替党向你赔礼道歉

“时待长安新信息,云天孤雁喜春还。”1979年,李锐平反、复职。范元甄情随势转,对她弟弟流露出同李锐复婚的意向和希望。李锐知悉后一度犹豫:要不要给子女一个完整的家?并为此征询亲友的意向。此时,李锐的亲友百分之百、异口同声、坚决果断地阻止李锐:你如果还想活下去,好好过个晚年,就绝对不要和范元甄沾边!他的家庭成员中,都努力为他找好老伴。很快,建设部负责老干局工作的张玉珍被推荐。张的夫君已经去世,是声望很好的老红军。当她知道李锐的前妻和三个孩子都在,挂念他们是否应当复婚。刘澜波于是找她谈,在座有电力部副部长王林。刘甚至说:“李锐要是和范元甄复婚,(指着王林说)我们部党组的同志都反对。”于是张玉珍同意了。1979年结婚时,李锐62岁,张玉珍49岁。

人们常羡慕和夸奖“米脂婆姨绥德汉”。张玉珍是陕北米脂人,名副其实的美女,她家是贫下中农。延安大撤退时,毛主席曾去过她家那个村,进过她的家,和她母亲握过手,拉过家常。她14岁进入绥德抗大学习,后参加八路军,抗美援朝时担任后勤工作,当过护士,任劳任怨,还学过医。后长期在建设部照顾老同志,甚得好评。“文革”时,她非常厌恶江青和“四人帮”的作为,她家成了老干部及其子弟的避难所和招待所。

张玉珍朴实,善良,正直。她敬重李锐的人品,对他遭受的苦难深为痛惜。她抚慰李锐说:“共产党对不起你,使你受了很多委屈。我来好好照顾你,就当共产党向你赔礼、道歉了。”张玉珍这样说,也这样做了。她对李锐体贴入微,悉心照顾。李锐两次心脏病突发,全是她发现后立即送往医院,抢救过来的。她守候在北京医院,几天几夜不曾离开李锐的床边,医护人员无不深受感动。平日里李锐吃药、打针、保健、食疗等事,悉数由她料理。

1989年李锐处境艰险。张玉珍非常担心,特地去找帅孟奇大姐,说李锐很可能遭遇不测,请大姐帮忙,让自己随同他一道去,好照顾他(她已经准备好了药品、注射器等)。帅大姐说:“不会吧,不会吧,你别哭,我答应你。”不久李锐同杜润生、李昌、于光远一道,在中顾委受到追查和批判,趋势是清除出党。几个月后,此举被陈云挽救过来。

杨纯住在木樨地和李锐相邻的一栋楼,张玉珍常陪同李锐去看望她。晚年的杨纯,似乎看破红尘,什么都不想管,也劝李锐不要出头,免得招惹忌惮和压制。实际上,杨纯是对党风越来越失望,忧心忡忡。张玉珍多次说:那大姐好哇,真好,我们能谈得来。

我问过李锐:杨纯有范元甄漂亮吗?李说没有,但杨非常有才干,待人真诚。李锐不止一次对我讲:“抗日战争中,女团政委很少有几个,杨纯和赵一曼一样,都是真正带兵打仗的啊!”钦佩之情溢于言表。我也深为感慨:“当年,你和杨纯若是不失散就好了……”

李锐尤为称许和感激相濡以沫的张玉珍。他对友人说:“老伴贤良,因此晚年有一个如愿幸福的小家。我这条命是她给的,没有她我活不到今天,我的文章和书一多半是晚年写的。”李锐写过一首诗《赠老伴玉珍》:

我还越活越年轻,感谢婆姨米脂人。

护士医生兼政委,喜欢乱讲最担心。

李锐以90多岁的高龄,仍经常游泳,笔耕不辍,殊为罕见。他与张玉珍相亲相爱,也时有诙谐逗趣之乐。有次在饭桌上,谈起“米脂婆姨绥德汉”,李锐问我:你知道为什么陕北出美女吗?我说不清楚。李锐解说:“西北自古以来就是汉族同少数民族征战和融合的地域。原来‘五胡乱

华’有匈奴、鲜卑、羯、氐、羌五族,现在除羌族外,都同化了。人种杂会,就产生美男美女。”我说,你和你父亲长得都像外国人,李锐说:“是。我接受邀请去美国哈佛访问,有人就问我:你是不是犹太血统?我的祖母是广东客家人,大脚。说不定,先祖在哪一代上也有过异民族的融合。”

范元甄同李锐复婚的幻想破灭后,仇怨叠加,扬言不把李搞下台不罢休。1984年,范向陈云写信状告李锐。此时,邓力群和一位干部家属亦给陈云写信告李锐。陈云批示:既然这么多人有意见,看来李锐可调离组织部。这个情况是习仲勋告诉李锐的。好在因年龄过线,李锐已两次请求离休。于是组织部开常务会,肯定李锐在中组部的成绩,向全国发文,一体周知。李的组织关系仍留在中组部。

鲁迅说过:“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李锐、范元甄的悲剧,留给人们很多反思和警示。对于已经作古的范元甄,笔者始终抱有深深的惋惜甚或怜悯,因为她既是助纣为虐的害人者,又是令人同情的受害者。面对着她年轻时的照片,我禁不住感叹:当初如此美好、优秀、温存的革命少女范元甄,何以变成后来那个冷酷、暴戾、无情无义的政治怨妇?是谁把她的人格与道德扭曲、异化成这种样子?

李锐的好友、新华社副社长李普发表文章归结说:李锐和范元甄“是思想改造的两个截然相反的典型,两个人各处一极。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从延安开始的。可以说,范元甄是在延安经过整风运动就改造好了,而且改造得出奇地好,出奇地彻底,因此,思想言行‘左’得出奇,越来越‘左’得不可思议。李锐恰恰相反,几十年间无论用什么办法都没能改造他,批斗也罢、撤职也罢、开除党籍也罢、流放也罢、坐牢也罢,李锐还是李锐。他一生中越来越自觉地反‘左’,老来反‘左’更坚决、更积极。”

在罹难的20年中,李锐阅读了许多,思考了许多。“积思多愤声情烈,剑胆琴心万玉鸣。”离休后,他重操董笔,著述甚丰,其成就远远超过官位上的业绩,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

2008年,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和中国改革开放30年论坛暨评选活动组委会发起,以民间自由投票的方式,评选

改革开放30年以来全国杰出人物、经济人物、社会人物、农村人物各30名。李锐当选杰出人物(同登该榜的有杜润生、袁隆平、于光远、吴敬琏、江平等)和社会人物(同登该榜的有刘道玉、吴明瑜、吴南生、周强、周瑞金等),可见其声望之隆。

李锐是受人尊敬的中共元老,又是位有争议

的人物。盖因其“笔底风波今未免”,“仍骑虎背进谏言”。有争议是好事,是非辩而澄显,真理论而铮明,怕的是无人抖擞,万马齐喑。李锐自谓“六根未净少年郎”、“生平意气老犹昂”,对于历史检验,似乎颇有信心。■

(责任编辑 黄 钟)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 费
天下得失 蒋介石的人生	汪朝光等	42.00	6.00
中山舰事件:国共关系史上的秘案	张聿温	32.80	6.00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119.00	12.00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150.00	12.00
国家记忆(一)	章东磐	98.00	10.00
国家记忆(二)	章东磐 晏 欢	88.00	9.00
可操作的民主	寇延丁 袁天鹏	28.00	7.00
红墙医生:我亲历的中南海往事	王 凡 东 平	36.00	7.00
张学良遗稿:幽禁期间自述、日记和信函	窦应泰	38.00	7.00
西安事变新探	杨奎松	48.00	8.00
走出腐败高发期	高 波	58.00	8.00
邓小平访美那九天	陈天璇	32.00	7.00
官场怪圈定律	李茗公	46.00	8.00
黄埔恩怨	王晓华 张庆军	38.00	6.00
国共往事风云录(全四卷)	尹家民	146.00	14.00
我想重新解释历史	吴 思	28.00	7.00
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	萧冬连、谢春涛等著	88.00	10.00
读史求实	杨奎松	38.00	7.00
净土	马彦瑞	28.00	7.00
历史的碎片:侧击辛亥	张 鸣	26.00	7.00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共四卷)	金冲及	128.00	12.00
信心与希望:温家宝总理访谈实录	新华社总编室	26.00	6.00
绝密档案背后的传奇(全五套)	北京电视台卫视频目《档案》栏目组编	144.00	14.00
母亲杨沫	老 鬼	45.00	6.00
血色黄昏	老 鬼	39.00	6.00
血与铁	老 鬼	39.00	6.00
烈火中的青春:69位兵团烈士寻访纪实	老 鬼	38.00	6.00
1911—1912 亲历中国革命	埃德温·J·丁格尔	36.00	7.00
亲历民主 我在美国竞选议员	龚小夏	28.00	6.00
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	史景迁	19.60	6.00
李锐反左文选	李 锐	22.80	6.00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	杨继绳	42.00	7.00
通往立宪之路	刘刚 李冬君	60.00	8.00
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	张木生	58.00	8.00
文人陈独秀	石钟扬	39.00	7.00
1943 一盆红红火的火(谢韬日记选编)	谢 韬	49.00	8.00
聆听历史细节	王 凡	36.00	7.00
高岗传	戴茂林、赵晓光	59.00	7.00
西路军——河西浴血、生死档案、天山风云	冯亚光	126.00	12.00
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上下册)	邓 鹏	97.00	10.00
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南泉黄宗良等	246.00	20.00
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	雷 颐	29.80	7.00
我与中国民主同盟	梁漱溟	43.00	8.00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杨奎松	88.00	10.00
何方谈史忆人:纪念张闻天及其他师友	何 方	39.80	7.00
直译中苏高层会晤	顾达寿口述 郑少锋执笔	28.00	6.00
望九琐忆——一位老者的20世纪	白永达	22.00	6.00
底层的叩问——肖复兴人生笔记	肖复兴	25.00	6.00
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实录(内部发行)	乔云华	58.00	8.00
共和国大审判(二)——特别法庭内外纪实	王文正口述 沈国凡采访	38.00	7.00
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	49.00	8.00
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	金以林著	48.00	8.00
红墙知情录(一二三)	尹家民	95.00	10.00
历史:何以至此	雷 颐	28.00	6.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6.00	7.00
三野名将	吴东峰	28.00	7.00
四野名将	吴东峰	28.00	7.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I	杨天石	60.00	8.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II	杨天石	38.00	6.00
“中间地带”的革命	杨奎松	54.00	9.00
牛棚杂忆	季羨林	29.00	7.00
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	林贤治主编	38.00	7.00
历史大转折中22个首任省长、市长和自治区主席纪实	孟庆春	49.80	7.00
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	侯井天	98.00	11.00
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朱 正	26.00	7.00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	萧克 李锐 龚育之等	28.00	7.00
流逝的岁月——中央党史研究室前副主任李新回忆录	李新著 陈铁健整理	39.00	8.00
走出个人崇拜	冯建辉	16.50	5.00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薄一波	88.00	11.00
夹边沟记事	杨显惠	34.00	7.00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沈宝祥	39.80	8.00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戴 煌	21.00	5.00

## 代购代邮

《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群龙无首,派系林立,谁能胜出?相比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只能算是“党内后进”,“一大”时连中执委候补委员都不是的蒋介石,在他向“党国领袖”迈进的过程中,引发党内元老们的大大不满和不服,甚至军事将领们也时不时的挑畔一下。围绕着“军权”与“党权”,蒋、胡、汪三方不断演绎出分分合合、上台下台的复杂故事,一旁的太子派、西山会议派、地方实力派也伺机而动……

本书选取了从1931年2月28日夜胡汉民被扣,到1932年3月1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选举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一历史时期,细致梳理和论述了国民党高层内的派系政治斗争。

《中山舰事件:国共关系史上的秘案》时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广州卫戍司令的蒋介石,突然派兵逮捕了和他同样是中将军衔的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软禁了国民党领袖汪精卫,包围了苏联军事顾问团……

然而这场政变却最终被苏联人和中共所容忍,汪精卫被迫流亡海外,蒋介石则趁势坐上国民党的第一把交椅。此书将解开重重谜团,展现“中山舰事件”的来龙去脉。

《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1936年4月9日延安会谈以后,中共统战的策略由“抗日反蒋”至“逼蒋抗日”,最终导致西安事变,因为有延安会谈的举行,使张学良由原来主张“拥蒋”而迈向中共的“抗日反蒋”之路。

张学良与中共的关系,尤其事变前张学良与中共的关系问题,中共和苏联在西安事变发生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在事变期间,蒋介石与周恩来之间曾发生过什么?

本书将让您清楚的了解,在西安事变之前,事变期间以及事变善后的过程中,张学良与中共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中共对于整个事变起过怎样不可忽视的作用。而身为十几万东北军统帅,深得蒋介石器重的张学良,何以会冒险与自身尚处于极度危险中,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的几万红军暗通款曲,甚至于把宝押在中共身上?这里面究竟有着怎样复杂的内幕?

本书也首次全面披露了中俄两国档案中仅存的有关张学良要求入党问题的几份珍贵的档案文献,结合相关史料,具体介绍了张学良提出入党要求的经过和中共中央以及共产国际所作出的不同反应,张学良是中共党员吗?为你解开张学良的入党之谜。读过此书后,读者会得出自己的答案!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发行部

(注: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10%付邮费)



# 谷牧与叶帅

## ——读《谷牧回忆录》

○ 袁小伦

终于读到《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这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因为虽然知道谷牧很早就在写回忆录,但又听说他的回忆录是不准备出版的。2000年11月15日,张根生到深圳迎宾馆桂园看望谷牧,当谈到老同志应写回忆录,把经历的重大事情写下来,用以教育后人时,谷牧说:我已在写,还没有写完,剩一点尾巴。接着又补充说:写好后不准备发表,“束之高阁,传至后代”,我怕发表后踩了谁的尾巴。张根生的这段回忆材料发表于《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题目叫《听谷牧谈亲历的几件大事》。读完《谷牧回忆录》,笔者不免有一些“失望”,因为书中似乎并没有什么“踩了谁的尾巴”的东西,例如在某次中央会议上谷牧和胡乔木关于改革开放的交锋的细节等等,估计公开发行的东西和谷牧的原稿还是有距离,然而也应当承认在众多老一辈革命家回忆录中这是较好的一本。书中解开笔者原先的一些疑问,也读到谷牧与叶帅往来的一些史料。

### 一、诗文交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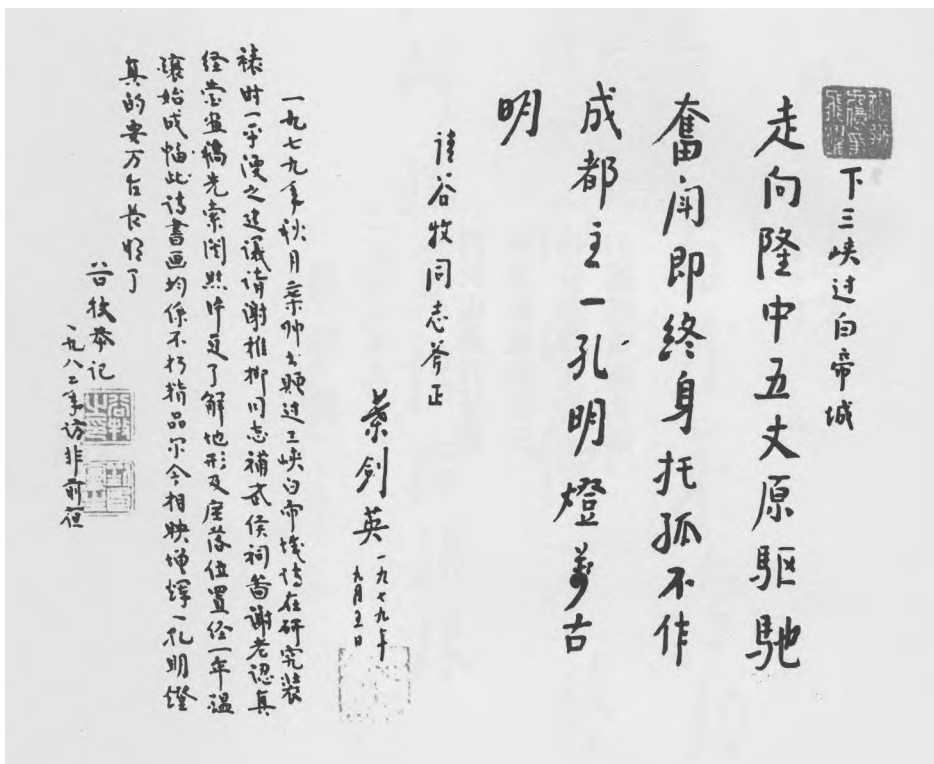
众所周知,谷牧是中共在经济方面的杰出领导人。然而,少有人提及的是,谷牧还是一个爱好文学、喜欢诗文的雅人。在他参加革命的早期,曾于1934年到北平参加左翼作家联盟,成为北方左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谷牧是他(原名刘家语)在左联时期发表文章的一个笔名。

读《谷牧回忆录》时,笔者注意相关史料,书中不仅披露了作者个别诗作,还有一则谷牧与叶帅的诗文雅趣。该书第222页写道:“记得这年(指1976年——引者注)10月27日我参加中央召开的大区及省市第一书记会议,书记们提了不少紧

急的问题。散会时向外走着,叶帅情不自禁地吟起了诗词:‘串连炮打何时了,官罢知多少。赫赫沙场旧威风,顶住青年小将几回冲……’忽然发现大家注意看他,叶帅不念了。凡听到了的人(恰好均是老同志)都相顾而笑。后来我了解到这是叶帅按《虞美人》词牌韵律填的一首词,词的下半部分是:‘严关过尽艰难在,思想幡然改。全心全意一为公,共产宏图大道正朝东。’陈老总曾为此词手书‘绝妙好词——陈毅拜读’。美哉,《虞美人》!”笔者注意到书中引用了大量的日记材料,有的直接用原文摘录,有的以转述的形式。据谷牧的子女说,谷牧每天有记日记的习惯,直到2006年入住三〇五医院止。笔者估计,“10月27日”这段回忆是根据日记记载的,是可靠和准确的。而这段记载对进一步解读叶帅的《虞美人》是很有帮助的。

谷牧不仅赞赏叶帅的诗词,而且收藏有叶帅书赠的诗词墨迹。

1979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叶帅在黄海之滨,视察检阅海军部队。在烟台等地,他诗情洋溢,作诗填词,佳作不断。在此期间他也抄录一些旧作或新作赠送给多位战友、同志和工作人员,例如8月25日书赠旧作《读方志敏同志狱中手书有感》“请粟裕同志斧正”,8月30日书赠新作《烟台行》给“燕子留念”,等等。9月4日,叶帅在烟台海边乘坐北海舰队六二四猎潜艇出海,9月5日休息,“应六二四艇同志之瞩”作《游海》诗,同一天,叶帅书赠《下三峡过白帝城》(“走向隆中五丈原,驱驰奋斗即终身。托孤不作成都主,一孔明灯万古明。”)“请谷牧同志斧正”,而时任副总理的谷牧正率领代表团在日本访问。《下三峡过白帝城》作于何时呢?可能是在4月上旬,叶剑英视察了武汉、重庆等地,此诗可能就写于当时叶帅



《叶剑英诗词手迹暨叶选平、叶选宁恭录叶帅诗词》(广东旅游出版社2007年版)所刊叶帅和谷牧手迹

了东北军学兵队的驻地——东城门楼，并亲历“西安事变”。12月12日，捉住蒋介石的就是谷牧在学兵队的同学、学兵队一连九班班长陈志孝。兵运工作是改造东北军工作的重要方式。叶帅和谷牧同时在西安，见面的机会应该是有的，不过谷牧的回忆中没有提及。

文革中1967年的“二月逆流”事件，谷牧与叶帅的名字则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当时康生、江青、张春桥、陈伯达等人把一批老一辈革命家对文革的批评诬陷为“二月逆流”，说“二月

逆流”的主角是“三老四帅两帮凶”。“三老”指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四帅”指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两帮凶”指余秋里和谷牧。《谷牧回忆录》第230页，选载了当年2月14日的日记：“下午出席总理主持的碰头会。今天的会议气氛好紧张。总理没说几句话，叶帅即站起来很严肃地讲：‘我请各位帮忙！我现在看得明白，各省市党垮了，政府垮了，现在要闹到我们军队头上来了。……军队乱了，这后果很严重啊！’徐帅猛然把桌子一拍，声音很响，很生气地高声说道：‘我们不成，把我们撤了散了，让崩大富来指挥嘛！’叶帅离席怒气冲冲又很风趣地说：‘我们这些人不读书、不看报，搞不清什么是巴黎公社精神，是否请伯达同志给我们讲讲？’那边的人无人吭气，总理圆了几句场，正好主席来电话，找总理他们去。一幕紧张的戏，猛然落幕了。时五点有半。”这是笔者至今看到最为具体的关于所谓“二月逆流”的原生态史料，而且与《叶剑英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4月版)的相关记载有出入，很值得进一步探讨。

## 二、共抗“四人帮”

谷牧和叶帅什么时候开始相识的呢？《谷牧回忆录》中没有交代。1936年8月，叶剑英作为中共中央常驻代表赴西安，负责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和整个西北地区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其间，还帮助张学良整顿改造东北军部队。同月，谷牧受党的委派，到东北军做兵运工作，住进

1976年在叶帅“生病休息”期间，谷牧曾陪王震前往看望。《谷牧回忆录》第270页选载了作

者1976年5月16日的日记：“今天是‘五·一六’文件发表十周年，两报一刊发表了社论《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上午机关开了纪念会，我出席了一半。下午陪王老去看叶帅。”在那段“难撑的时日”，“四人帮”频频向主持工交生产的国务院几位领导人发难，谷牧成为他们攻击的靶子。叶帅交代谷牧，要坚守主持国务院经济工作的岗位。请看《谷牧回忆录》第271页的一段记载：“当时已被排斥‘靠边站’的李先念同志一再叮嘱我：‘无论如何你得支撑住，绝不能让他们把国务院都拿过去。’叶帅对我也有这样的交待，甚至说：抗战时期有些村政府是我们特意安排的‘两面’政权，现在到了最紧要的关头时你也要这样……我决心咬紧牙关，坚守阵地。”叶帅的秘书张廷栋将军回忆，5月16日这天，叶帅为谷牧背录了杜甫五言排律《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中的两句“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并写有“请谷牧同志精研”字样。

在毛泽东去世前后，“四人帮”加紧了全面篡夺最高权力的活动。10月6日，华国锋、叶帅、汪东兴以非常手段，处置了“四人帮”主要成员。由于上海长期为“四人帮”把持，帮派势力盘根错节，为了稳定上海局势，顺利实现新老和平交替，叶帅要求谷牧快速掌握上海的相关信息，为中央提供决策的依据。《谷牧回忆录》第282~283页记载：“在‘四人帮’被抓起来的同时，我接受了一项机密的重要任务。叶帅等要我火速掌握上海的动向。由于上海长期为‘四人帮’把持，帮派势力盘根错节，我立即与林乎加、袁宝华等研究，从各个部抽人组织了一个抓革命促生产建设的调研和督促组奔赴上海，其中少数几位同志按我的交代采取个别串连的方式，通过在上海饱受‘四人帮’打击的老同志，了解深层情况。”很快“调研和督促组”通过密信或部队保密电话陆续将上海的动态传回北京。谷牧又组织有关人员将其编成《上海来信》报送华国锋、叶帅等人。10月中旬，经叶剑英提议，华国锋同意，以苏振华为首的中央工作组进驻上海，接管上海。

### 三、同主改革开放

到了1978年初，随着清查“四人帮”势力和

各级领导班子调整的大体告一段落，经济工作逐步摆上了更重要的日程。在改革开放时期，谷牧作为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分管对外开放工作，得到了叶帅的强有力的支持。

同年五六月，为借鉴国外经验，加快现代化建设，经华国锋提议、中央讨论同意，派遣谷牧率领代表团到西欧考察访问。这是中共建政以来向西方国家派出的首个政府经济代表团，揭开了把对外开放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的序幕。谷牧等人根据所见所闻归纳此行三点突出印象，即二战后西欧各国经济有大的新发展，西欧对同中国发展经济关系很有兴趣，我国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中可以采用国际通行做法，并据此写成《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

6月下旬的一天，华国锋主持了一次长达七八个小时的汇报会，听取谷牧的汇报。《谷牧回忆录》第306~307页对此有这样的记载：“到会的领导同志都作了讲话或插话”，“当年所谓‘二月逆流’的几个‘干将’谈得非常直率。叶帅从战略上强调：我们同西欧几十年没有打过仗，他们希望中国成为世界稳定的力量，我们需要他们的先进技术，他们资金过剩，技术需要找市场，引进技术的重点应放在西欧。聂帅态度坚决地说：过去我们对西方的宣传有片面和虚伪之处，这反过来又束缚了我们自己。谷牧这次调查比较全面，应当拍板了，不要光议论了！”“在这次汇报会上，听着叶帅、聂帅、先念等同志发言，我眼前又浮现1967年所谓‘二月逆流’时三老四帅艰苦抗争，痛斥江青等人的情景。事隔11年多，我们终于可以摆脱极‘左’思想的束缚，痛痛快快地放手工作了。而在这关键的时刻，又正是这些我非常敬重的前辈给了我力量。”

从1979年初到1981年下半年，我国在对外开放方面，采取了三项重大举措。一是打破了不用西方国家政府贷款的思想禁区，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款，吸收境外客商的投资在我国大陆上举办企业。二是改变进口贸易由外贸部一家独办、垄断经营的做法，对若干部门和地区授予部分商品的进出口经营权。三是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结合我国实际，借鉴外国设置“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的做法，试办经济特区。这三项重大举措，在思想上



具有突破性,同时又都是在局部地区、一些部门试行的,在时间的基础上带有探索性质。为使事权统一,保障工作健康发展,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文件,明确由谷牧全面负责组织实施。

1979年五六月谷牧带领国务院相关部委负责人组成工作组南下广东、福建做调查。其中在广东18天,同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吴南生、王全国、曾定石、梁湘等人座谈讨论,先后看了广州、深圳、珠海和佛山、中山、新会、汕头等地,还约见了时任港澳工委书记的王匡交换意见。《谷牧回忆录》第322页记载:“当时叶帅在广东,我专门去作了汇报,听取他的指示。”叶帅和谷牧谈了些什么呢?书中没有透露。而当时参与安排和接待叶帅的广东省委副秘书长关相生回忆了这样一个细节:6月1日叶帅在广州接见广东省三级干部会议的代表,当王全国谈到广东交通运输很紧张,铁路修得少,至今京广铁路南段复线还未修通时,叶帅说:“看起来要发展经济,交通运输很重要。”紧接着问:“谷牧同志现在到了哪里?”刘田夫说谷牧现在在福建,还要去杭州时,叶帅说:“谷牧同志这次来广东,我同他讲了‘怪话’,你们顾北不顾南。”

要改革开放,一定会触动方方面面,谷牧感到了来自多方的压力,“租界”论、“李鸿章”、“洋务运动”等说法接踵而至。当谷牧在工作遇到阻力时,叶帅一如既往地支持他。

1981年底在广东、福建、浙江的沿海城市,出现了走私贩私泛滥的严重情况。由于这次走私贩私主要发生在开放地区,有一些人就对开放划问号,尤其是对特区摇头了。特区要不要办下去,谷牧面临空前的压力。特区建设遭遇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严峻考验,有些内地老干部到深圳参观后议论,深圳除了五星红旗还在飘扬之外,遍地都是资本主义,千百万人抛头颅、洒热血打下来的江山已经被“断送”了。紧接着一份中央发出的打击走私的《紧急通知》,再次把特区架上了油锅。很快在国人眼中,特区成了“走私的主要通道”和“香港市场的水货之源”。

1982年中央将两省的负责人召到北京,专门讨论了这一问题,会上一位中央负责人要将《旧中国租界的由来》一文下发给与会者。在这篇文章中,特区被与清末上海的租界相提并论。对此

谷牧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这样做只会带来思想的混乱,然而文件还是发下去了。

1983年4月,谷牧把广东省的三个经济特区仔细考察了一遍,从珠海返回后,当天中午广东省委有人提到“叶帅正在温泉休息”,谷牧一听,立即带领一群人赶到叶剑英住处。对此《谷牧回忆录》第344页有一段很有节制的表述:“我还看望了正在广东休息的叶帅。1982年初以来,他也听到了不少对特区和广东、福建两省的非议,很担心我的处境。我汇报了反走私的情况以及这两年来调研的心得,表示能顶住压力,一定会把改革开放事业进行下去。他高兴地说:那就好!”

而据谷牧的长子刘念远回忆,1983年4月谷牧在任仲夷、梁灵光、刘田夫、吴南生等人陪同下,把广东三个经济特区的角角落落仔细考察了一遍。从珠海返回中山后的当天中午,在国际饭店吃午饭时任仲夷提到“叶帅正在温泉休息”。谷牧要求马上联系,下午3时当一行人赶到叶剑英住处时,他已经坐在轮椅上在院中等候。进入客厅后,叶剑英请一同前来的其他几位同志回避一下,“我要单独和谷牧说几句”。隔着桌子,叶剑英紧紧握着谷牧的手不放。“听说你最近的日子不好过?”叶剑英直接问道。谷牧没接话,只是点了点头。叶剑英接着说:“听说你遭围剿了。我们有些同志到底是怎么想的,为何不允许你在经济开发区搞试点?”不等谷牧回话,叶剑英又用广东话问了一句:“谷牧,你有料搞定吗?”谷牧当时没听懂:“您说什么?”“我问你顶得住吗?”谷牧激动地站起来说:“只要中央不调整分工,仍然让我抓改革开放,管特区,我一定把特区干出个名堂!”叶剑英说:“那就好,那就好!记住,如果再遭围攻,你顶不住了,就来电话,我叶剑英立即调飞机飞回北京,旗帜鲜明地支持你搞改革开放!”

谷牧去世后,多家媒体披露了叶剑英的一句话:“谷牧你懂经济,搞特区我放心。小平说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你就是侦察兵,要杀出一条血路。”■

(作者为广州体育学院社会科学部教授、广东叶剑英研究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 洪振快)

# 我为在五七干校打人深感愧疚

○ 施 亮

1969年冬,我才上初中一年级,随父母去了湖北咸宁向阳湖文化部五七干校。当时,那里的子弟斗殴之风正盛。这是时代风气使然,文化大革命中社会秩序混乱,暴力成为时尚,小流氓也成了明星,好勇斗狠也成“战斗精神”的标志。斗殴成为那个时代的时髦。

我自小生性怯弱,没有动手打过架。到了文化部五七干校后,混迹于这群同学间,也不得不靠拳头来证明自己的生存能力了。与同学斗殴,与外单位的孩子们斗殴,一次次斗殴接连不断,成了我们枯燥生活中富有刺激性的“业余娱乐”了。有一次,我与一个同学打架,抄起铁锹朝他劈去,幸亏他躲闪得快,否则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好友宓乃斌责备我:“你简直是疯了!把人劈死怎么办?你知道吗?杀人是要偿命的!”我却嫌他啰嗦,回应道:“不是没劈死吗?废那么多话干吗?”

疯狂是能够上瘾的。当人的那些粗野劣性泛滥开来时,则再难以抑制向残忍暴虐发展。以后,商务印书馆的家属子弟任谅也过来上课了。我与他已经相识,彼此相处还可以。可是,那时商务印书馆的家属子弟极少,十四连的一群男孩子仗着人多势众欺侮他。上课时,常有男生在背后突然打他一拳,他回头张望,大家却装得若无其事模样。任谅孤零零一人,也无其他同伴相助,只好忍气吞声。而我们这群男生则以欺侮他为乐趣,动辄拳打脚踢,找个小借口就将他围殴一番。

一天下午,我们这群中学生从湖里下工回来。我不知从哪儿捡到一根铁链子,从后面用铁链子抽打他。抽打一下,他的后脊背疼痛地一痉挛,同学们一阵哈哈大笑。我也更得意洋洋了。又狠抽一下。他仍然没有回头,仅用手捂住肩膀往前走。

“哈,你可真是禁打又禁踹!你是个木头人

吗?”我说着,又抡起铁链子抽他一下。

他猛然回首,用一双发亮的眼睛盯住了我,眼眶里盈满了泪水。

我的手颤抖了,再也举不起铁链子。我虚弱地喊一声:“你,你干吗?”我的心中却有着难以言说的颤栗。

以后没两天,任谅再也不来这个课堂了。他的父母想办法又把他送回北京上学了。

几十年过去,许多人与事已经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忘却了,唯有任谅那双饱含泪水的眼睛,我却永远难以忘怀。想起此事,我的内心充满了愧疚之感,想悔恨地说一声:任谅啊,请你原谅我吧!

一位西方学者认为,人类间的许多罪恶,譬如恐怖主义、凶狠的暴力行为、兽性的残杀等等,其实与人的思维是无关的,只不过是瞬间的手足活动。因为,邪恶就隐藏在人性之中,互相残杀是人类无可躲避的宿命。我并不同意这个观点,这岂不是说人的本性中,兽性还是终将会战胜人性?即使文明发展也无济于事?但是,回想起自己少年时代那一段日子的嗜好暴力、野蛮残忍的种种行为,我悚然心惊,又给自己设立一个假设,如果我也是“红八月”中的红卫兵,手里也有一根军用皮带,会不会就把它抽向所谓的“牛鬼蛇神”老人们头上呢?

我必须痛苦地承认,会的。

到了春天,原住咸宁县城共产主义学校的大批小学毕业生回来了,向阳中学也扩大了,有了近百名学生。我们被交给了文联管理,新转学的那批学生们无处上课,在大队粮仓隔出一个角落当教室。而初二和初三年级的教室,也只是20来平方米的两个房间,自然比不上大城市的教室,甚至比乌龙泉公社的农村学校教室还要紧巴一些。

我被学校任命为排长,成了学校的小干部。还主持出版红卫兵壁报、黑板报,经常主持各种批判会与讲用会。我变成了一个“好孩子”,脑袋

里的政治意识又强烈起来。其实,由于时代氛围的浸染,自己思想深处的极“左”影响一直存在。我在乌龙泉公社中学也当过学生干部,还成了公社学习毛著的积极分子。我经过一番讲用后,主动转变思想,不再参与打架斗殴,可又陷进流行意识形态的偏激情绪中。

那一年“双抢”时,农活非常忙碌,向阳中学的一批学生们也成了各连队觊觎的好劳动力。但是,向阳中学既然归文联管理,虽然也轮流去各连劳动,还是帮助文联干活儿更多一些。这自然引起其他连队的不满。父母的情绪多少也影响到了孩子们。一天,我们又去帮助文联的大人们插秧,午餐仅每人两个馒头,一些熬白菜。与其他连队招待学生们的丰盛午餐差别太大了。同学们趁机发泄了不满情绪,将馒头咬几口乱扔,故意把没吃完的剩菜倒掉。收工时候,校长向全校同学讲话,很生气地批评了这种现象。同学们不满情绪却更高,下面一片乱糟糟的议论。

我的同学王岗,他的父亲是著名鲁迅研究专家王士菁先生。他在壁报上写了极短的一篇小文,大意是讲那天同学糟蹋饭菜是一种情绪的反映,校长为何避而不谈这种情绪呢?我们这批学生归文联管理,但不是供文联驱使的劳力。这就把窗户纸捅破了。学校管理方面挺恼火,要各班讨论此事,实际上是发动批判王岗。

我积极响应学校号召,与另外两个同学署名写了一张大字报。此文由我执笔,对王岗的那篇小文上纲上线,什么“浪费粮食就是受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啦,“为这种可耻行为辩护就是更加可耻”啦,还指责那篇小文含沙射影攻击学校领导,是何居心?

这张大字报贴出后,学校领导当然是很高兴,几次在大会上表扬我们。多数同学却不以为然,议论纷纷。但是,这场不大的风波很快就平息了。大队领导决定,全体学生都放农忙假,回到家长所属的连队去干活。大人们的不满情绪也就缓解了。

但是,我与王岗却产生了芥蒂。我的思想里有某种偏激成分,认为同学们浪费粮食本来就是不对的。我自己是坚持原则,不怕别人议论。其实,自己内心深处也有功利性目的。我是学生干部,倾向性地站在学校领导一边,带有某种迎合

的意味,却伤害了自己的小伙伴。在某种程度上,我自愿地成了小小的“政治打手”。

父亲施咸荣对此事很不以为然。一天吃晚饭时,他脸色阴郁地对我说:“你知道吗?你写的这张大字报影响很不好,咱们十四连很多人跟我提起这事,不赞成你的做法呢。”他又叹一口气说:“唉,我跟王士菁是一个单位的同事,让我怎么面对他呀?”

我一梗脖子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还摆出一副很“原则”的脸孔说:“王岗还是我的同学哩。哼,跟不良现象就得斗争嘛!”

父亲瞪了我一眼,还想说些什么,可又把话咽下去。他阴沉着脸不再搭理我。

这是我一生中的又一件愧疚之事。它也是极具有时代色彩的,可说是又一种“疯狂”吧。那时的人际关系,不是提倡宽容及与人为善,而是以所谓“革命”的名义,动不动就来一场斗争批判,在整个社会形成了一股斗来斗去的政治疯狂病。我也是不自觉地成为这种“政治疯狂病”的感染者,以至于不惜向自己同学发动“批判”。

我以后也曾经有过假设,倘若自己年长10岁或20岁,恰好有一位极有权势的大人物看中了我,命我去写那些具有政治杀伤力的大批判文章,那么,我是否就会很高兴地应命去写呢?我会不会根本不管别人的死活,仅为自己的飞黄腾达,就像姚文元、戚本禹那样用笔去杀人呢?

我也必须痛苦地承认,我也会的。■

(作者为北京作家)

(责任编辑 洪振快)

## 更正

本刊2012年第5期第81页标题“苏联兴亡的六个原因”有误,应为“苏联灭亡的六个原因”,特向作者和读者致歉。

本刊编辑部

## 本刊启事

凡未收到稿酬的作者,请将联系地址、邮编和身份证号码告知我社。

联系人:肖林 电话:010-68525374



# 苏俄喀琅施塔得兵变真相

○ 左凤荣

1921年初,苏俄位于波罗的海的重要军港、从海上防卫彼得格勒的军事要塞喀琅施塔得发生了兵变。对于这一事件,长期存在着不正确的认识:一是认为这是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武装叛乱,目的是恢复地主资产阶级政权;二是其组织者是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和白卫分子,并得到国际帝国主义的支持;三是苏俄的领导者曾意图避免流血,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暴力,攻克要塞。俄罗斯出版的《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俄]B.П.纳乌莫夫、A.A.科萨科夫斯基编,任建华等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以下仅注明页码者均指该书)揭示了事件的真相。档案资料显示,这一事件的出现是民众对布尔什维克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不满的结果,事件并没有政党参与组织和策划,具有自发的性质,政府从一开始就拒绝接受他们的要求,不肯与他们谈判,迫使他们不得不拿起武器。

## 一、喀琅施塔得事件是民众对布尔什维克不满的反映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想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实行的是军事共产主义政策,通过粮食征收制强迫农民交出粮食,城市的征粮队到农村搜粮,农民常常连口粮都不剩;实行一切工业和商业国有化的政策,不允许存在私人贸易,民众普遍不满,导致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这一政策随着国内战争接近尾声反而变本加厉了。

从1920年初开始,农民暴动此起彼伏,著名的有1920年6月开始的坦波夫起义、1920年夏天开始的西伯利亚起义、托木斯克省的科雷万起义、1920年9~10月叶尼塞省的多起起义、1920年10月伊尔库斯克省的农民起义等,有些起义明确提出建立“真正人民的政权”,要求自由选举和

工业的非国有化,喊出的口号是“人民的苏维埃政权万岁!”“打倒共产党人!”(Зубов А.Б.(под ред.)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 1894-1939, Москва: Астрель, АСТ., 2009, С.735.)起义者呼吁镇压起义的红军战士,“停止对农民,特别是起义农民的敌对行为吧!……难道说你们的父辈、兄弟和家人不是和起义农民生活得一样,不是在忍受共产党和苏维埃的压迫吗?请看哪里有言论、出版、结社、集会、信仰的自由和人身的不可侵犯。所有这一切都被苏维埃毁灭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和你们都随处可见的随意逮捕、平白无故的枪决、抢劫和放火。几乎在红军占据的每一个村庄,在你们的眼皮底下都有强奸妇女的事情发生。而你们,应征的士兵们以不可原谅的无动于衷面对野兽般的共产党人所施行的可怕的暴行。人民游击军向你们最后一次以至永远号召:离开红军,带上手中的枪回家吧,建立游击队,挣脱共产党人的桎梏。”(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卷,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49页)

到1921年春,农民暴动已遍及全国。城市中的局势也很严峻,粮食不足,许多工厂关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也出现了严重的局面,不断发生工人示威、骚乱、罢工。许多军人也举行集会,支持工人的主张。2月24日契卡向彼得格勒示威的工人开枪,打死了12人,有上千工人被捕。游行变成了群众性示威,上百的士兵站到了工人一边。彼得格勒工人的情绪自然对水兵和士兵产生了影响,他们曾是十月革命的主要力量,但布尔什维克掌权的实践使他们感到,苏维埃政权实际上已被党的政权所代替,他们的理想并没有实现。2月27日,派去了解彼得格勒情况的代表向喀琅施塔得的水兵通报了彼得格勒的情况。

面对严重局面,2月28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除了提出要尽快解决粮食和工人日用品的问题外,还确定对于反对政府行动的措施



1921年喀琅施塔得兵变中的水兵在1917年曾是革命水兵

如要求各省肃反委员会在最短时间内摧毁反苏维埃党派的机构,为此要求:“将你们管区内知识分子中的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特别是在土地局、粮食部门和分配机关供职的上述人员全部清除出去。”“将在工厂工作的积极挑动罢工、闹事和游行的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与无政府主义者清除出去。对待工人要格外谨慎从事,只有在掌握了有关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具体材料时才能对他们采取镇压的措施。”(第24页)3月1日彼得格勒方面向全俄肃反委员会汇报:“肃反委员会逮捕了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头目,被捕的孟什维克有唐恩和罗日柯夫教授,右派社会革命党的积极分子全部被捕,被捕的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超过100人。总共逮捕了大约300人,其余的200人是积极活动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第43页)

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发生不是某些政治组织事先策划的,而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所积聚的对苏维埃政权不满的情绪在一个集中点上的爆发,它既表现了运动的自发性,又表现了客观形势将矛盾推向尖锐化的必然性。3月1日,一位喀琅施塔得市民写给亲戚的信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我们喀琅施塔得和彼得格勒的新闻就是天天发生暴动,因为市民每人每天只能分到半俄磅面包,根本吃不饱,可又不能用钱买,警察到处撵人,不让随便做买卖;市民杀死了4个警察,现在暴动闹得天昏地暗,不知以后会怎么样。水兵也在闹暴动。人们都希望允许自由贸易,看样子

春天就要爆发一场反对共产党的战斗,因为这里所有的水兵和红军战士都不想要公社,他们都高喊‘打倒公社,让我们自由生活。’”(第47页)

2月28日,“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全体舰员会议通过了由7~8个水兵拟定的决议(后面所引决议的前十三条),随后“塞瓦斯托波尔”战列舰水兵也通过了这一决议,以声援彼得格勒的工人,多数党员对决议投了赞成票。3月1日,全体舰员大会通过了这一决议,在此次会议上增加了后两条,形成内容为15条的决议:

1. 鉴于本届苏维埃不能代表工人和农民的意志,应立刻以不记名投票的方式对苏维埃进行改选,同时选举前要自由地对所有工人和农民进行宣传。
2. 工人、农民、无政府主义者和各左翼社会主义政党应享有言论和出版自由。
3. 应有集会和成立工会及农民联合会的自由。
4. 不晚于1921年3月10日召开彼得格勒市、喀琅施塔得和彼得格勒省无党派工人、红军战士和水兵代表会议。
5. 释放全部社会主义政党在押政治犯以及因参加工人和农民运动被捕的工人、农民、红军战士和水兵。
6. 选出一个负责审理关押在监狱和集中营中的犯人的委员会。
7. 撤销所有的政治部,因为任何一个党都不能利用特权宣传自己的思想并为此获得国家的拨款,代之以各地选举的文化—教育委员会,国家应向这些委员会拨款。
8. 立刻取消所有的巡查队。
9. 除有害车间外,所有劳动者的口粮都要均等。
10. 取消部队中所有的共产主义战斗队和工厂中的共产党员组织的各类值勤,假如需要值勤或成立战斗队,可以在部队连以上单位组织,工厂则由工人酌情处理。
11. 给农民按照其愿望耕作自己土地的全权,他们也可以靠自力(即不用雇工)喂养和使唤

牲畜。

12. 请各部队及军校学员同志支持我们的决议。

13. 要求各项决议在报刊上公布。

14. 成立巡查局进行监督。

15. 允许依靠自己劳动从事自由的手工生产。(第39~40页)

决议要求实行苏维埃民主,他们拥护苏维埃制度,主张由工农掌权,反对一党独揽大权,要求给予农民和手工业者以生产和支配自己劳动成果的自由。

3月1日,在喀琅施塔得铁锚广场举行群众集会,1.6万多人参加,喀琅施塔得苏维埃主席瓦西里耶夫、波罗的海舰队政委库兹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出席,他们试图说服与会者放弃政治要求,没有成功。如果当时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也许事态不会进一步发展。与会者以压倒多数支持“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的水兵通过的决议。同一天,两个战舰选出了由水兵组成的舰艇工作委员会,政委的权力被取消。

3月2日,所有水兵、红军战士和工人组织的代表在教育之家召开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改选喀琅施塔得苏维埃,对喀琅施塔得苏维埃主席瓦西里耶夫、波罗的海舰队政委库兹明表示不信任,大会认为应制定新的选举原则,以便改选苏维埃,大会决定成立临时革命委员会,以维持喀琅施塔得的秩序。选举产生了五人委员会,该委员会设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上。

3月2日,临时革命委员会向要塞居民和喀琅施塔得市民发布呼吁书说明了事件的意义,“国家正处于危急时刻。我们陷入饥寒交迫、经济破坏的绝境已达3年之久。管理国家的共产党脱离了群众,已没有能力使国家摆脱全面经济破坏状态。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近年来发生的骚乱相当清楚地表明,共产党已失信于工人群众,它根本不重视发生的骚乱。它也不重视工人提出的要求。它认为这是反革命的阴谋。共产党人大错特错了。”“发生的骚乱和提出的要求表达了全体人民和全体劳动者的心声。……通过的决定中包括立即改选苏维埃的决定。选举应在更加公正的基础上进行,使苏维埃真正成为代表

劳动人民的代表机构,使苏维埃成为富有活力的办事机构。”“同志们、公民们!不要停止工作。工人们要留在车床旁,水兵和红军战士们要留在部队和炮台。全体苏维埃工作人员和各机构都要继续工作。临时革命委员会呼吁所有工人组织、所有工厂、所有工会、所有陆军和海军部队及公民个人全力支持和帮助我们。临时革命委员会的任务是齐心协力、同心同德,在市区和要塞创造正常而公正的新苏维埃选举的条件。”(第44~45页)表示“不希望流一滴血”。他们“在市区、要塞和各炮台采取了特别措施维持革命秩序”。他们要求大家不要停止工作,“临时革命委员会的任务是齐心协力、同心同德,在市区和要塞创造正常而公正的新苏维埃选举的条件。同志们,为了全体劳动人民的幸福,要保持秩序、保持冷静、保持克制,以新的诚实的方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第45页)到3月2日傍晚,大多数炮台和要塞的所有红军部队均已承认临时革命委员会。3月3日临时革命委员会希望政府倾听他们的声音,派出代表团前往彼得格勒申明要塞水兵、士兵和工人的要求,但代表团被逮捕,被作为人质。

临时革命委员会和平接管了喀琅施塔得市和要塞的政权,他们并没有镇压共产党员,而是欢迎他们与临时革命委员会合作,但逮捕了库兹明、瓦西里耶夫等干部。当时在要塞的布尔什维克因得不到拥护,未能有效组织起来,基层组织迅速瓦解,许多党员退党。1921年3月6日《临时革命委员会通报》编辑收到的一份请求刊登的声明:“我叫瓦西里·孔德拉希欣,是在要塞电报局执行通讯勤务的一名红军战士,我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一件事,即在1920年12月16日那天糊里糊涂地递交了一份申请,成了一名俄共预备党员。这之后我回家休了一个短假,看到种种不公道的现象。休假归来后因时间仓促没来得及提出退出俄共预备党员之列的申请,为此我请求在报刊上我的这份声明,请不要再把我为俄共预备党员,因为我要一直全心全意同多数工人和农民站在一起捍卫工农政权。”(第175页)司令部电工梅利曼3月12日的声明:“我目睹了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共产党制造的反对工人和农民的流血事件,认为留在这个党的队伍里是一种耻辱,因此声明退出共产党并请同志们吸收我加入我同



样会为之效力的我们自己的大家庭。”(第178页)

客观地看,喀琅施塔得事件是由布尔什维克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引发的,是人们对这一政策的自发反抗。

## 二、以武力镇压喀琅施塔得兵变

面对突发的兵变事件,苏俄领导层并没有认真调查和分析事件的起因,喀琅施塔得事件的领导者基本上都是普通士兵,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彼得里琴科是文书、雅科文科是话务员、奥索索夫是轮机兵、图金是机电厂工匠、奥列申是第三劳动学校校长,他们认为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十月革命时曾许诺:“如果你们愿意,可以召回苏维埃代表,可以改选苏维埃”,他们认为现在的苏维埃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重新选举自己的领导机构,这并没有什么错。(第155页)并没有前沙皇将军和神甫参与领导。但是,该事件一开始就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还说这是白卫分子与国外敌对分子进行勾结,拒绝与起事者谈判,准备进行镇压。

3月3日,劳动和国防委员会做出决定(由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列宁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签署):

1. 宣布前将军科兹洛夫斯基及其同伙不受法律保护。

2. 彼得格勒市和彼得格勒省进入戒严状态。

3. 将彼得格勒筑垒地域的全部政权移交给彼得格勒市防卫委员会。(第52页)

当时科兹洛夫斯基是喀琅施塔得的炮兵司令,据参加喀琅施塔得起义的一位电工说,起义对起义者完全是出乎意料的,“谁也没有料到,他们那些朴素的,几乎得到所有喀琅施塔得共产党员赞成的要求不但遭到粗暴而坚决的拒绝,而且还

招致托洛茨基发布的毫不留情地镇压喀琅施塔得的严厉命令。后来,当起义成为事实时,大伙都义无反顾地投身其中……布尔什维克把科兹洛夫斯基将军说成是起义的首领,实际上只是水兵们强迫他继续履行了他在布尔什维克时期就已经履行的炮兵司令的职务,并没有给予他任何权力。”(第326~327页)随后对科兹洛夫斯基的亲属进行了镇压,一共逮捕了27人,其中包括他的妻子和4个儿子。他们唯一的罪过就是跟科兹洛夫有亲戚关系,从对这些人的审讯中并没有得到科兹洛夫斯基组织叛乱的证据。

3月4日,劳动国防委员会批准政府通告,宣布喀琅施塔得事件是法国反间谍机关和前沙皇将军科兹洛夫斯基策划的暴动,喀琅施塔得通过的决议是“社会革命党黑帮”的决议。彼得格勒防卫委员会发表《告受骗的喀琅施塔得人书》,实质上是最后通牒,喀琅施塔得的水兵要么放下武器接受惩处,要么自卫。在喀琅施塔得举行了代表会议对此进行讨论,202人出席,决定进行自卫,临时革命委员会成员也从5人增至15人,新增加的10名成员也都是普通士兵和工作人员,有医生、电工兵、工人、领航员,有官职的是拜科夫,他是要塞建筑管理局运输车队队长。3月5日,临时革命委员会和要塞司令部就共同组织防御达成协议,军事专家建议在遭



1921年3月红军进攻喀琅施塔得

到进攻之前主动进攻占领有利地形,被临时委员会拒绝。

3月5日,按照托洛茨基的命令,重新组建第7集团军,由图哈切夫斯基指挥,并命令图哈切夫斯基在最短的时间内平息叛乱。共和国军事委员会和红军指挥部向喀琅施塔得发出呼吁,要求他们立即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同时,命令做好武装平叛、消灭一切叛乱分子的准备。(第66页)

3月8日,即俄共(布)十大召开的同一天,开始进攻要塞,“起初喀琅施塔得没有反应,晚些时候向谢斯特罗列茨克发了两枚炮弹,城中无损毁和死伤。紧接着喀琅施塔得开始从‘红色高地’和谢斯特罗列茨克开炮。‘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托特列边要塞和康斯坦京要塞向‘红色高地’和‘利西诺斯’一带猛烈开火以示回应。”(第62页)镇压行动进行得并不顺利,第7集团军561团行动迟缓,其中一个营的士兵向敌人投降。讨伐部队遭受很大损失,许多红军战士不服从指挥,情绪低落,因担心波罗的海舰队发生兵变,3月12日他们被调往黑海。

俄共(布)武力镇压喀琅施塔得水兵的行动,受到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的反对,3月7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格勒委员会(孟什维克)发出呼吁书,要求制止杀人行径,“我们不了解事件的详情。但我们知道喀琅施塔得曾要求改选苏维埃,释放因工人运动而被捕的社会主义者、非党工人、红军战士和水兵,还曾要求于3月10日召开非党工人、红军战士和水兵代表会议,共商摆脱苏维埃俄国目前困境的出路。工人政权本应查明喀琅施塔得的真正原因。工人政权本应在全体工人阶级面前公开地与喀琅施塔得工人及水兵达成协议。但他们却宣布戒严,提出命令投降的最后通牒并开始把枪口对准工人和水



指挥镇压兵变的图哈切夫斯基

兵……我们应当干预并制止流血事件再次发生。我们要求当局在彼得格勒各厂代表参与的情況下立即与他们举行谈判。要立即选出参加这些谈判的代表。”(第315页)3月8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答诽谤者”传单中说:“布尔什维克政权依靠的不是工农苏维埃,而是赤裸裸的暴力。现在所有的工人都会明白,将政权转入真正自由选举的苏维埃手中是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为取消戒严,全体劳动者享有言论、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自由改选苏维埃及其他工人组织;释放所有因政治信仰不同而被捕的社会党人和非党工人农民。真正的劳动者政权万岁!”(第317页)俄共(布)从中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应当汲取这个经验,我们应当接受喀琅施塔得事件血的教训,我们应当给非党人士做出结论,他们口头上高喊保卫苏维埃政权,暗地里却在破坏苏维埃政权。同志们,你们应当清楚,你们面对的是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地地道道的白

卫分子,任何妄图通过反共产主义的途径暗中破坏苏维埃政权的阴谋都不可能得逞,因为苏维埃政权是建立在无产阶级基础上的。”(第305页)从中我们看到,布尔什维克和其他政党,包括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对什么是苏维埃政权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俄共(布)内也有人反对进行镇压。3月10日,女教师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沙捷利因对水兵进行军事镇压而退党,她声明:“我被共产主义学说及其‘一切为了人民’这句口号的圣洁和美好而深深感染,于1920年2月成为俄共预备党员,然而就在有人对和平居民、对我深爱着的喀琅施塔得的近六七千个孩子打响第一枪的那一刻,我想到我可能被当作那些滥杀无辜者的同谋,因此我从打响第一枪的时候起便不再认为自己是俄共预备党员了。”机



械工希舍洛娃3月10日的退党声明：“我请求不要把我为俄共党员，因为我打心里觉得共产党员就是一帮暴徒。他们就像凶残的野兽那样不肯放过自己的猎物，恨不得吸干人民的鲜血。我拥护临时革命委员会，它正带领劳动人民走光明正确的路。”（第177页）

3月13日，为了迅速镇压喀琅施塔得兵变分子，从西方面军调来了第27步兵师，并对不执行命令或临阵脱逃者进行严惩。3月16日凌晨开始对要塞强攻，起义者看到胜利无望，8000人撤至芬兰，其中包括喀琅施塔得临时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要塞防御司令部的成员。3月18日要塞被攻下。

政府在镇压行动中付出了很大牺牲。

### 三、喀琅施塔得事件的余波

喀琅施塔得事件被平息了，全俄肃反委员会对此事进行了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没有发现叛乱前有任何反革命组织在要塞指控人员进行活动或是协约国间谍的踪迹。整个运动过程也否定了这种可能性。”“暴动是自发产生的，而且几乎要塞的所有居民和完备部队都被卷了进去。总的说喀琅施塔得暴动标志着现阶段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运动的终结，这一运动表现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制度，表现为农民和工人阶级的落后阶层对苏维埃政权的粮食政策感到不满并公开要求摆脱苏维埃对小私有者自由流转的束缚。”（第283、286页）喀琅施塔得事件成为俄共（布）从军事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的因素之一，同时，俄共（布）也利用这一事件镇压反对者。

曾经拥护布尔什维克的工人、农民、士兵进行反布尔什维克的起义，迫使列宁反思和改变政策，在进攻喀琅施塔得的同一天，俄共（布）召开十大，正是这次大会确定实行新经济政策，向民众的经济要求做出让步。但是，对于他们的政治要求，却没有做出让步，对起义者进行清算。

武装起义被镇压后，成立了由审判长、审判员和书记员组成的三人小组，对事件的参加者、逃兵和不执行命令者进行审判，许多人被判处决，不得上诉，立即执行。到1921年初夏，仅由

彼得格勒省肃反委员会主席团、芬兰国境警卫特别处处长务委员会、芬兰国境特别处喀琅施塔得分部非常三人小组和彼得格勒军区革命军事法庭判处极刑的就有2103人，判处各种有期徒刑的为6459人。1464人虽获得自由，但对他们的指控并未取消。从1922年春季开始，大批喀琅施塔得居民被强制迁出。总共迁出2514人，其中1963人为“喀琅施塔得叛乱分子”及其家属，388人为要塞闲散人员。（第8、9页）有功者授奖，约100人获得红旗勋章。

布尔什维克还利用喀琅施塔得事件对其他政党进行镇压。

与此同时，俄共（布）的集中统一进一步加强，并开创了大规模清党先例。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进行清党，对象是“非共产主义分子”、原孟什维克等，结果有24.1%的党员被开除出党。

喀琅施塔得事件，根源在于布尔什维克的政策，过激过“左”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民不聊生，进而也导致了严重的政治危机。但是，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领导层并没有认识到自己政策的错误，在发生彼得格勒工人罢工、喀琅施塔得兵变后，才下决心改变政策。本来，布尔什维克改变政策，与起义者有了共同商讨的基础，事情本来可以和平解决，但苏俄政府却采取了暴力手段，其政治意图明显，利用喀琅施塔得事件，进一步加强了布尔什维克对政权的垄断，确定了民众只能按布尔什维克制定的政策行事的原则。无论是十月革命的胜利，还是转向新经济政策，都有其他政党之功。在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俄共（布）只接受了其他政党和民众提出的经济要求，不接受实现苏维埃民主的要求，政治体制并没有随着经济政策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正是政治集权为斯大林抛弃新经济政策，重拾军事共产主义创造了条件，从而也埋下了苏联剧变的祸根。

1994年1月10日，俄罗斯联邦总统签署总统令，宣布对喀琅施塔得水兵、士兵和工人进行镇压是非法的，违反了人民的基本公民权，宣布建立喀琅施塔得兵变牺牲者纪念碑。■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

（责任编辑 洪振快）



## 读者来信摘登

近读贵刊今年第3期《蒋介石批钱给陈独秀》一文，其中披露了1942年初那次经朱家骅之手的赠予，特别是三封来往信函。惟陈独秀给朱的复信中有一句“奉读手教”，朱的这封去信似为作者裴高才先生所未见，因此也未在文中披露。其实现代史学者左双文曾根据台北所藏朱家骅档案，披露过晚年陈独秀对国民政府方面赠款的接受情况及其态度。左氏查到了六封相关原信，其中就包括裴文提及的这三封，另有裴文未见的那封朱氏“手教”。现转引于后：

仲甫先生大鉴：

顷来不审道履何似，屢思趋候，以取事牵人，迄今未果。兹托张国焘兄转奉国币八千元，聊将微意，至祈俯察晒存，幸甚幸甚，嵩颂时绥不宣。

弟 朱家骅

(1942年)1月27日

据左氏称，此信稿右上角还签有一个“密”字，右边注有“已由甘秘书呈签后送交张君”。

北京读者 刘宪阁

贵刊今年第5期刊发了我写的《反思八十年“严打”》一文，其中第七部分“对速判快杀之‘9·2决定’的检讨”有一段话：“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983年9月2日同一天通过了三个重要《决定》，总的精神是增加死罪、多判死刑，尤其是《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要求速判快杀。这一《决定》的标题很长，读起来又觉拗口，一般简称‘9·2决定’。虽然只有两条，从字面来看，不过是加速了审判的进度和缩短了上诉期限，其实是当今世界上最严厉的法律。”

这一段中，可以把“9·2决定”的两条原文加进去，即“一、对杀人、强奸、抢劫、爆炸和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主要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民愤极大的，应当迅速及时审判，可以不受刑事诉讼法第110条规定的关于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期限以及各项传票、通知书送达期限的限制。二、前条所列犯罪分子的上诉期限和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期限，由刑事诉讼法第131条规定的10日改为3日。”

加上这两条原文，后面再对提出批评就比较顺通而不显得突然了。

崔 敏

读贵刊今年第3期《林希翎的右派为何没有改正》一文，

想补充一下该文中未提及而我所知晓的林希翎点滴情况。

林希翎是浙江台州温岭县人，我是温州乐清县人，两县相邻。上世纪60年代，我陆续听到林希翎的一些狱中传闻。文革后期，我获知林希翎从金华十里坪劳改农场被特赦，被安排在武义县农机厂工作，并与该厂赖姓技术员结婚。

1988年春，我偕老伴赴法国探亲。住法三个月，经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特许，法国政府发给我俩长期旅法居留证。我去我驻法大使馆参加国庆宴会，知我政治情况的大使馆的人好心地告诉我，林希翎是个危险人物，你千万别去接触她。我接受“反右”的深刻教训，对林希翎敬而远之。不知怎么的，林希翎却知道我的住处和电话，曾多次约我为她所办的《开放》杂志撰稿。我一不回信，二不撰稿，像避凶神那样对待她。

进入新世纪后，在巴黎我驻法大使馆的一次宴会上，我听到邻桌一位颈挂硕大金项链、富态龙钟的老太太在发言：年龄大了，激情没了，诗也写不出了……我问老伴，这是林希翎吧。她说，不会的，林希翎没那么胖，也不会是披金戴银的贵太太，更不会被邀请参加宴会。我好奇地去问《欧洲时报》总编辑梁源法（台州黄岩人），她是谁？梁告诉我她就是林希翎。于是，我过去对林希翎（用她家乡话）说：程海果，我是你老乡呀！她用疑惑的目光瞥了我一下，笑着回：老乡好！接着，她去问梁源法：这人是谁？是我老乡吗？梁告诉她，说我是温州人，叫何某某。她大吃一惊，马上来到我的座桌，说：久仰，久仰，好大架子，不回信，不撰稿，还诬人说老乡。我说我是乐清人，与温岭两隔壁，又会说台州话，怎么不是老乡呢！于是，我们开始了交谈。

林希翎告诉我她的一些情况：我对祖国是热爱的，对中共也是忠诚的，不然我怎么十几岁就去参加解放军？“反右”前，我以第二种忠诚于中共，写了文艺改革的所谓“万言书”（注：看过林希翎“万言书”的温州人——都是中共党员，一概被打成右派），被中共误解了，打成右派，判了刑，蹲了近20年牢。到法国后，拿救济金，办刊物，聘请王若望等人当顾问。曾多次去台湾访问讲演，最后一次由于抨击国民党执政者李登辉，被驱逐出境，永远不准进入台湾。尤其值得欣慰的是：中共政策大变了，竟把右派也推上了总理的高位，因此少女时代热爱中共之火也重新燃起来了，所以我要回国，要求右派改正，大使馆也支持我……

除那次交谈外，林希翎还告诉我，儿子大学毕业了，有工作了，老公在香港，家中有保姆，等等家庭琐事。2007年当美国召开中国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座谈会时，法国有林希翎、陈爱文二人被邀参加，林、陈二人均以身体有恙为由，婉拒参加。几年前，她因病离世，魂归故里，葬于温岭太平公墓，入土那天，送葬人很多，里面还有些要人。

浙江读者 何琼玮

贵刊2012年第1期《革命政权如何塑造‘新人’》一文(见第91页)中“这就叫条件反射,巴甫洛夫为此在1904年得到了诺贝尔奖”这句话有误。巴甫洛夫在1904年得到诺贝尔奖,是由于他在消化生理学的出色成就,这时他的条件反射研究才刚刚起步,他的大脑高级神经活动的研究是在20世纪前30年进行,他于1936年逝世。

南京读者 萧信生

贵刊2012年第2期第49页《也谈瞿秋白遇害》一文中提到“方志敏等……牺牲在征途上”,这与事实不符。方志敏是1935年1月,在江西玉山县陇首村与国民党军作战,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坚贞不屈,8月6日在南昌英勇就义。

武汉读者 周幼人

读贵刊今年第3期《吴晗挨批后的心态变化》一文,我想了很多。我和吴昆是老朋友,他是民盟山西省委秘书长,我是民盟北京市委秘书长。这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事。吴昆的文章我看过。吴晗给萧庐生的回信,说明吴晗当时对批判《海瑞罢官》的看法。1965年12月12日向阳生(邓拓)写的《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就几个理论问题与吴晗同志商榷》,这篇文章实际上是以学术问题为吴晗开脱。就在同一版上也有我写的一篇文章《一概否定的

态度是不对的——从姚文元同志批评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谈起》。我看了邓拓的文章后,在1966年1月30日的《北京日报》上又发表了几千字的长文《〈海瑞罢官〉并没有宣扬阶级调和——与姚文元、向阳生等同志商榷》,并提出“吴晗同志在政治上是好人,只是在历史研究中有缺点有错误”,尽力为吴晗开脱。因为这两篇文章我被劳改并被监视居住长达10年之久,到1978年才正式平反。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极“左”思潮笼罩中华大地那些日子里,没有做人的尊严,更没有学术自由,几乎到了“焚书坑儒”的境地。时至今日,还有一些人为文化大革命叫好,要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去,反对改革开放,不知他们用心何在?


北京读者 张汝范

贵刊今年第5期刊登的何方先生《建国初期外交上的两条路线》一文中有一点差误,即第11页最后一段“编共在领袖德钦丹东遇害后……”应为“在主席德钦丹东遇害、德钦辛牺牲后……”

因为德钦丹东1968年死后,1969年3月,巴登顶在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日头条和次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宣布德钦辛为主席,他自己为副主席。直到1975年5月(6年后)巴登顶在同样的媒体,在宣布德钦辛主席和德钦漆书记牺牲时,宣布他本人为主席。





北京读者 张纪榆

一秒的采像  
二周的雕琢  
永恒的纪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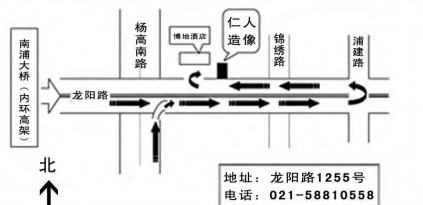


上海仁人造像馆

人像从此不再是伟人的专利  
只要  
个人喜好  
子女孝顺  
同仁关心  
就能给历史留下永恒的你

地址: 上海浦东新区龙阳路1255号  
电话: 021-58810558 (工作时间)  
手机: 13601939210 (非工作时间)  
FAX: 021-58812147  
E-mail: renren@shrenren.com  
www.shrenren.com



地址: 龙阳路1255号  
电话: 021-58810558





全国免长话费咨询  
400-668-0650

# 愿人人都有作品传世

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是国内一家从事图书合作出版的文化公司，公司成立以来与多家出版社建立了密切业务关系。

## 代理出版：

- 个人出版：诗歌、散文、小说、生平传记、学术著作等。
- 老人出版：回忆录、自传、诗词、散文、思想理论著作、书画图册等。
- 家庭出版：家庭照片画册、家史档案、家谱族谱、先辈遗文、家族音像等。
- 学生出版：优秀作文集、书画作品集、学生纪念集、孩子成长图册等。
- 学校出版：教学经验谈、教研论文集、名师纪念集、名校成就图册等。
- 博客出版：个人博客作品集、网络专题作品集、社区网文集等。
- 旧书翻印：旧书急用少量翻印、书刊资料整编重印等。
- 电子音像：音乐、戏曲、录像摄影、光盘复制、磁带复制等。

另有：合作出版 常规出版 宣传推广 合作教材 录入排版设计 著作/署名/挂名/编著

## 出书类型：

- A类：国内出版社出版，国家标准书号，可在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备案查询。可在国内主渠道（新华书店等）发行销售。
- B类：无书号出版，用于交流与赠送，不进入书刊发行渠道，数量一般在300册以内

## 基本价格：

- 1、大32开本：封面用250克铜版纸，赠送勒口，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印刷100本三千元，300页印刷100本四千元；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 2、16开本：封面用250克铜版纸，赠送勒口，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印刷100本四千元，300页印刷100本五千元；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 (注：A类型代理出版的书，1000册起印；所有书籍无论开本印量越大越便宜。)

## 服务流程：

作者来电说明书稿详情（如需要公司寄送参考样书）→公司报价→签约支付定金→电脑录入编排校对→报送出版社（如需正规出版）→出版社三审三校（如需正规出版）→邮寄样书→作者终审签字付款→回邮样书→印刷送书（附赠成书光盘）。

## 欢迎“组稿代理”与“项目合作”

目前，中国中产阶级不断发展壮大，传统文化精神逐步回归，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搜集、整理与出版渐成热点；本公司大力开拓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网络数字传播与纸质书代理出版业务。尤其自（学生出版网）（老人出版网）（人人出版网）（出版发行网）开办以来，深受离退休老人与各地文联、作协、民间作者、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欢迎，每年代理出版作品近百余部；为方便作者就近洽谈与交稿，我公司设立“地方组稿代理”与“编辑出版分站”，请有写作经验与组稿能力的单位或个人洽谈合作。

服务热线：010-58608407 82057551 58608409

传 真：010-58608409 投稿邮箱：5805191@163.com

登陆网址：(老人出版网)www.lrchuban.com(学校出版网)www.xxchuban.com

(人人出版网)www.rrchuban.com(出版发行网)www.51isbn.com

公司名称：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邮编：102218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立汤路188号北方明珠大厦三号楼1509室

## 作品展示





# 见证历史，传承文化！

—— 三千元五十本起编印文集自传、家史家谱



## 🎓 自传编写很容易：

清理书信和日记、翻检照片与影集、写出感悟和经历…

## 🎓 家史百年最相宜：

走亲访友问家史、编写百年大事记、苦难辉煌重点写…

## 🎓 自己不写帮您写：

身手不适勿用急、上门服务必须的、您口述我来代笔…

## 🎓 音像制作也可以：

个人拍摄人生录、家庭制作家族史、精神形象传百世…



出版著作  
传承文化

服务热线：010-6892 0114 6252 5116

编印单位：北京海淀图书城步行街25号“家史·家谱·传记书店” 邮编：100080

网 址：《个人出书网》(www.grcsw.com) 《家族出书网》(www.jzcsw.net)





北京回忆久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Beijing Memo99 Culture & Media Co., Ltd.

# 听您讲述人生经历 为您撰写回忆录

我们已为千余位主人公撰写了个人回忆录

## 您的回忆录是这样诞生的

- ◎历史顾问与您共同制定采访提纲
- ◎访谈人员和您一起回忆人生故事
- ◎专业撰稿人将您的经历凝练成文
- ◎资深编辑三审三校
- ◎设计师为您量身制作精美图书版面

回忆录咨询热线 400-653-6199

北京回忆久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歌华大厦B座11层  
传真：010-84186201 邮编：100007  
公司官网：<http://www.huiyi99.com>





**中共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

**读李锐流放日记**

**盛世才统治新疆始末**

**习仲勋在广东主持平反冤假错案**

**经济转型的瓶颈是政改滞后**

**苏东剧变：回归人类文明**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定价：8.00元